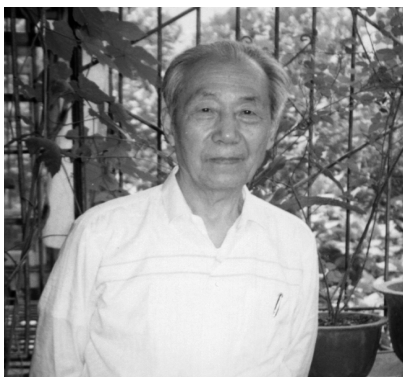


长寿湖又一个延安老革命

朱恩源

1957年西南煤矿机建局土建处技术员

1918年生



朱恩源是西安人，1937年底，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到西安招生，19岁的朱恩源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对延安怀有神圣的向往，当即与堂哥一道报名前往延安，成了抗大政治大队的一名学员。1938年，朱恩源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江青等人一起坐在小木板凳上聆听毛泽东讲“论持久战”……

毛主席平易近人，讲的那些道理也打动人心。我先在政治大队学习，后转到军事大队，毕业后被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回延安，担任了延安警卫连指导员。

那时我才23岁，干一番事业没问题。一个意外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我堂哥与上司闹矛盾，害怕被整，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延安。他一走就牵连到我，组织上三天两头逼我交代堂哥的去向。堂哥走时并没有告诉我，我实在交代不出来。我害怕了，听堂哥说过，党内斗争很激烈，整死的人很多，有一种药一捂就死。他还了解到有不少连营的指挥员被暗杀，堂哥不辞而别，就是害怕上司要他的命。

我看上面逼我那个架式，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最后我向组织提出，愿意外出寻找堂哥，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在1941年初离开了延安。这一走，便是同宝塔山永诀，从此我流离颠沛，再没回到党的怀抱。

不过我堂哥后来又重新入党，并为解放天津立下汗马功劳，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解放后，我对组织详详细细交待过在延安的那段经历，但是每次运动都要清理我，怀疑我，不过总算还平安，我在西南煤矿机建局土建处当了个技术员，结了婚，有五个子女。

1957年组织上叫我们“真诚向党提意见，说出来党才好改正。”

我信以为真。

我认为土建处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处领导不懂业务，导致了很多质量问题，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我老老实实地说：处领导过去参加革命有贡献，但现在建设时期，不学技术搞不好工作，这几年质量事故很多，主要原因是处领导不学业务，工作好几年了还不懂业务。

我们处领导是战争年代军人出身，虽然不懂技术，但善长打退敌人的进攻。反右一开始，我就被抓出来斗，说我不接受老干部的领导，看不上老干部，自以为懂技术，老子天下第一。

最气人的是把我打成右派后，还派人到我家里强迫老婆同我离婚，老婆不干，组织上干脆把她和我一起下放劳动。五个小孩在家里没大人，苦得很。后来看实在没办法，他们才放了我老婆。

在长寿湖我最悲苦的记忆是在那个“疗养所。”

饥荒年，饿死不少右派，一些人饿得东倒西歪，我自己眼看也要倒，在这种情况下，农场在同心岛上办了一个“疗养所”，收那些来不起的人。

1961年我作为重病号进了“疗养所”，照顾我干最轻的活——在厨房洗菜。

那个‘疗养所’是我的地狱，我想死就是在那个地方。我已经病得几乎走不动，每天在厨房洗冷水，冻得我浑身发抖。管教人员天天冲着我臭骂，说干这么轻的活还叫苦，是成心抗拒改造。家里也来信责怪，说我给全家带来灾难，要我好好改造，争取早点摘帽，免得影响家庭。

我的确想好好劳动，好好改造，但实在力不从心，我下长寿湖时已经过了40岁，生活把一切路都堵死了，只剩一条死路。一天傍晚，我上厕所，头一昏，栽倒在粪坑里。当时要是栽在湖里，我就不挣扎了，可惜是栽在粪坑里，要死，也不能死得太臭。所以，我拼命爬了出来。

疗养所总算看出我快不行了，一副骷髅像，不是装出来的。他们不愿意我死在疗养所，打发我回家疗养。

我在朝天门下船后爬那一坡石梯，唉，我都不想提那段往事，不到十分钟的路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每走几步就坐在地上喘气，甚至象条狗趴在地上，上上下下的过路人看我那种眼神，一辈子忘不了，我不像人，像鬼、像骷髅。

趴在冰冷的石梯上我觉得我走不回家了，这条命要丢在这儿。



位于同心岛的疗养所旧址（谭松摄）

我在家里整整躺了两个月，才勉强恢复元气。两个月后，我又回到长寿湖继续劳动。

我一直没能摘帽，1979年“改正”时才一笔勾销。“改正”的材料、结论都没给我看。单位领导说了一句话，算是了结：“你‘改正’了，摘帽了，今后要好好工作。”

朱先生今年已经83岁，我问他回首这一生有什么感想，朱先生回答：

在抗大学习时，教育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对这一点，我现在仍然很拥护，但是，共产党理论上一套，实际上另一套。比如，当年我在延安学习，学的是：共产党是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党。现在看来刚刚相反，它一心为自己谋幸福，当官的一心为自己谋幸福，与我所学的完全是两回事。在抗大学习时说，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人人平等。我很受鼓舞。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觉得他对人很亲近，很平等。现在，共产党当权半个世纪了，既没有消灭剥削，也没有

消灭压迫，更没有平等。别的不说，我孙女在医药公司就深受剥削和压迫。公司领导强迫她和其他人加班，不付一分钱加班费，最多的一个月无偿加班近 100 个小时。我孙女不敢吭声，因为领导说，不愿干的可以下岗走人，找工作的人多的是。公司领导自己花天酒地，公款出国旅游，游遍了欧洲游美洲，职工不敢吭一声。这就是剥削和压迫。我去延安前当过学徒，受过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但比较起来，现在厉害得多，更主要的是，那时压迫还有反抗，现在不敢有一丁点反抗，这口气我一直憋着，想找个新闻单位告他们，又怕孙女失去工作，现在工作不好找呀。



2009 年 3 月，90 高龄的朱恩元参加长寿湖幸存右派聚会

2009 年 3 月，90 高龄的朱恩元
参加长寿湖幸存右派聚会

还有，我们门外有一个城管队，附近是个菜市场，我经常看见城管队的人飞扬跋扈，敲诈老百姓，动辄罚钱，动辄一脚将农民或菜贩的菜踢翻。前几天借口一个送牛奶的将自行车停在人行道上，硬敲人家 20 元，而他们自己经常将摩托车骑上人行道。比较一下，我觉得国民党的城管和警察没有现在的坏。总之，我认为中国的事情很难办，因为根子上烂透了。

采访时间：2001 年 5 月 13 日

地 点：重庆市南坪



长寿湖农场场部大楼（图片来自光碟《长寿湖我们怀念您》）

“好哇，你要杀毛主席的头！”

梅 吾

1957年重庆煤矿学校政治经济学教师



我出生在河北乐亭县，就是李大钊出生的那个县，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高中时我在冀东参加了革命，1946年9月到部队，随后进入延安鲁艺读书。那时，我单纯得很，把党看得既崇高又神圣，一心一意要为马列主义、为革命事业献身。

1947年鲁艺搞整风，我觉得不对劲，所谓整风，就是整人，凡是有高中文化的都被打成特嫌。我们一起进去17个人，划了7个特嫌，都是高中生。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特务，斗我，要我交待，他们说：“你家里不是吃不起饭，为什么要来当八路军？”

我在解放区总结出个经验：在共产党队伍里，上过初中但没毕业的人最吃香，最容易被提拔。完全没文化也不行，不容易提升，文化太高让人不放心，要被整。初中没毕业，不高不低，正好。我在鲁艺的同学中出了三个将军，都是初中文化。其中一个上将兼中央委员，就是属于初中没毕业。1948到1949年，我从辽宁出发，一路上为部队招生，其中招了30多个大学本科生。几十年后一打听，这些大学生中，除一人外，全部当了右派，漏网的那一个当了“阶级异己分子”。共产党不相信知识分子，但又离不开知识分子，它只能利用，利用后又打压，或者边利用边打压。

我是直到1949年南下的行军路上，党组织才给我作了结论，免去了我“特嫌”帽子。

第二次受冤枉是1955年，当时我在北海舰队海军航空兵服役，职务是理论部主任，上尉军衔。反胡风时因为我同作协副主席陈学如有联系，就说我是胡风分子，审查了我一年。1956年给我平反，结论是：梅吾在政治上是清白的，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要加强思想改造。我不同意后半节的说法，要他们修改，他们不同意，我一气之下甩手不干，当年就离开部队，转业到了重庆煤矿学校。

在延安鲁艺被整后，我就开始考虑共产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那之前我对共产党完全是盲目信任，盲目崇拜。1955年第二次被整之后，我便埋头认认真真读马列的书，读《资本论》，读《共产党宣言》，读列宁的著作，还有大量的经济方面的书。目的就是想知道清楚这场革命是怎么回事。

1956年煤矿学校很缺政治经济学教师，我当了这门课的教员，教了一年多，成了右派。

我被整是1958年对大跃进提了些看法。我说，大炼钢铁是浪费资源，“以钢为纲”很荒谬，从经济学上讲不通。还有，砍这么多树来炼钢（当时歌乐山上的大树都砍光了），将来长江发洪水，谁负责？我还说，《人民日报》报道天津亩产12.5万斤，这不可能，

一亩 660 平方米，12.5 万斤怎么堆？

这些都是私下闲聊的话，不知谁汇报上去，把我揪出来斗。我一声声据理力争。我说：“1957 年底公布的数字是人均年粮 249 公斤，这点粮食如果像现在这样乱折腾，不出半年，就会饿死人，要是‘粮食越吃越多’，可杀我的头以谢天下。但如果饿死了人，该杀谁的头？”我话音刚落，下面一片叫声：“好哇！你要杀毛主席的头？”

在长寿湖，管教干部王磊说：“你要不承认是右派就只能当一辈子右派。”我拒不认错，为此，又判我两年管制。

是我主动提出同妻子离婚，那是 1959 年，我 31 岁。妻子死活不同意，信誓旦旦要等我改造回来。我告诉她，这次怕是难得等，毛泽东不死没指望。斯大林 30 年代整了那么多分子，什么时候平反的？1954 年斯大林死后才陆续平反。毛泽东才 60 多岁，身体好得很，保养又好，怕还得活 30 年，说不定比我都活得长，30 年你能等我？等成老太婆？我很清醒，所以坚持离婚，她坚持不同意，又拖了两年，1961 年我们才离脱。儿子判给我，我交给母亲抚养。我在长寿湖放松精神，慢慢等吧，保持不死就是胜利。

当然，我等到了。毛泽东 1976 年死，我 1979 年“改正”，1980 年重上讲台，虽然已年过半百，晚了点，但还是拼命干了一阵。

1949 年之前，无数革命志士为什么前仆后继？因为中国被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太久，人们迫切想改变中国的状况。1949 年共产党建国，人们认为革命成功了，兴奋得很。我自己高兴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可惜，后来我发现，我们推翻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建立了一个全封建全封闭的专制社会！毛泽东根本不懂上层建筑，他的经济学知识仅限于一本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读得相当熟。当时，从这本书中我就发现至少苏联没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上。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的思想始终没超越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思想。为什么共产党一专政，经济就越搞越糟，国家越搞越乱？关键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的基本学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且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是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而列宁则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发动。于是在俄罗斯小农自然经济条件下，搞了个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的社会矛盾成功了，建立了以农民小生产为指导的所谓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不仅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而且完全倒退到封建独裁。靠的什么呢？靠的是契卡，靠的是屠杀政策。苏联的知识分子从列宁时起就被杀了不少。高尔基为了保护知识分子，同列宁争吵，列宁把他送到意大利休养。这不是哪一个人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社会生产形态导致的必然结果。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凡是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国家，夺权后都是独裁政权，而这种独裁统治恰恰是封建小生产者的必然结果。

在长寿湖时，有一次有人问我，“梅吾，你说社会主义讲不讲民主？”我说：“资产阶级才讲民主，无产阶级讲专政。”他说：“你胡说！”我说：“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里有篇文章《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你去看看。”他说：“无产阶级也讲民主，我们有民主集中制。”我问他懂不懂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他很流利地背诵：“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我告诉他，还有一条，就是中央服从主席。“最高指示”明明指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宪法上也清清楚楚写着（1975

年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也就是说,在人大后面还存个太上皇——共产党;而全党要服从中央,中央只服从那个太上皇毛泽东。

毛泽东应该说是个天才,绝对是个天才,但他的意识形态不能超越他自身,他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封建帝国,甚至是带有奴隶制特征的大帝国。毛这个人治国无术,用人多疑,他不如秦始皇,虽然他常常以秦始皇自居。秦始皇还奠定了中国的疆界,扩展了疆土。毛当皇帝后,实际上送了不少疆土。蒋介石都不承认外蒙独立,他承认,他把17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送给缅甸,把麦克马洪线外的土地让给印度,那是西藏最肥沃的土地,相当于安徽、福建两省那么大,当年西藏人民赶着牦牛支援前线,哭着求解放军不要让土地哪。

基辛格的日记解密后,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基辛格你喜欢女人吧?我送你500个中国女人。中国女人是最温柔的。

我当时只觉得背脊发麻,他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500女人中包不包括他的女儿?!只有奴隶主才这样发配奴隶。他不是封建皇帝,而是奴隶主皇帝!

毛泽东有首词《念奴娇·昆仑》,里面说:“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这词说得准确,老百姓和国土,都是他口袋里的私产,可以随意“一截、一截”地抛洒。

还有,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不是唯物论,而是主观唯心论,他尽做唯心论的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他提出来的。他留下的后遗症太多,给国家造成的灾难太大。现在的组织系统、干部政策、党管宣传等都是他遗留下来的。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发现已经公开卖官、公开要钱。要当乡长,行,5万!大学生要安排工作,行,拿钱来!现在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除了脸面不要什么都要!这个根源也在毛泽东。他统治中国后,把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统统毁掉。以前人们贫穷,但还讲点良心,有点道德约束。现在是毫无顾忌,没有任何自律。这种破坏是空前的,当年蒙古人入侵中华都没做到这一点。

任何一个王朝建国都要休养生息,但毛泽东共产党不,一开始就折腾,就整人,就大开杀戒,(19)50年至(19)52年的镇反,杀了多少人?!历史上都是惩罚几个首恶分子,下面众多的小人物赦免。毛泽东与历史相反,把几个大人物当座上客,大杀下面千千万万小人物。还有,用落后的农民思想来改造有点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用知识分子去改造、去启蒙落后的农民,这是历史的倒退,也是毛的又一桩荒唐。

我从16岁参加革命,对共产党的认识分几个阶段,第一是从盲目信仰到开始思索(延安鲁艺整风);第二是从思索到比较清醒(文化大革命);第三是从比较清醒到又产生幻想(“改正”后1980年到1985年,当时讲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第四是从产生幻想到彻底清醒(1989年“六·四”镇压,让我彻底清醒。我看清了邓小平共产党的真实面目,为了保他邓家私利,也为了一党私制,不惜牺牲那么多学生!不惜让国家民族倒退!共产党从此完了!)。从“六·四”镇压之后,我再也不写任何文章,教书也是混饭吃。我这一生70多年就这么过去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文革时骂我的语言:“死路一条。”

去年我们延安鲁艺的老同学在山东聚会,那位上将将军也来了。我们在当年战斗过的战场上热泪纵横感慨万千,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五十年来是与非，谁能说清谁怪谁？
往事如烟随风去，留下问题一大堆。

采访时间：2001年6月12日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梅吾 2002年6月18日电话中提供：

1、到长寿湖去的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这些人如果不去，可以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说这场灾难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

2、在修桃花荡的劳动中，夫妻右派刘焰与罗成溶相遇了。一天晚上，刘与罗悄悄跑到山坡上的树丛里亲热。不料，这事被农民看见，农民不知刘、罗是夫妻，向管教干部孙重汇报。孙重召开大会批斗刘、罗，语言非常难听，说他们不如野狗。孙还要求右派们发言批斗，梅吾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说：“刘焰、罗成溶，你们有没有组织观念？不要以为你们是夫妻，就可以乱搞男女关系。今后这种事，要先向党组织汇报，批准之后才能行事。”

3、饥荒时期，右派胡X林肿得双眼睁不开，仍然强迫他上坡劳动。晚上收工回来，开会批斗“保命思想。”主持会议的人说：“共产党统治下难道还会饿死人？这是阶级敌人造谣污蔑。梅吾累了一天，想早点上床，顺着他的话说：“说得对。那些人都不是饿死的，而是病死的，水肿病，原因就是不听党的话。党叫大家不要喝盐巴水，不要吃生东西，那些人不听，偏要吃，张樾不仅吃生东西，还不讲卫生，吃溜水缸里的南瓜瓢，怎么不死嘛？”

补记：

梅吾于2005年2月20日去世。去世前几个月我曾到医院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气喘吁吁地给我提供了长寿湖下放学生的情况。分别握手时，他胸部一阵疼痛，面部扭曲，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很难受，谢谢你来看我。”

我最后对他说的是：“长寿湖那段历史已经永远保留下来了。”

我整整跪过二十四小时

周西平

1957年重庆市委党校中共党史党建教员



我是湖北人，初中毕业后当了一段时间学徒，17岁那年，1941年，我在洪湖附近加入了李先念的部队，成了新四军中的一个“红小鬼。”1942年，日军大扫荡，新四军的一部分人被迫疏散，我不敢回家，一路跋山涉水，步行走到重庆。我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位于红岩村）干了一段时间，皖南事变之后，我以一名外省学生的身份进入了国民党机关，当了一名抄写员，暗中传递情报。1944年，我考入民治新闻学院（后并入复旦大学）学习，同时担任地下党的联络工作。1955年我调到重庆市委党校，担任党史党建教员。

鸣放期间，我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安排，组织学员提意见，谈看法。我自己没提。哪晓得事后一棍子打下来，把那些提了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右派！

这事太过份了！

我不依，跑去找领导闹，我说：“上午是同志，下午是敌人，原因是提了一条意见，意见是我去动员人家提的呀。人家按组织的要求提点意见，而且都是工作上的意见，怎么就操起棍子整人？这不是乱了章法？！”

闹的结果，我自己成了右派。

先把我定成右派，再来找罪名。罪名吓死人：周西平说，毛主席的错误多得很。

这个罪名是这样生成的，在一次动员学员的鸣放会上，我说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就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会犯错误，一种是没有出生的人，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他们为了给我找个罪名，把这句话变成“周西平攻击毛主席，说毛主席错误多。”

我本来可以不下长寿湖，到资料室工作，但我心伤了，不愿看到那些人，不愿与他们共事，一气之下我自己申请走人。后来，在长寿湖九死一生，我才觉得自己太幼稚，后悔晚了。

在长寿湖我发现，并不是自己才委屈，那群人没有哪一个不是活天冤枉。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些，但更加不认罪，一有机会我就翻案，翻案更挨整，所以，我在长寿湖20年，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

要问在长寿湖体会最深的是什么，那就多了。

首先是那个大饥荒。

路边上随时看得见倒毙的人，尸体都没人收。有一天晚上，我的渔船停在湖边一个回水沱，早上起来一看，船边漂浮五、六具尸体，个个肿胀，模样吓人。我大叫一声，想跳上岸跑，一看，坡上也似乎横着死人，我只得赶紧撑船跑。

还有一天，从垫江下来几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向我们讨包谷吃。她们一上船就直挺挺躺在船上，说甘愿跟我们走，只要给口吃的，干啥都可以。还有一次在飞龙，一个30多岁的妇女，拖着瘦得皮包骨的一儿一女，扑通一声母子三人跪在我面前，女人求我收留她的儿女，给他们一口饭吃。我一个右派，自身都难保，怎么救得了他们。那个凄惨一辈子忘不了。

我们在一起的有个教师右派（可惜我把这个人的名字忘了），他是四中的老师，北大外语系毕业。1960年他饿得发慌，半夜爬到猪圈偷吃了一肚子猪食，天亮前，猪食在肠胃里发酵，他满地打滚，痛得猪一般叫。我划船送他到狮子滩，从飞龙划出来，60里水路，要划大半天。一路上他连连说：“老周耶，积积德，划快点。”划到狮子滩，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上岸时他脸色惨白，已经说不出话。两个小时后，他死了。

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我听说飞龙上去的庆口已经有人吃人肉，煮小孩吃。

解放前我从武汉到重庆，步行好几个省，兵荒马乱的年代都没有见到过这种惨象。

我幸亏是在捕鱼队，多吃了几条“国家财产”，才保住了性命。

文革一来，又是一种折磨，这次主要是精神和皮肉之苦。

我老是消化不了一肚子的委屈。我看见文革批斗各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为毛泽东终于发现了下面基层的问题，要拨乱反正。

机会来了！我赶紧请假回原单位，要翻案。

结果不用说了，我又犯一回傻，抓回长寿湖一阵好斗！

大会小会整整斗了我60多次，有一次连续斗三天三夜。有一个叫XXX的右派，为了挣表现，竟然凭空捏造我回重庆联络人开黑会。指导员郑修成罚我在地坝上整整跪了24小时！我跪在地上，不准动，郑修成派两个右派监视我，每两小时一班，我从头天中午一直跪到第二天中午，膝盖以下全部跪肿。1979年“改正”后，郑修成成为这事多次向我道歉。但是，那24小时给我的心灵和肉体留下的伤害终身难忘。还有一次，也是因为不服罪，把我吊在同心岛上的一棵大树上，吊得我昏死过去。前年我回长寿湖重游旧地，专门走到那棵树下照了张像。解放前，我当过学徒，也挨打受气，但比起长寿湖好得多，尤其没有精神上的折磨。

还有相互揭发、汇报。

我觉得解放后最大的不幸在于道德败坏了，良心被践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彻底扭曲。共产党提倡互相揭发，互相斗。我们中有个文人右派叫XXX，劳动时，他随身带一只铅笔，悄悄记下谁说了什么，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管教干部每天晚上根据汇报抓阶级斗争（整人）。一天，原煤矿学校校长廖石成的女婿来长寿湖看他。两人晚上在蚊帐里悄悄说话，女婿告诉廖，说中央陈伯达出问题了。XXX偷听到了，第二天便告密。廖挨斗后想不通，夜半起来走到湖边，他要不是想到他7个女儿还得靠他几十块钱工资，他肯定跳下去了。那些年，夫妻之间都不敢讲真话。我有一个好朋友XXX，在妻子面前

满口革命语言，他妻子对我说：“XXX 太左。”其实，我最了解 XXX，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败坏和扭曲，根源主要就在 1957 年。

说到 1957 年，就得提毛泽东。这个人最擅长搞权术，把国家折腾得伤痕累累。1957 年给我加的罪名是：“周西平说毛主席错误很多。”那实在是诬陷冤枉我，我既没那么说，更没那样认为。现在我要说：毛泽东哪里是错误多，而是罪恶深重。我们子孙后代都要为他付出代价。

现在言论还是自由多了，我才敢给你说这些话。毛泽东时代只要片言只语，甚至一个玩笑，就可以整得你家破人亡。

1979 年周西平“改正”后，不愿重返党校再讲党的历史。长寿湖的经历，长寿湖的苦难，已经将他彻底改变。他调到了重庆出版社。

采访时间：2001 年 6 月 3 日 地 点：重庆出版社



周西平、詹光被吊打之地（同心岛）

四、文人墨客

当初，这些诗人、作家、记者，笔走游龙，
口吐莲花，何等英气才华！
忽喇喇一阵阴风刮过，长寿湖上，
坠下一群“落毛凤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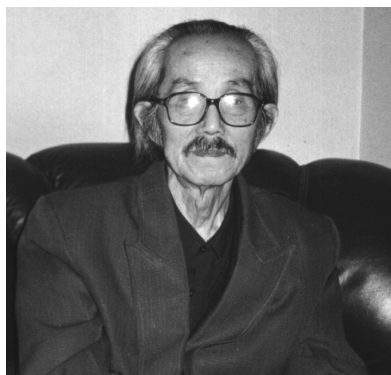
- | | | |
|--------|-------|-------|
| 1、孙静轩 | 2、张天授 | 3、刘 钊 |
| 4、韦 鼎、 | 黎素芳 | 5、王华东 |
| 6、殷宗炳 | 7、金践之 | 8、杨正秋 |



1957年反右漫画

一个毛主席赞扬过的著名诗人 孙静轩

1957年重庆市文联诗人，1930年生



我始终忘不了长寿湖死去的人，活着的人有些名字记不起了，但死去的人，印象深得很，你今后写书，书名就叫“死亡之湖”。

有一个叫邬启德（市物资局废品回收公司右派，死于1960年，时年30多岁）的右派，死得惨。他饿得不行，偷农民地里的生包谷吃，农民抓住他，把他押送回住地。管教人员组织批斗会斗他，他把一个电灯泡砸碎，吞下碎玻璃渣自杀。那天晚上天很冷，又下雨，我带了几个人到湖边船上去抬他——别人把他送到了同心岛。他躺在船板上，身上到处都是血。我对他说：“启德，你何必嘛，你死都不怕，还有啥子抗不过去的？你有老婆孩子，你对得起他们？你要好好活。”邬启德闭着眼，一声不吭。我们四个人用绳索子套住他，把他抬到上面一个放农具的空房子。我去找伙食团一个姓曾的（他现在也在成都市）对他说，邬启德自杀，因为饿。曾说：“好可怜，我们给他送碗稀饭去”我们俩弄了一碗红苕稀饭端给他。我对他说：“启德，天冷，你把这碗稀饭吃了，今天晚了，明天给你找医生”。说完我们锁上门走了。第二天我去打开门，发现他已经死得硬翘翘的。我们把他埋在山坡上，他那张脸我忘不了，忘不了！

（孙静轩夫人李平泪流满面。）

还有一个人叫王恒，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的右派。他在坡上挖土，饿得不行，吃下大量的马桑椹，中了毒，七窍流血。下午五点多钟，太阳快落坡了，他躺在山坡上，招手对我说：“老弟，老弟，过来，过来，摆摆龙门阵”。我走过去，他对我说：“老弟，我当了人，一生没做过一件坏事，读书时思想进步，搞学生运动，追求自由民主，后来工作兢兢业业。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谈过恋爱，没接触过一个女人……”我对他说：“不要多想，没关系的，吃点药，会好起来。”我安慰了他几句就走了。仅仅过了两个小时，王恒就死了！我没想到他死得那样快。他自己知道不行了，急于找个人说话——那是他留在人世最后的声音。他的死给我很大的刺激，后来我把这事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纪念他。

在长寿湖，我自己也差点饿死。我吃过观音土，拉不出屎，用手抠。他们见我干不动了，安排我去放牛。我走不动，恍恍惚惚，摇摇晃晃，牛用头顶着我走。正在这个时候，遇上了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他是渔场副场长，他见我双眼深陷，面如死人，吃了一惊，问：“这不是孙静轩吗，你怎么这个样子？”我从喉咙里哼出几个字：“饿，饿，饿……”罗广斌赶快把我调到捕鱼队——那是饥荒年长寿湖最实惠的地方，这样我才捡了一条命。

我咋个当的右派？说来话长。我13岁在山东参加革命，16岁入党，是共产党队伍中的“红小鬼”，后来写诗，到1957年时已经有些名气。1957年初，《诗刊》创刊，毛泽东把臧克家召到中南海，询问《诗刊》和作者的情况。毛泽东问有没有年轻诗人，臧克家回答，有，有两个。一个是孙静轩，一个是严阵（音）。他说孙静轩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文学研究院毕业后分到重庆，现在在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毛泽东说了一段话，原话是：“像孙静轩这样的人，要很好地培养、帮助，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作家队伍。在适当的时候也要压他一压，不要他翘尾巴。”臧克家告诉我：“毛主席很关心你呀。”我飘飘然，很得意。这事除《诗刊》外很多报都登过，我认为自己有资本，有金字招牌，谁敢惹我！

1957年我在西南作协——当时全国五大作协之一。我并没有参加鸣放，但我对作协打右派太多表示不满。右派占了业务人员的40%，职工的20%。我说文联副主席曾克夫妇不是反右，而是宗派整人，开夫妻黑店。我根本没想到也会整我，我在党组织会上很狂地说你们敢不敢把我打成右派？！

咦，有什么不敢的？！1958年旧历8月15，中秋节那天，我成了右派。

我下长寿湖，妻子同我离了婚，她是铁路文工团的团长，我们结婚才七个月。

陡然从人间天堂跌落到人间地狱，我受不了，觉得奇耻大辱，想自杀。后来一想，不行，我死了他们高兴，我要活着看他们的下场。

长寿湖整人最狠的是管教干部孙重。1962年他平白无故把我打成贪污分子，冻结我工资，扣粮，每天只准我吃五两，把我往死里逼。这个人很典型，你该去采访他。我当时有些政治问题看不清，长寿湖有两个人对我帮助很大，一个是你父亲，一个是黎民苏。我同你爸一起打渔，一起在伙食团当炊事员，他天天给我灌输：共产党变质了，政治黑暗，脱离群众，经济搞得一团糟。他的分析帮助我清醒认识这个社会。黎民苏则是在生活上、劳动上帮助我。

我对共产党本质的彻底认识是在文革林彪事件之后，在那以前我还认为共产党是方针、路线、政策上出了偏差。

我年轻时真心相信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后来发现这是个大骗局。我一生为之追求，为之献身的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现在工人最没地位，还不如解放前。共产党欺骗农民为他打天下，搞了五十年社会主义，饭都吃不饱。至于土地，我在“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一诗中说过，“左手给你土地，右手又收回去”。岂止收土地？连饭碗、农具都没收，骗农民。有些年轻人说，关你们屁事，你们老了，管它共产党干些啥。我说，我同你们年轻人不一样，我这一辈子同这场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受骗，生命被浪费，怎么能不关心？



1957年秋留影，时年27岁。

孙静轩 1957年秋（27岁）

1980年我写了《幽灵》一诗，反响强烈。邓小平定调子批判三个人：我、白桦、叶文福。我是“保护过关”，白桦是“强迫过关”，叶文福是“不准过关”。“保护过关”就是要把我树成“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典型。上面还许愿可以恢复我的党籍，我坚决不干。我曾在政协会上说：为什么不能反党？你说个道理？！共产党本身就是反党分子——当年反执政党国民党。为什么非要强迫一个人相信党、拥护党？你干得好我可以拥护你，干坏事，我可以反对你，就是我的亲爹亲妈办事办得不对，我也可以反对。一个执政党，动辄用“反党”的罪名置人于死地，太霸道！太专横！多年来我们一听说某人反党，就认定他是罪大恶极，一听说自己反党就惊恐万状。我们怎么不停下来想想：为什么不能反党？

前两年我写了一首200多行的长诗“告别20世纪”，这又是一部“反党”作品，我私下把它印出来，传到海外和网上。香港《开放》杂志选用了一部分，还加了些小标题，其中一个标题“中国人民没站起来”，让江泽民受不了。中央派人下来清查了我几次，强行收缴了剩余的书（当然没让他们全收走），让我交待三条：一、书送给了哪些人？二、是哪家印刷厂印的？三、谁上的网？谁带到国外去的？我一概拒绝回答。我对奉命前来收书的作协领导说，你们给省委宣传部和中央带一个口信：历史将会证明，你们是错的，我是正确的。

这个党已经没有希望了。它现在名字叫共产党，实际上什么党都不是，它没有主义、没有信仰、没有理想。以江泽民为首的这批人，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权力集团，新官僚集团。它以权谋钱，以权保护谋到手的钱，这个集团有权又有钱，比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利害100倍！

“三个代表”只是个口号，没有理论，而且是很滑稽、很可笑的口号。先进生产力明明是人家资本主义，你怎么去代表？工人下岗，农民穷困，腐败惊心，人民不满，全国一个烂摊子，代表什么广大人民的利益？至于“代表先进文化”，就更是胡说八道，共产党几十年对文化的专制前所未有，活生生是“先进文化”的刽子手，还“代表”？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26日 地点：成都市红星路

采访后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外的一些电台播放了一位中国诗人的长诗——《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噢，人们，你们可曾看见，
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他，那个幽灵，就像一阵风，一缕烟
自由自在地游荡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大模大样地闯进农民的家里

趾高气扬地走进牧民的毡房
发号司令，骄横不可一世
就像古罗马的凯撒大帝一样
好像他掌握着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我们的一切全都是他的恩典赐赏……

……

他就像你的影子一样追随着你
你怎样也无法摆脱他那无形的魔掌
他悄悄地吸吮着你的血液和骨髓
他支配你的行动，控制你的思想
他可以随意地扭曲你的人格
可以摧毁你美的要求、爱的欲望
只要他稍稍暗示一下
就可以长年累月地把你关进漆黑的牢房
他可以让你死，死后还要蒙受耻辱
他可以让你活，活又活得窝窝囊囊
总之，你是他的奴隶，他的臣民
你对他的权威不能有半点违抗……

噢，人们，你们可曾看见，
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

这首剑锋直指毛泽东的诗作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我记下了作者的名字，孙静轩。

几个月后得知，孙静轩是长寿湖右派，父亲当年的难友。我于是给他寄去我的几首小诗，恭敬加惶恐地请他“不吝赐教”。后来登门拜访了几次，孙诗人（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给我的印象是敢言，敢骂，孤傲而狂放。

去作协宿舍楼采访，门卫说：“你不要去，他上午从不见人”。的确，孙夫人电话中已经说了，老孙晚上工作，下午两点才起床。但孙静轩这次破了例——长寿湖让他魂牵梦萦，肝肠寸断！

一见面，他就说，你做这事很有意义，难得！难得！紧接着，他讲起两名右派之死，声音低缓，表情凝重，毫无“孤傲而狂放”，只有悲愤与哀伤。

他夫人李平第一次听说，热泪盈眶。

感情奔放的孙诗人为什么把这段惨烈深深埋在心底？

13岁投奔共产党的“红小鬼”，几十年后，不仅拒绝恢复党籍，而且公开责问：为什么不能反党？如此转变，原因之一，是不是因为那段惨烈？

毛泽东说：“像孙静轩这样的人，是我们自己的人，要很好地帮助、培养。”二十多年后，躺在水晶棺材中的“英明领袖”能不能听见太空中激荡的电波，“一个幽灵在

中国大地上游荡”？

从“受宠若惊”到“怒发冲冠”，如此转变，原因之一，想必也是因为长寿湖的“帮助、培养”。

在长寿湖时为了活命，孙诗人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长篇揭发（汇报）材料，如今，面对来自中央要求交待（揭发）的压力，只有几个硬梆梆的字：我拒绝回答！这是弱小诗人与强大帝国对峙中，前者一点微小但却坚硬的长进。这种长进，是专制帝国最可怕的死敌。

“死亡之湖”？

我相信，孙诗人指的绝非仅仅是生命的死亡。

孙诗人固然大彻大悟，从“红小鬼”“培养”成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反党分子”。然而正如指责他“管闲事”的年轻人所说，他已经老了。

而年轻人，时下正在走另一条路！从物质到物质，从利益到利益，远离了崇高与神圣，抛弃了道德和责任。即便有一千部“死亡之湖”的问世，在对歌星如痴的敬拜，对金钱狂热的追逐中，“不管闲事”的年轻人，能对如血夕阳中垂死生命的最后哀鸣作一点思索？

共产党用红艳艳的谎言欺骗了老一代，又用金灿灿的利益（物质）败坏了新一代。共产党真的“伟大”，它死而无憾了。

补记：

孙静轩于2003年6月在成都病逝，由于我尚处在“取保候审”期间，不能擅自离开居住地，因此未能去向他作最后的辞别。不过，由于孙是名人，媒体发了大量的消息和纪念文章。这是他比白永康幸运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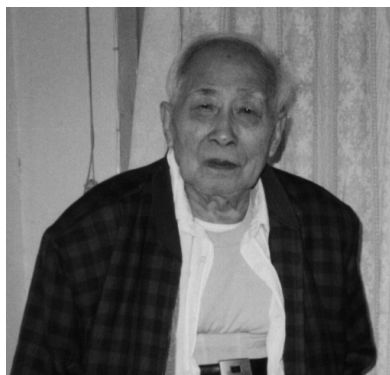


孙静轩，谭松合影（1997年4月）

被“改造”成驼背的记者

张天授

1957年重庆日报编辑，1916年生



我1944年夏毕业于复旦大学（在重庆北碚夏坝），曾经担任《诗星》编委，《音乐艺术》特约编辑，创办过《诗报》、《中国学生导报》（该报是由共产党南方局青年组领导）。1945年加入民主青年联盟，1947年进《新民报》任记者。

我思想积极进步，成天削尖脑壳去找社会的毛病，给国民党政权捅漏子。

解放后，重庆日报一创办，我就来了。没搞多久，遇上反胡风，我和报社的杨本泉两人被关押审查。原因？原因是胡风在复旦呆过，我们在复旦搞文艺诗歌的人都被认为是胡风分子。

审了我们好几个月，事情不了了之。1957年鸣放，叫提意见，我把这事拿出来，其实我并没当真，只是顺口说说。我说：“反胡风关了我几个月，是不是补我一点假，让我出去走走，会会朋友，表明我没有问题嘛。”

就这句话出了问题。领导找我，说我思想有问题，需要下去劳动锻炼一下。我并没有戴右派帽子，也没有开会斗争我，我下长寿湖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右派，他们才是右派，我是好人，锻炼一、二年就会回去。正因为没划我右派，所以1979年“改正”时上面感到为难——按文件政策我不属于“改正”对象。为了解决我的难题，据说有关人士只得先给我补划成右派，然后马上宣布“改正”。

到长寿湖之前，我从来没劳动过，握惯了笔，陡然改成锄头、犁把，很不适应。我下去时已经42岁，算大龄。我这个驼背，就是在长寿湖“锻炼”的成果。

虽然没有给我戴帽，但待遇同右派差不多，我的亲戚朋友全不敢同我往来。我小弟从重庆建筑学院毕业，受我的影响，被分到甘肃一个最偏远的地方，饥荒年饿死在那儿。我父亲和大弟弟（他是援朝的复员军人）都死于饥荒年。我下放长寿湖后，他们也不与我往来。我要探亲不批，说我没有家。那些年，只有一个人同我通信，这个人是我解放前的朋友，《中国学生导报》的发行人，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叫甘祠森，饥荒年他还给我寄过粮票，是我得到的唯一的关怀。

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家，说来话长。在复旦时，我春风得意，与戴文葆等创办的壁报《夏坝风》很有影响，不少女同学对我很有意思，我心高气傲，没有理睬。毕业后全身心投入报社工作，没心思成家。解放后，两次恋爱都没成，一次与西南师范学院一名少数民族女学生恋爱，正热乎乎，我因胡风的事被关起来，她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害怕，与我断了关系。第二次是我住院时遇上的一个女护士，我们彼此很合得来，真正情投意合，

正准备结婚，(19)57年来了，我下放长寿湖，她另嫁了人。她后来家庭很不幸，早早就去世了。算了，不提那些伤心事。

我唯一的一次婚姻发生在七十年代，只有短短几年。她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前夫是育才中学校长。夫妻俩都是“分子”。我们两地分居，她在北碚，我在市中区，婚姻名存实亡，勉强维持几年便告破裂。

从此，我没再找人，人老了，背早驼了，算了！从饥荒年父亲兄弟饿死，我这个家脉就只剩我一个，今年我86岁，我一去彻底了结。你说不幸，不幸多了就不觉得不幸，苦难多了就麻木。我今年还同友人创办了一个“小诗原”的刊物，我任社长，自费编印，也聊以自慰。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17日 地点：重庆日报社

采访后记

采访张先生时，正值重庆日报职工宿舍大搬迁，两幢几十层高的宿舍楼拔地而起，气势恢弘地俯瞰长江，眺望南山。

乔迁的职工喜气洋洋，装修的喧闹此起彼伏。

这是一个不乏银子的“效益好”的单位。在“必须了解党的声音”的行政命令下，重庆人民年年为它输血，用血汗银子换来一大堆僵尸般的文字，以及重复了一千遍的谎言。

张天授没有搬，孤零零留在乱糟糟的旧楼里。他说，新分的房子面积大，没钱装修。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

要那么大的房子干嘛？空荡荡的房间，孤零零的身影，身边，没有老伴；膝下，没有儿孙；夕阳已经沉下，黑夜正在接近。即便装修得金碧辉煌，能掩去枯藤老树，西风瘦马的苍凉？

作诗吟赋，是张老先生晚年中唯一的寄托，破旧茶几上的几朵鲜花，是杂乱房间里唯一的亮色。我请张老先生站在花朵旁，给他照了一张像，我希望这张毫无艺术美感的照片，连同这简短而又缺乏文学华彩的文字，给一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留下一点“传宗接代”的长久。

补记：张天授先生于2006年5月在重庆去世，终年90岁。

张天授当右派后仍然保持写日记和开会记录的习惯。批斗会上他也在下面作“记录”。一天，他写的20多本日记被抄出来，其中他记了女右派廖品云说过的一句话：“共产党是不讲爹妈情的。”廖当即被抓出来，罚跪一上午。事后，廖揉着红肿的双膝，哭丧着脸找到张天授：“你这个人！在这种环境下还写啥子日记？你要写就写你自己嘛，你把别人的名字写上去，害得我跪一上午！”

对党爱得要死，被党整得要死

刘 钊

1957年市文联作家，团支部书记，74岁



“当初我对共产党爱得要死，结果被共产党整得要死。”

我是武汉人，10岁时逃难，随宋庆龄办的儿童教养院到了万县。读了一年小学后，考入由国民党政府办的联合学校，这种联合学校一切费用全免，由国家提供吃穿和学费，只是抗战时期，吃得很差，条件比较艰苦。联校毕业后，我考入国民党中央大学经济系。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我大学一年级就参加了地下党的新青社，二年级担任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大学期间，我一直从事学生运动，争民主自由，反独裁专制，曾经同南京的宪兵发生冲突，受过伤。南京一解放，我就参了军，在二野的军大当教员，后来随二野到重庆。由于我能写东西，也喜欢写，因此转业到了重庆市文联，并担任市文联团支部书记。

1957年，我没有任何言论，平平安安过了险滩。1958年4月，在反右运动基本结束时，突然又来了一次“扩大化”，我就是在这时被“扩大”进去的。

我接到一封业余作者的来信，信中称，他曾给文联创作部的部长曾克（也是文联副主席）寄过一篇稿子，后发现曾X在文章中大量用了他稿子的内容。我于是在私下说过曾克窃用别人的稿子。

上面要“扩大”战果，多打一些“敌人”，曾克又是掌握反右的领导，我还有啥话说。

被打成右派的还有作家李南力（也是文联党支部书记）、党组书记龙实等。李南力当右派是因为不同意划作家黄贤俊为右派。龙实当右派是因为他主持文联反右不积极，打的右派太少，换句话说，他太实事求是。在那个年代是绝不能实事求是的，你打右派太少，你自己就是右派。这个逻辑很荒唐，却是历史的真实。

我当然想不通，解放前提着脑袋跟共产党走，对共产党爱到骨子里，忠心耿耿，共产党怎么说翻脸就翻脸？！我年轻，不仅无法认清共产党，甚至也不知道当右派是怎么回事。我以为共产党把我们打成右派，就像大人打犯了点过错的小孩，打几巴掌就算了，下放长寿湖最多几个月就会放回来。所以，下放初期我认真地改造，努力想自己是不是对不起党，在批斗会上我表示愿意认真劳动改造，请党来帮我摘掉帽子。

文革时，我开始有点觉悟，但是真正想通是“改正”后，因为这个时期才有书读，有书读才使我认真思考，这一思考就看清了问题的本质。

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小农革命，只不过这场革命用了最

动人的口号，最漂亮的外衣进行包装。什么“为了解放全人类”、什么“为了劳苦大众”、什么“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统统都是空话，其实质就是打江山，坐江山。它一旦夺得天下，必然认为天下是他们的私产，谁敢对他的“私产”说三道四，谁就是他的敌人，他就要进行镇压。因此，1957年知识分子被整，绝不是偶然，而是这场小农革命的必然产物。

毛泽东是个造反成功的个体农民，是个变态人物，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他可以将中国几千年的所有仁义道德一脚踢翻，将近代的文明、文化踩得稀烂。他要整人就整到底，绝不手软半分！他哪里是要创建一个文明公正的社会，哪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他只是要建立他的专制王朝，维护他的独裁统治。为了这个目的，一切手段，无论多么卑鄙，无论多么血腥，他都可以使用，而且毫无半点心理障碍！

1957年究竟整了多少右派？官方说是55万多人。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为什么不给右派补发工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补发就要算人头，财政要据此发钱，这样，右派的真实数量就会暴露出来。

除了右派，(19)57年还有各种被变相整的人。就拿长寿湖来说吧，从1958年起，前后接受了1000多名下放干部，所谓下放干部，都是些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是靠不住的人。比如刘德彬（小说《红岩》作者之一，创作有《歌乐山作证》等）所在的教育工会没打出右派来，打不出右派你本身就是右派，他这个当工会主席的就被赶下长寿湖，只是没给他戴帽子，算作“下放干部”。

长寿湖20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认为一是用奴隶般的繁重劳动摧残人，二是用无休止的批斗会折磨人。在长寿湖的劳动量十分恐怖，管教人员用竞赛、用定指标的“奥林匹克运动”方式来定每天的劳动量。指标随心所欲的涨，今天每人挑50担粪，明天涨到70担，后天可能是100担，落后就要挨打，完不成任务就挨斗，或者扣饭，完全是奴隶社会对待奴隶的方法。不少右派就是被这个“劳动关”折磨而死。



右派打夯劳动

（图片来自光碟《长寿湖我们怀念您》）

为了躲避，一些右派不得不采取种种方法。其中最讨厌的是打小报告，汇报同类的言行，换得赏赐，从而减轻劳动量。你想想活得轻松一点，可以！揭发其他右派，整同类！上面鼓励这样干，逼得你只有损害同类。所以，长寿湖不少右派你揭发我，我告发你，你斗我，我斗你，搞得人人自危。

我在最受不了的时候就装病，但病不是好装的，监管人员一个个火眼金睛。我只有动真格，拔牙！我说牙痛，要请假到狮子滩看牙。回来让监管人员检查，看！没撒谎，一个牙齿没了！我的大牙就是这样拔完的，不信你看。

（刘钊张开嘴，右边大牙全无，左边缺一颗。）

奴隶劳动完了可以回家睡觉，我们不行，每天晚上要“学习”——开批斗会，而且20年不断。有段时间宿舍柱子上挂一块“斗私批修牌”，每人每天必须上面写一条揭发别人的话。比如张三写“李四今天（或昨天）说，长寿湖的鱼自由自在，令人羡慕。”

李四可能写“王五今天在坡上唱国际歌，奴隶们起来起来，别有用心！”搞得右派人人自危，一收工就赶紧朝“斗私批修牌”跑，看有没有人揭发自己，有，便作好准备，晚上批斗会时，首先要承认，没有的事最好也承认，然后自己把自己痛骂一通，这样才过得了关，否则不准睡觉。

自己骂了还不算完，其他右派还得一个个起来批判，再把他骂一通。而且搞连坐法，某人有问题，与他接触的，尤其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人，都有问题，更得起来揭发、批斗。实在无话可说也得找话说。有一次李淦斗孙静轩，找不到话说，他只好说：“孙静轩，你这个人坏得很，无耻得很，反动得很，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对新社会不满……我们被你欺骗，你实在是坏得很，无耻得很，反动得很，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对新社会不满……”李淦厉声批斗孙静轩十几分钟，翻来覆去都是这些话，管教干部终于听得不耐烦，一拍桌子说：“李淦，你说点实际的！”有一次我斗詹光，也是无话可说，我干脆飞快说一串没有标点符号、连我自己都听不清的语言，我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嘴皮翻得飞快：“詹光你呀唔哼反动你这个人詹光哼不老实那天晚上唔你抗拒改造你詹光不认真嘛……”



农场开会（陈华摄）

想起来真是荒唐呀！每天晚上张三斗李四，李四斗王五，王五又斗张三，你揭发我，我揭发你。有一次教师右派向光棣实在看不下去，批斗会上悄悄写了首打油诗：“今日我斗人，明日人斗我，为人宜宽容，何必太过火。”结果被旁边的一个右派发现，马上举手报告，“有人写反动诗。”向老师立马被抓上去立起，连续斗了他三个晚上。

这种没完没了的批斗会，对人的精神和心理摧残特别大，斗新华书店的右派胡朝聘时，他吓得尿流了一裤裆。在长寿湖，经常遇到这种事：一个批斗会后，长寿湖就要浮起尸体。重庆42中的教师林振笃，宣传部的干部李思强就是在斗争会后的当夜投了湖。

采访时间：2001年6月14日 地点：重庆市文联

采访后记

刘钊患了脑血栓，三天两头进医院，约了好几次，才得以相见。

一见面，他就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我，然后冷冷地说：“你年轻，没经过那个年代，你来搞这个重大题材，我怕你把握不稳。那段历史，复杂呀。”

我从小喝共产党的狼奶长大，骨子里有几分“红卫兵”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刘钊这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无知就是力量。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那点浅薄的“历史”知识，包装在我十余年讲台上练就的语言功夫中，对着“学术权威”，不知天高地厚一阵乱侃。

嘿，不知是我花拳绣腿来得密集，还是刘钊患了“脑血栓”有些糊涂，总之，半小

时下来，那冷冷的目光变暖了，那张脸也不再居高临下。

我们越谈越投入，待他扯开嘴唇，让我看他为求得休息而拔掉的大牙时，我那“红卫兵精神”荡然无存，整个人在他面前软下来。

两个多小时后，正渐入佳境，刘钊语言开始紊乱，思绪似乎也变得迟钝，他看出我的困惑，很抱歉地说：“药效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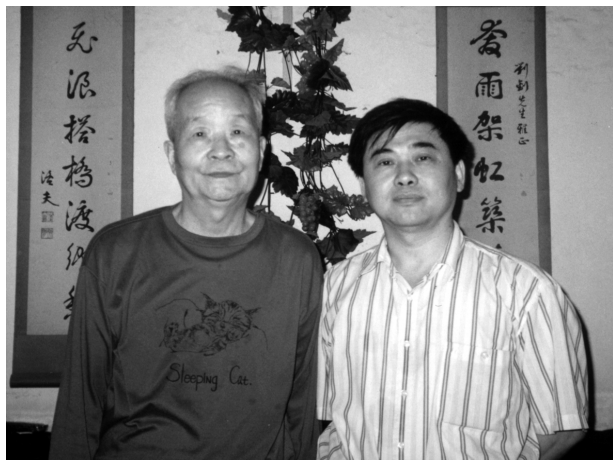
——刘钊为接待我，专门服了药，药效只有两个多小时。

我赶紧起身给他照像，然后收拾包，准备走人。他拉住我，要求同我合一张影。他把夫人叫来，我们一起照了张像。照完像，他叫我等一下，然后走进书房，从里面取出他发表的几篇有关长寿湖的文章和几篇手稿。

“你拿去吧，给你作参考。我作为一个作家，很多没有写，现在身体不好，很多又没给你讲，是个终生遗憾了。”

我很仔细、很慎重地把稿子放进包里，同刘钊紧紧地握手告别。

（可惜，2002年7月2日，这些稿子全部被重庆市国家安全局抄家时抄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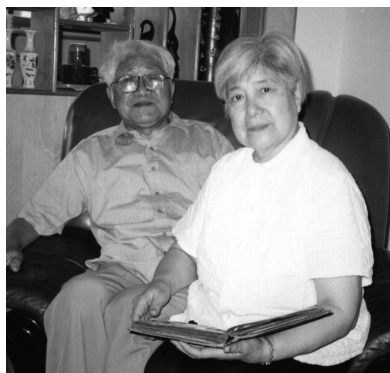
刘钊、谭松合影（2001年6月14日）

一对夫妻记者的遭遇

韦鼎、黎素芳

1957年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

韦鼎 1923年生，黎素芳 1929年生



韦鼎：我们夫妻俩 50 年代都是新华社重庆分社的记者，我们在工作中相识、相爱、结婚。1957 年，我们已经有三个小孩，老大 6 岁，老二 2 岁，老三 10 个月。

大鸣大放期间，我提了几条意见，其中一条针对社长廖 XX。廖 XX 夫妇都是十四级干部，工资相当高，但他却自己给自己加补助，拿更多的钱，我认为这样做不对，在群众中影响不好。一个领导干部，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

这条意见，把廖 XX 惹火了，他一步一步地收拾我。

他先翻我的历史，一口咬定我是假党员，解放前混进党内的坏分子。他组织大字报烧我，开批斗会斗我，先把我搞臭。

黎素芳：廖 XX 亲自找我谈话，他说：“小黎，有件事我不得不把真相告诉你，你的丈夫是个假党员，他解放前的历史很复杂，证明他入党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国外，我们可以断定他是个阶级异己分子……”

廖 XX 坐在我面前，很严肃很认真，他就是组织，他就是党。那个年代我非常单纯，认为组织最可靠，党最可信。我想，党组织一定是通过调查，掌握了韦鼎解放前的真实情况才会这样说。我心里好难受，我很爱他，感情很深，但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编造自己的历史呢？我回到家里对韦鼎说：“你不是党员就算了，对组织讲清楚，承认错误，我们安安心心过小老百姓的日子。”

韦鼎：廖 XX 接下来以劳动锻炼为名，安排我去南岸一个干部农场。三个月后，他又说，你暂时到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几个月，回来后继续工作。我到长寿湖三个月后，廖 XX 以新华社党组的名义，给农场去了一封公函，通知农场将我监督劳动（即作为坏人），并且停发工资，只发生活费 15 元。我傻眼了，我并没被划为右派，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境地的？

黎素芳：廖 XX 来动员我同韦鼎离婚，他告诉我，离不离不是个人的生活问题，而是忠不忠于党，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他还说：“你看人家周邦坤（新华社右派王华东的妻子），丈夫一划右就离了，这就很好嘛，你要向她学习……我精神压力大得很。要我揭发韦鼎，我不晓得他如何反党，说不出，批判我，说我右倾。开会时我给另一个右派王华东倒了一杯开水，就是划不清界线，也要批判我。不离婚，更是一条罪行。我对韦鼎有感情，舍不得，但看到三个孩子，又担心他们的前途。我是一边哭，

一边写离婚书……

（黎素芳泪流满面）

韦鼎：我坚决不同意离婚，法院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纸判决书送长寿湖。我把判决书狠狠摔到地上。

黎素芳：离婚两年后，我被调到重庆二十中学当老师。那是最困难的日子，我独自抚养三个儿子，儿子正吃长饭，饿得哇哇叫。

饥荒年有一种糠做的饼子叫“糠复元”，儿子舍不得一口吃完，每次只咬一点点，不料化学教师的儿子看见了，翻窗进来把“糠复元”偷走了。我大儿子很懂事，很关心两个小弟弟，有一次他捉到一只大青蛙，舍不得吃，煮起一锅清水汤，把青蛙煮了，分给两个弟弟吃。

有人见我日子艰难，劝我再找个人，我不干，我这辈子就算了，不愿再当妻子，只想一心一意把母亲当好，把三个娃儿养大。

韦鼎：1960年，我在长寿湖打二锤，每月19斤粮，没多久全身浮肿，头脑糊涂了，尿拉在裤子里。我们睡通铺，早上醒来，身边经常有人永远起不来。有一个从南桐转来的语文老师，叫崔永禄，捉到一条毒蛇，他饿急了，连内脏都不取，宰成几节胡乱煮了一下就往肚子里吞，转眼中了毒，他在地上滚来滚去，死得很痛苦。是我亲自埋的他，埋在桐梓沱。他那个枯瘦狰狞的面容比蛇还可怕。还有一个叫马成敏的右派，又病又饿，一头栽在猪圈里断了气。最惨的是一个叫李刚（音）的右派，投湖自杀后尸体浮起来漂到岸边，被一群狗拖上岸，撕咬得支离破碎。那个姓吴的党支部书记无动于衷，他冲着一个个发呆的右派说：“长寿湖没盖盖子，要跳的尽管跳。”

长寿湖发现我不行了，让我回家探亲，我离了婚，彼此连信都没有，要探只能探浙江老家。没路费不说，我也不愿父母见我这个样子，我想，我不跳湖，气要断就断。

1961年，我到湖边一个生产队劳动，在一个荒坡上种了一些红苕，当年产了几百斤，那几百斤红苕救了我的命。

从死亡边缘走过来，特别想去看一眼儿子和黎素芳，这条命说不定哪天就由别人来埋了。五年来，我怕影响他们，不敢同他们通信，我带了几张娃儿的照片，天天看。我要是死了，他们不会晓得。

1963年，我给孩子买了几个高价饼子（五角钱一个）回到重庆，我已经整整五年没见到他们。

他们已经搬了家，我找到新家，黎素芳不在，只有几个孩子。两个小儿子不认得我，冲我叫：“叔叔，把你那个纸烟盒送给我。”

这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感到不安，呆了不到两小时就走了，没有勇气等黎素芳回来。

黎素芳：我见到韦鼎时又过了五年——1968年，他第二次回重庆。

他提了一条大鱼，有二三十斤重，到二十中找我。那年重庆武斗打得凶，我带几个娃娃逃到了大溪沟。二十中一个右派老师告诉他，我住在马家堡，他找到马家堡，没人，



韦鼎、黎素芳结婚照

到处打听，最后在大溪沟找到我和孩子。

孩子们看见这么大的鱼，高兴得不得了，围着鱼团团转，但是不叫他爸爸。我不敢说话，我已经被划为四类分子，又回来一个五类分子，政治压力大。从1958年分手，我们10年没见面了，但是我不敢留他，心里怕得很，怕有人去汇报。我们在外面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他闷闷的灰溜溜的不说话，饭一吃完扭头就走。我一直盯着他的背影，他没回头，我想他心里一定很难过，10年了，有家难归，好容易见面，不敢住一晚。他背影消失在黄昏里，我泪水往上涌，但孩子在旁边，我拼命忍，忍……

（黎素芳第二次泪流。）

这次见面，唤回了我对他的全部感情，而且，还增加了很深的怜悯。我忘不了他在黄昏中独自离去的背影，他太可怜了。当年我离开他是为了孩子，离婚后孩子仍然受歧视，别人骂他们是反革命子女，同没离一个样。我大儿子考初中，不准他按成绩读好学校，只准读最差的民办校——我们叫板板校。他的班主任王老师为他哭了，我也哭。我想，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离？

还有，这时我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我非常单纯，压根没想过共产党会整人，毛泽东会整人。他们在我心中很神圣：解放全中国，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文化大革命让我清醒——原来共产党毛泽东要整人！

我决心要帮他！

我到处找人，我到成都去找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孙振。孙振告诉我，韦鼎的档案是清楚的，说他是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没有任何实证，整他的材料上只有廖XX的一个个人私章。孙振承认这是个错案，但是他说，韦鼎的事出在1957年，1957年不好改，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还有，川东地下党的案子很多，改了韦鼎一个，其他人来闹怎么办。所以，干脆不动。

从1968年起，又过了五年，1973年，韦鼎第三次回渝探亲。这次我实在不忍心再看见他无家可归。

韦鼎坐在家，我把弟弟和大儿子叫到外面的山坡上，问他们怎么办，留不留他。弟弟说：“姐夫是个好人，把他留下来。”大儿子也说：“妈妈，把爸爸留下来。”

他们表了态，我当然很高兴。

当天，韦鼎没有走。

韦鼎：我终于又有家了！从1958年到1973年，整整15年，小的两个儿子不习惯，不叫我爸爸，只叫“他”、“他”、“他”。

黎素芳：当年暑假，我到长寿湖去同他复婚。这是我第一次到长寿湖，他到狮子滩来接我。一眼看见他，惊呆了：他破破烂烂，疲惫不堪，站在那儿像个流浪汉、叫花子（乞



“那时我非常年轻，没想到共产党、毛泽东会整人。”黎素芳1958年

巧)。他身上穿那件府绸衬衫，还是我1957年给他买的，又旧又烂，补丁加补丁，大热天，脚上穿一双裂口的全胶元宝鞋，下身是一条破旧的劳保裤（后来才知道是一个下放干部扔了不要的），我坐在车上，当场就哭起来。

到了团山堡，看到其他“分子”个个跟他一样，都是破破烂烂。他们回渝探亲，穿的是最好的衣服。

在团山堡，我住了一个暑假，亲眼看见他们劳动，我心都碎了。韦鼎从湖边扛大包上山，腰压得弯成直角，像个动物在地上爬，就像我在电影上看见的非洲黑奴。

（黎素芳边说边跳起来演示，她伏下身子，双手向后朝上伸直，一步一步挪动脚。）

我不知道他15年过这种日子，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

韦鼎：其实，那个暑假我过得非常幸福，有家了！

黎素芳：从长寿湖回来后，我继续上访，跑成都，我要洗清他的冤屈，救他回家。

整他的廖XX文革前调到成都。他整人的恶习不改，到文革时，前前后后被他打成各种“分子”的有10余人。文革一来，他自己也被整，亲自尝到了被斗、被下放劳动的滋味。

他不向我们道歉，他看见我来上访，赶紧避开，尽量躲着不见面。他妻子林XX这时也尝到当一个“分子”家属的痛苦。在成都，天冷了，我穿得单薄，她抱了一抱衣服，来到我住的招待所，非要把衣服给我。我当时心里满是怨气，坚决不要，全部退给她。

10年后，1984年，我同林XX在育才中学又见面了，她是育才中学的学生，回来参加校庆。她给我送来10个广柑，很诚恳地说：“过去把你们整得很惨，很对不起。我们都是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老廖后来自己也挨整。”我冲着她说：“那不是一天、两天，而是10年、20年呐！那些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男人平白无故污陷我男人，他差点儿死在长寿湖……还强迫我离婚，害得我们夫妻分离15年。我一个人拖三个孩子。你也是女人，你也有家庭……”

林XX突然哭起来，边哭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她一哭，我也哭起来，我们两个痛哭一场。

分手时，她要把广柑留给我，我不要，她坚持要给，最后我们一人分了五个。



黎素芳与儿子（左边被剪掉的就是韦鼎——为“划清界线”）



“我终于又有家了”

采访时间：2001年5月16日、2002年1月8日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采访后记

一大早，挤上中巴，从杨家坪赶往江北。412路中巴车清一色的破烂，一路上黑烟突突，

走走停停，抵达江北，已去了一个多小时。

没人知道新华社的宿舍在哪儿，左右两边乱糟糟的建筑工地正在闹哄哄地搭建城市“物质文明”。

待我终于在韦鼎老人面前坐下，抬眼一望，墙上的钟已指向9点40。

我急切地望着老人。

刚开了个头，他妻子黎素芳倏地从厨房里奔出，三两步奔到面前，噼噼啪啪抢着说，一边说还一边不时地表演，十分生动，当然，说到伤心处，泪水滚滚涌出来。

我蓦地惊觉：一个“分子”家属所遭受的苦难，不会亚于“分子”本人。

果然，为丈夫的苦难痛哭，为儿子的升学痛哭，也为另一个女人的道歉痛哭。一个漂亮女人最美好的年华，就在涟涟泪水中过去了。

该怪廖XX吗？也许该。黎素芳说：“去年廖XX带口信来，向我们夫妻问好。他可能有悔意，但我不原谅他。他不是在大气候下的无奈，而是因私利蓄意整人，这是个品质问题。”

这话自然有道理，但我总想起20多年前在杂志上读到的一首诗，大意是：海浪啊，你们，你们都是些风的俘虏……他用沙哑的声音发出一阵咒语，你们如痴如狂，扑向同类，把厮杀当成欢乐。……广阔的海洋，变成角斗的广场，拼杀到岸边，什么都没留下，只有眼泪组成的泡沫……

是哪一股风，专门煽起人性中的恶？



1973年韦鼎回到家全家合影

长寿湖学历最高的右派

王华东

1957年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1918年生



王华东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山大学教书，任讲师。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49年底进入新华社。

新华社要我去主要是看我德文好（我学哲学读德文原著），打算派我作驻德国记者。后来发现我出身不好，改变了主意，把我下派到新华社重庆分社当记者。

1957年我根本没鸣放，一直在外面采访，当时我采写和发表的稿件很多，受到总社的表彰。

我当右派是因为一个人——廖XX。

廖XX是新华社重庆分社社长，他在市委书记任白戈组织的鸣放会上提出“报人办报”，这在当时是典型的“不要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论。他受到市委宣传部的批评，十分紧张。他想通过积极打右派来解脱自己。还有，新华社要大打几个右派出来，他廖XX自己也跑不脱，他非找几个人下手，我是其中之一。

按规定划右派要报市委反右五人小组批，廖XX没上报，以新华社重庆分社的名义处理我，下放我到长寿湖劳动锻炼。

周邦坤（王华东之妻，毕业于北碚乡村建设学院）：我当时刚生了小孩，但我还是支持他去，我想他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下去劳动锻炼一、两年有好处，我做了一朵大红花到朝天门去送他。哪晓得两天后就说他是右派，是阶级敌人，压我同他离婚，我不干，把我从重庆电台贬到江北纺织厂。

王华东：我们还是离了。我下去新华社只发给我每月8元生活费，我闹，加到15元，当然无法养家活口，唯一的女儿是妻子独自养大成人，1979年我俩复婚时，女儿已经22岁。

我在长寿湖18年，其间也回重庆“探亲”，所谓“探亲”无非是回重庆住几天，不能见妻子女儿，住在旅馆里，看几眼重庆这座城市又回岛子上。我的精神寄托是记日记，我把所见的，所思的都记在日记上。例如文革中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我觉得很可笑，宇宙的奥秘无穷无尽，人的认识很有限，哪来“句句是真理”？我记在日记上。还说“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说这种话就是不懂历史，也不懂马列，他读的书少得很。罗马帝国灭亡了，奴隶主和奴隶一起灭亡——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把这些都写在日记上，厚厚的几大本。当然是偷偷写。日记还是被发现了，

全部被组长李 XX 收缴，李这个人很“左”，我知道大难临头，白永康因日记被判死缓的例子摆在前面。嘿，我运气好，正在这个时候出了林彪事件，幸亏出了林彪事件，我逃脱一难。

那几大本日记，很可惜。我后来讨要过几次，没结果，你要有兴趣，可以去找找他。

1976 年我从长寿湖回到新华社，在伙食团当炊事员，两年后摘帽，调到收发室。再过一年获得“改正”。这时我已经 61 岁，过了退休年龄，唯一的收获是当年复了婚。

采访时间：2001 年 10 月 27 日 地点：成都市陕西街

采访后记

在重庆听说王华东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到成都，孙静轩说，王华东在长寿湖近 20 年，很惨。

我抱了很大的希望叩门。

一位个头不高的老人打开了门，他“嘿嘿”地笑着把我安坐在客厅。他表情有些木讷，语言显得迟钝，毫无我想象的学者风度与气韵——这就是我采访的学历最高的长寿湖右派？

是 83 岁高龄的自然成因，还是长寿湖近 20 年的改造使然？

接下来的采访更让我失望，仿佛齿轮生锈的机器，我费尽移山心力，勉强摇动，吱吱嘎嘎。其间，还有他妻子的多次“仗义”相助。

专攻历史，想必洞悉秋月与春风；研读哲学，自然不乏深邃与透彻。我问：“王先生，你是学哲学与历史的，回想你走过的这一生，你对这个社会 and 这段历史有什么看法？”

王华东又“嘿嘿”地笑了几声，喃喃地说：“现在比以前好，嘿嘿嘿，社会进步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嘿嘿，比较自由了，嘿嘿嘿”。

日本电影《追捕》中，酒井把他要整的人一个个送进精神病院，强迫服一种摧残神经的慢性毒药，把人变成丧失自我意识、惟命是从的痴呆。共产党也有这种慢性毒药，专治知识分子，药名叫“思想改造+劳动改造”。

中国最缺乏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整得最惨的也是这类知识分子。王华东先生无疑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人才，王华东先生无疑蕴含有独特的思想和超群的才华（就是在短暂艰难的采访中，我也感到他隐隐闪烁的思想火花。），然而，正值盛年，惨遭“腰斩”，几十年的痛，一定很深。

虽然，他对此只字不提。

同王华东握手告别，他又“嘿嘿嘿”地一笑。

我沿着洒满秋阳的人民南路边走边想：我若是如王先生一样走过那段人生，在 83 岁时回望这个社会，这段历史，会不会也发出“嘿嘿嘿”的笑声。

面对这个“万般无奈”，“嘿嘿嘿”也是一种“人生哲学”？！

补记：王华东先生于 2008 年 12 月在成都去世，终年 90 岁。

我因“不爱说话”当了右派

殷宗炳

1957年重庆日报编辑



我1952年重庆大学英语系毕业，分配到重庆日报工作。我这个人一向不爱说话，尤其在陌生人面前。1957年报社专门把我作为不爱说话的典型，选为代表，去参加新闻系统的鸣放会。那时我很年青，懵懵懂懂，不懂什么政治，把平时在报社道听途说的一点意见杂乱无章地扯了10来分钟，心中想，随便说一点完成报社的任务。这10来分钟，换了一顶右派帽子和长寿湖23年。



毛泽东题写的鼓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没家室，少了很多牵挂和压力。我在长寿湖体会最深的不是挨饿，不是劳动，而是随时随地对我们人格和人身的凌辱。管教干部任何时候都可以找个理由，（甚至不要理由）把我们抓来斗。改右学习班的主任孙重最喜欢斗人，只要几天不斗人他就浑身不舒服，他经常说：“对右派分子就是要狠狠斗。”我私下说他：“三天不整人，走路无精神。”

我本来就不爱说话，在长寿湖更不吭声，但是要整你你跑不脱。说一句：“太阳太大，热得受不了。”要挨斗，说是影射毛泽东共产党。说：“天变了，阴下来了。”也要挨斗，说是指望变天（翻案）。两个右派吵架，一个说“咱们哪个怕哪个？”，抓来斗，说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右派到狮子滩劳动，小娃儿都可以随便辱骂随便欺侮，我们不敢吭声。排队打饭，掌勺的见是我们右派，让我们站到一边，等到最后才让我们吃饭。有一个“革命职工”经常偷东西，只要上面追查起来，他就往右派身上推，说是右派偷的，因为右派不是人，没有申辩的权利。我们报社有一个很有才华的编辑，叫廖忠管，英文、俄文都很强，

在长寿湖时，总工会下来的一个勤杂工成天把他当狗一样的骂，廖精神高度紧张，后来精神错乱，在六十年代初死了。

但是长寿湖的“历反”（即“历史反革命”）的地位比右派还低，曾经有人揭发一个“历反”，说他“冒充右派”。

（女“历史反革命”刘文秀就说过“我好羡慕你们右派。”在采访中遇到这类“历反”，

至今胆子都很小，不肯多谈。)

在长寿湖 22 年，我没有出卖过人，没有出卖过良心，哪怕跪在煤炭渣上挨斗，我也没有乱说。上帝也许是为此奖励我，在我 44 岁那年（1975 年），让我娶了一个好妻子。她是一个 20 多岁的郊区农民，非常贤慧、非常能干。她一点不嫌弃我，她对报社的领导说：“我不管他右派左派，我只知道他是个好男人。”她把家料理得整整洁洁，手特别巧，你坐的椅子就是她亲手做的。

可惜她去年去世了。

（殷宗炳黯然神伤，不再言语。）

采访时间：2001 年 6 月 21 日 地 点：重庆日报社

采访后记

殷宗炳很不情愿地给我开了门。

一进门，他冷冷的目光盯着我上下打量。我气沉丹田，脸堆艳笑，先讲了一大堆热乎乎的话。

他勉强开了口。然而，正如他所说，他不喜欢说话，尤其是在陌生人面前。22 年的苦难史，他总共只讲了半个多小时。

讲叙时，他眼睛不时朝上看——我身后的墙上挂着他刚去世的妻子的遗像。他也不时朝下看——我身旁的小包里正在录音，这骗不过搞编辑记者出身的他。

他是不是想征询妻子的意见：该不该给这小子讲那段历史？

他久久凝视妻子的遗像，我看见泪光闪烁。

我关掉录音，向他伸出手。



因真话惹祸，靠假话获益

金践之

1957年重庆日报副刊编辑



我是1948年在重庆南陵学院读书时加入的共产党。那时我对现实社会不满，读了大量的新华日报。报上大声谴责一党专政，呼喊：“民主、自由是救国的唯一途径！”我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认为中国要走向民主、自由、光明、富强非共产党领导不行！

解放那年我进了共产党的专政部门——公安局。

我在那儿没干多久，一年多吧。我本是书生，对成天刀刀枪枪，砍砍杀杀不适应。更主要的是当时杀人很多，我经常看到被杀的人临死前扯着颈子喊冤：“指导员，指导员，我实在冤枉啊！”那神情非常凄惨。我弄不清是真是假，反正神经受不了。我申请调到市委办公厅，当了一个秘书。

在公安局时我弄不清楚真假，在镇反运动中我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我作为办公厅的秘书到江北区审阅镇反材料，在那儿我发现，原来杀一个人如此随便！

说随便，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材料一报上来，当地主管书记一支笔就可以判死刑，不准任何申诉。至于那个材料究竟是不是事实，没人过问。例如，材料上说，此人负有命案一条，那么就判杀头。至于是不是有命案，或者说怎样负的命案则不管。还有，将某人解放前说的话，或做的事，生拉活扯搬到解放后，构成现行反党，现行反革命，不杀头也是重判。至于把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拔高放大成反党反革命，就更是普遍现象。我从基层回来后赶紧向市委领导汇报，说下面的材料问题多，存在着严重的粗制滥造宁左勿右的现象，希望赶快纠正，救一些无辜。我说完后那位书记一言不发。第二天我便受到严厉批评，说我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犯了右倾错误，同时停止了我审材料的工作。

我的思想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感到满腔热忱迎来的这个新社会有些不对劲。解放前我只是一味追求民主自由，并不知道新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解放后看到一群农民队伍来改造知识分子，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我们地下党出身的知识分子，很不适应。拿小的说吧，吃饭分等级，穿衣分等级，看戏看电影分等级。开会，地师级吃小灶，县团级吃中灶，我们吃只有一盆菜的大灶。另外，以没有知识文化为荣，以不讲卫生为荣。身上长了虱子被喻为“革命虫”，是艰苦朴素的象征。总之，我觉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苦闷，觉得毫无民主自由平等可言。

我开始写杂文，我还有热情，还想提意见。市委副书记李 XX 作风霸道，又没水平，开会照秘书稿子念，我写杂文，暗暗讽刺他。

1956 年，我实在不想在官场上呆下去了。紧跟李书记，顺溜拍马，当然有前途，但我不愿意。我申请调到重庆日报当了个副刊编辑。

报社总编辑贾唯英和支部书记詹光比较赏识我，因此我的日子过得还顺畅，杂文一篇接一篇出。1957 年，我的第一本杂文集即将出版，我高兴得很，在家校对清样。

正在这时，鸣放变成了反右，报社从总编辑贾唯英起，一棍子打出一串右派。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说真话就是这种下场呀！我赶紧刹车，首先将杂文集中我认为有“问题”的文章删除，然后守口如瓶，作老实状。

可是，李书记记得我！

李书记一个电话打到报社，只一句话：“金践之还在写稿？这种人还不是右派？！嗯？！”

1958 年，我下放长寿湖。我没有成家，只有一个母亲。我离开报社后，报社把她赶出了报社的房子。母亲成天为我担心，常常通宵哭泣。她在街上只要看见背影像我的人，就不知不觉地走上去，一看不是我，就站在大街上流泪。她还跑到烈日下去暴晒太阳，想体验我在长寿湖顶着烈日劳动是什么滋味，看我受不受得了……

（提到母亲，金践之眼睛潮湿了。）

反右这根棍子把我打懵了，也把我打醒了——原来新社会听不得真话，容不得真话。既然如此，要生存，那就说假话吧。

我到长寿湖后开始说假话，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应。党说，公鸡会下蛋，我就说，是，我亲眼见。这一招，非常灵，我很快就被认为是思想改造的先进分子，不仅第一批摘了帽，还当了捕鱼队队长。这可是个肥缺，劳动相对轻松自由，还有鱼吃呀，这些都是靠说假话得来的。什么劳动改造思想呀，什么转变立场观点呀，做社会主义新人呀，只要将说真话改为说假话，将正直不阿改为吹牛拍马，就行了。

在长寿湖十几年，我既没有挨饿，又很少挨斗，如果劳动太辛苦了，我就装病，而且总能从医院里搞来病假条。在长寿湖各色“分子”中，我日子一直过得滋滋润润。我反复对詹光说，何必要同共产党硬顶，认个错，低个头，少吃亏。

詹光坚决不干，他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党误会了他、冤打了他，一定会给他平反，他要坚守气节。

我 1979 年“改正”后又开始写文章，第一篇就是杂文，而且又是影射“领导”的杂文，这次针对的不是李书记，而是毛泽东。（注：从那以后，金践之一发不可收拾，一篇篇杂文泼辣犀利，其中如挖苦各地抢购“官太太”的杂文就被全国十余家报刊转载。）当然，“改造”的威力也巨大，同是长寿湖右派，有的人“改正”后第一篇文章就是吹捧毛泽东。有的“改正”多年后，还在四处演讲“社会主义优越性”。

采访结束时我问金践之：“你因写杂文惹祸，后说假话受益，“改正”后为什么还要写杂文？”

金践之：“主要是骨子里一直渴望说真话，说假话是迫不得已，心理上很难受。被

整了20年后，更有话想说。回想共和国这几十年历史，有很多话想说……我们悲剧的根源在于没有民主。这又回到我解放前当学生时的追求上去了。这个执政党狂热地提倡阶级斗争、阶级仇杀，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我记得1953年镇反时有个内部文件，要在各大城市把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全部扫荡完，还定了一个杀人指标。在那次镇反中，国民党区、乡以上干部几乎全被杀光。1989年“六四”运动之后，市委书记肖秧在全市一次干部大会上说，当年共产党杀光了国民党的区乡干部，现在你们是共产党的区乡干部，你们不坚决拥护共产党，保住无产阶级江山，一旦丧失政权，你们一个个就要人头落地。

我听了这段话很悲哀，为什么我们的政权更换一定要大开杀戒，后一个政权杀前一个政权的人，当政的人又怕后一个政权来杀他。美国社会为什么就没有这种现象。我想，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民主，一味搞暴力革命，提倡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非要镇压，非要杀人不可。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采访时间：2001年5月24日 地点：重庆日报社

采访后记

我从小就认识金践之。有段时间，他天天到我家来，笑咪咪地向我们几个娃儿问好，接着便埋头写字。

家里只有一张木方桌，既是饭桌，也是书桌。我们几姊妹做作业当然要用，金践之只得坐在床沿上，扭着身子，把纸铺在我奶奶的一口破箱子上。每到吃饭时，他就收起纸笔，笑一笑，出去了。待我们饭后，他又返回来，继续伏在破箱子上。留他吃饭，他坚决不肯。多年后回想起那一幕，隐隐有些心酸。

1989年6月之后，我一时失去了方向，困惑和痛苦中，写下几篇小杂文，寄给在重庆日报当编辑的金践之。金看在难友之子的份上，把我那些稚嫩的文字删删改改之后，一篇篇发表。就这样，我偏偏倒倒走上了文学写作之路。

采访金践之，老熟人，十分自然。然而，搞新闻工作的他，火眼金睛，一眼就发现了我包里的袖珍录音机，搞得我十分不自然。

金有理论水平，有文学才华，并且对这个社会看得很清楚，一点不含糊。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心存恐惧；正因为如此，他知道如何行事——风浪小时，拿起笔做刀枪，揭露社会时弊，嘲讽专制丑恶；一旦云黑雾冷，他便刀枪入库，退隐南山。

不知这算不算“敢于战斗，善于战斗”，或者说，同强大的“天”抗争时，这也是一种策略，符合“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战场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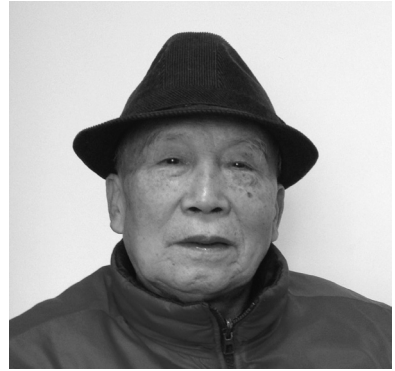
在中国，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在风沙肆虐，刀光寒冷中奔走狂呼的勇士原本十分稀少。如果能将“以假话（或空话）保护自己，用真话打击敌人”修炼成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而不内化为一种无奈的人格分裂，也算是一种抗争。

金践之至今孑然一身，没有妻室儿女，这也是1957年带给他的后遗症。退休后，他不愿住在城里，独自住在乡下一家敬老院。

杀人与划我右派，就这么简单

杨正秋

1957年四川电业工人报记者



目睹血腥杀戮，我想逃脱，但什么叫在劫难逃，我就是在劫难逃，走到哪里都难逃恶运。

我是四川合川龙市镇人，我的外公粟和林是个兽医，我父亲是个医生，他中西医都不错。

我十多岁时，去读合川师范学校，当时读师范一分钱都不收，吃饭都是国家拿钱。我正是因为没钱才去读的师范，背个箱箱就去了。培养老师应当国家拿钱，解放前都这样，现在收钱没得道理。

1950年2月1号，我在合川龙市区（也叫第九区）人民政府当了脱产干部，做恢复农村村小（学）和组建农会的工作。那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时期，是土改的前奏。

我组织宣传，作记录，作记录就是公审大会上他们讲地主的罪行，我负责记录下来。审判长宣判“罪大恶极，宣判枪决”之后，我就在“判处枪决”上打个勾勾。这就像旧时戏里的判官一样，阎王在上面宣布，要把哪个打下去，判官就勾个布子。杀一个人我就勾一下，我就是那个角色。

我当判官角色的时候，有一次，在龙市小学镇压所谓反革命，实际上是杀地主。那一次一下就杀了十几个。杀了之后我们还要一个个去把耳朵提起看，是不是杀死了。当时我就觉得太残酷，那些人并没有什么罪恶，哪能这么干？而且，那些杀人的打手都是些地痞流氓。当时组建民兵，选哪些人呢？要选胆子大的、会用枪的、成分好的。什么叫“成分好”？叫花子（乞丐）成分就最好。当时讲成分，贫农是没有田地的，而叫花子更穷。其实这种人都是些好吃懒做、地痞流氓之辈。他们一无所有，乱整乱搞，中共就信任这种人，就利用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才下得了手，这是共产党的一贯传统。现在电视上都看得到，共产党起家，就是把什么土匪武装呀、地痞流氓等组织起来搞革命。打国民党时就把土匪、地痞流氓组织起来对抗。

这些地痞流氓民兵，他们杀人前把子弹在石头上磨，然后冲着人脑打。子弹是铜壳壳，里面是铅，铜壳壳一磨薄了，子弹打进人脑就会把脑壳打开花，当时叫“敲沙罐”——把人脑壳像沙罐一样地敲得稀烂。有个叫任笃青的地主，他是我的邻居，他的脑壳被打开了花，只剩一点山羊胡子吊在下巴上。他的后人就是凭这点山羊胡子来认的尸。我看到这个场面，觉得这样杀人要不得，这样搞下去要不得，太残忍了！

还有，我的一个堂叔杨希伯，他虽然有点地，但他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他也被抓到杀场。他在下面眼巴巴地把我盯着，那个眼神是问我能不能救他。我怎么救他嘛。我看到那双眼睛，难受呀！那天没有杀他，他是被抓去陪杀场。那个陪杀场被杀头还可怕，杀死了就算了，但陪杀场的人目睹和经历的一切会深深印在脑子里，可怕得很。我堂叔陪了杀场回去，当天就疯了。

当时，凡是有点知识、有点财产的，都逃不脱那场劫难。我的两个舅公（我外公的两个兄弟），都是医生（中医），他们被抓到仓里关起来。在仓里，他们相互勒对方颈子，双双勒死了。

土改那个血腥场面我看不下去，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合川的原因。

我给领导提出，我想出去深造。

那个区长还不错，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埋没了，他开了条子，让我去重庆市干部招生委员会。我来重庆后，遇上市委组织部的马建中（音）在招生委员会，他留我在委员会工作。后来我到了西南革命大学学习，学完后又随马建中到渣滓洞清洗反革命。清洗反革命，就是把一些所谓有问题的、混进革命队伍的人集中到渣滓洞，我们去一个个地“清洗”，然后把他们送进监狱。再后来，我又随市委宣传部的王若搞三反五反运动。运动结束后，我调到了重庆市总工会。

我喜欢写作，成了重庆市青年作家，我在上海萌芽杂志发表的一篇重点文章《川江夜话》，当时很红了一把。我被调到四川电业工人报当编辑，实际上干代主编的工作。

1957年，重庆市委宣传部召开新闻编辑座谈会，我作为报纸负责人之一去参加了。会上说，中宣部要求，明天各大报纸要组织重点文章大鸣大放。我们当然听党的话。当天我就到西南电管局找到局长采访，并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吴局长呼风唤雨，电管局揭沟露墙”。

当夜，文章用通栏标题发表并印了出来。第二天早上发报纸时，四川电力工会主席贾飞龙（音）看到之后说：“小杨，这个报纸暂不发了。”我觉得奇怪，昨天下午才开会，叫我们要按照中央指示大鸣大放，怎么又不发了？我去找到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张文澄，他看了报纸后说，你可发也可不发。我回来对贾飞龙说了张部长的意见，他说，那就不发吧。我们那时很听领导的话，于是那期报纸就没有发出去。嗨，这就是我后来当右派的依据和罪状！反右时把这份没有发出去的报纸找出来，说：你这是铁证，你说我们党与人民“有沟有墙”！

划我右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只有32开的一张纸，油印的，上面没有任何公章，只有党组书记丁长河盖了一个章，拿给我看：你被划成右派了。

就这么简单。

1958年3月15日，我们总工会第一批16个右派被押送长寿湖，开始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

当右派后，我也曾困惑，我原本是忠于共产党的毛派呀，这是无端地把我往敌人那边推。我们被打下去之后，全是那些吹牛拍马的人当家作主，这种人恰好对党不忠诚，

只是投机。还有，如此这般整知识分子，整良知精英，党的这种作法是否正确？秦始皇焚书坑儒自古以来就是被批判的，没有谁认为是正确的。后来听到看到喊毛主席万岁，每天那么朝拜，我更是不解。那个“万岁”是封建的东西，哪有共产党喊自己的领袖万岁的？哪有像皇帝那样朝拜的？

在长寿湖，我算年轻的，到了捕鱼队。记得第一次出航就是在暴风雨中。选这种天气，就是要让我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那时划船还不在行，风把棚都吹翻了。我的船号是71，船要沉了，我想，我今天要死在这儿还很光荣，71是党的生日。

这时，仿佛是本能地，我把橈片往右边一拐，船头就对着风浪了。这下就好了，风浪就不容易把船打翻了。我这才领悟到，遇到大风大浪时，首先要把船头对着浪头。这无意中的举动救了我一命。

第二次是我同高志长、杨光瑜一起到凌风去拉柴米，我拉中杠，我个子小，又没拉过，结果下坡时控制不住，连人带车冲下岩去。高志长、杨光瑜认为我肯定没命了，结果我运气好，一根杠子插入土里，断了，另一根没断，我刚好位于中间那个三角形空处，只折断了两根肋骨，命保住了。

还有就是我到了养鱼队后，冬天要下水，我因此感冒发高烧，二工区的医生治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医生认为我没救了。结果一个农民给我挖了几付草药，又把我救过来了。所以说，我这个人命长。

在长寿湖我看到饿死人，那个悲惨景象我记忆犹新。人走着走着倒下去，在地上抽搐一会才落气。

有一次，我从飞龙划船出来，半途口渴了，看到岸边一家农户，我上岸讨水喝。门是关着的，我推开一看，全家人都饿死了，五个！老的小的，他们相互抱在一起，唉呀，惨不忍睹！还有，当时农民穷得很，也有一次，我也是去讨水喝，一推开门，妇女没得衣服穿，光着身子，两个奶子直晃荡，我慌得赶快转身就走。

中国知识分子被逼到绝境上，求生的本能还是很强。但长寿湖不少知识分子就不行，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知识分子。我行，我老家就在河边，我从小就会钓鱼，我小时候，农村河里、沟里、水田里鱼多得很，那时不像现在，生态没有被破坏，出去不一会就能捞一大堆鱼。那时农村不容易饿死人这也是一个原因，它能自生自养。最困难的时候，很奇怪，长寿湖的鱼也是饥不择食，岸上的人没有吃的，水里的鱼也没有吃的。岸上土里没有营养，水里也没有营养。鱼也得“水肿”，“水肿”就是鱼没得肉了，成了一条干壳壳，它见什么都吃。我钓鱼蚯蚓都挖不到，用什么钓？大粪！把大粪裹在勾上甩下去，鱼饥不择食，一口咬住，很容易就钓上来了。

我说说我妈妈。我妈被迫嫁了两次，那个痛苦就不说了，虽然她嫁了，但她对我一直是挂念的。她当时在农村，她听说儿子被打成了右派，在我最困难最饿饭的时候，她到长寿湖来看我。她看到我那个样子，拉着我的手，只是流眼泪，不说话。直到晚上，她才说了一句话：“这是命，没有办法。”我对她说：“没什么，妈，我会挺过去的。”

后来，她把全家人（包括我在重庆空压厂工作的妹妹）节省下来的粮票寄给我，共有40斤。结果，当粮票寄到长寿湖后，遇到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40斤救命粮票

成了废纸！（关于四川省宣布粮票作废一事，详见本书《那4斤八俩四川粮票》一文。）没多久，我妈妈死在了农村。

我是1964年调回重庆的，这主要是我老婆哭诉的结果。

我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到工业部去哭诉，她说，我实在活不下去了，你们要把我男人调回来。他们看到我老婆又哭又闹，加上当时上面政策有些松动，于是就同意了。这样，我就从长寿湖调到了我老婆工作的地方——重庆六棉厂（第六棉纺厂），这是1964年4月。

我当时好兴奋，以为脱离苦海了，家人也团聚了，没想到，六棉厂比长寿湖还痛苦！

在长寿湖，大家都是右派，但在六棉厂，几千工人，全厂只有两个右派。那个日子就难过了哟。一有风吹草动，就把我拉出来斗，站到桌子上，喷气式斗。还有，我在每天劳动（推车）8小时之外，还得义务干活——爬到厂房架了上去打天花——因为棉纺厂灰尘很大。星期天还要被叫去打扫清洁，冬天被叫去挖臭泥塘，挖了之后再开会，检讨自己的罪行、忏悔。文革时更精彩，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都要到毛主席像前去请罪，不断说：“我有罪。”还有，上班的时候挂个牌子，上书“摘帽右派”；下班后要在手臂上带个笼套，上面也标明：“摘帽右派”，很是侮辱人格。

我在重棉六厂16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工人加了好多次工资，我一次也没加，一直是25块5。

斗得太多了，斗到后来，不仅我，连我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习惯了。我挨斗后回到家，两个孩子安慰我，还说，我们也来表演给你看看。他们把我的黑牌子挂在身上，表演斗我的场景，还哈哈大笑。

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我的家人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的两个孩子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可惜，我的儿子杨力没有看到我平反昭雪的那一天。我最感到悲伤的就是他。

我打成右派时杨力还在他妈肚子里。所以他出生之时没有见到光明，1977年，他19岁半，得了心肌炎。那时文革刚结束，医院工作还没完全恢复正常，有些医生都还没有归队，他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他1957年出生，1977年去世，这20年，正是我当右派的时期，他没看到我右派改正。我最悲痛的就是他，出生时他没见到光明，死时也没有看到光明，一生都在黑暗中渡过。他死后我写了一首诗，记得第一句是：“五七生来辞七七”。

我儿子死前，一定要见他姐姐，当时他姐姐在农村当知青，他硬是挺着等到他姐姐回来他才落的气。他姐姐目睹弟弟的死，束手无策，就在那一刻，她下决心今后要学医，要抢救生命。这就是她后来考入医学院，成了一名医生的原因。

我现在这个儿子，是我杨力死后生的。当时老毛死了，国家有些松动，好像要给右派平反了。这个时候，厂方才觉得这些年实在对不起我，他们主动来找到我，问我老婆回了没有，还生不生得出娃儿。我老婆还没回经，于是厂里专门下了一个指标：你再生一个。这是共产党良心发现，给我的所谓的恩惠，也是第一次对我补偿。（第二次补偿是给了我380元的生活补助，这就把扣我20多年的工资了结了。）

回想这一辈子，我为了逃避土改的血腥，来到重庆，结果当了右派。什么叫在劫难逃，

我就是在劫难逃。长寿湖6年，重棉六厂16年，我总共劳动改造22年。

采访时间：2015年2月5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美专校街

采访后记

我第一次知道长寿湖右派杨正秋，是2000年看到他的长篇小说《陪都夜雾》，而正式采访他，已经是在14年之后，这个时候《长寿湖》一书已经印出来三年多了。

在一次聚会时，我偶然听他说，他当年参加过土改，正是因为受不了那种残酷血腥，他才离开农村到了重庆。想到土改的经历者已经十分稀少，我当即表示想去拜访他，由于彼此已经很熟习，他马上就同意了。十多天后，我走进了他的家门。

老人是作家，有思想、有见解，他在讲完他的经历后，还发表了一些“评论”，比如他说：“共产党一直搞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从建国初期起都这样，清匪反霸，过份了。土改为什么不可以用和平手段来处理？杀地主，那么残酷，完全是人为地制造阶级矛盾，硬是非要制造一个敌对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可。共产党人为地搞阶级斗争，结果是伤到自己。还有当初对资本家的“对资改造”，为什么要那么整所谓的资本家？现在不断在发展个体经济，发展经济还要依靠他们。如果那时不把人家的财产收了，让他发展，现在会怎样？是当时错了还是现在错了？”

提到那部小说时，老人说：“当年我只做了一件没听党的话的事，就是没有交出我当右派前写的稿子。几十年后，我根据当年的稿子，写出了长篇工运历史小说《陪都夜话》，并在1999年出版。这是中国首次用小说形式写工运史。”

老人还告诉我，他后来以散文的形式写了那段历史，有几十万字，可惜，家中的保姆没文化，以为那是一堆废纸，一把火烧得精光。

保姆被辞退了，书稿也没有了。



采访结束时，老人说：“我们这个国家，中国人民苦难深重，中国知识分子苦难深重，我希望历史不要忘记我们，希望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年的苦难，我希望终有一天会还原那段历史。”

报社、文化界部分右派简况

1、邓林之死

邓林——重庆日报最年轻的右派，肃反时被冤枉挨整，鸣放期间他对此提了意见，由此划为右派。到长寿湖后他一心一意劳动改造，想挣得领导好评，早日摘帽，回到“人民”的行列。他自我改造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1960年饿得奄奄一息仍拒绝妻子的救助，他退回她寄来的粮票和包裹（食物），对她说：“你不要影响我的改造！”由于劳动积极，改造认真，他当了组长。当组长后，他“左”得离奇，像奴隶主的监工一样监管其他右派，干活不准丝毫偷懒，不准偷任何东西吃。他组里的右派一个个叫苦不迭。他本人最后饿得受不了，偷吃了一把生绿豆，结果自己被批斗。邓林不仅身体垮了，而且精神有些错乱，不时喃喃自语：“改造，改造，一定认真改造。”终于有一天他跳进了长寿湖。由于身上穿的棉衣，一时没沉下去，被人们捞了起来。自杀有罪（抗拒改造之罪），因此，他被湿淋淋地捆起来扔进黑屋。第二天打开房门，他已死得冰硬。

2、颜北岩之死

颜北岩——重庆日报记者，四川大学毕业。下放长寿湖后，他被迫与妻子离婚。1962年他以为要落实政策，可以与妻子复婚，不料下半年阶级斗争风声又紧，颜希望破灭，精神绝望。1962年在同心岛的一次批斗会上，他讲自我改造，从与妻子假离婚到真离婚，说着说着突然说：“我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秘书，专为他写稿子……”在那次批斗会上，颜北岩神经失常了。

他妻子非常爱他，主动要求到长寿湖，希望一周见他一面，结果每见一次面就挨一次斗，最后只好离婚。颜太爱他妻子，离婚也是导致他精神失常的原因。

1963年颜北岩回渝吊死在报社的一棵树上，终年30多岁。

3、帅左瑶之死

帅左瑶——重庆日报右派，1961年饿死在长寿湖。死后由郑汉生与另外两名右派抬到一条山沟里掩埋。没有棺材，仅有一床席子裹身。帅蓬头垢面，瘦骨狰狞，双眼生满了蛆。一名下放干部叫郑汉生等搜他身上有没有钱。

郑汉生：“我目睹了帅左瑶死的惨象，在心底恨恨地发誓：这辈子绝不能死在长寿湖！”

4、廖忠管——重庆日报编辑，1957年因感叹“新社会”人情冷暖而被划为右派，1961年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

5、刘新加——荣县人，1922年9月生，中学文化，重庆日报“三好右派。”刘曾任《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校对。刘1957年不多言不多语，但一次在读董时光的文章时，连说三声：“好”、“好”、“好。”不久，董时光被打成大右派，刘为说三个“好”

字被打为右派，在长寿湖，他因此被人称作“三好右派。”

6、曹岳霖——重庆日报记者，右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去世。

7、靳叔威——山东人，1923年3月生，大专文化。重庆日报右派。靳当右派后全家（包括五个娃儿）下放长寿湖。子女在邻封读小学，因父亲的问题一直加入不了少先队。靳叔威2003年9月去世。

8、贾唯英——重庆日报总编，右派，1994年7月去世。

9、张定华——成都人，1927年3月生，大专文化，重庆日报记者，重庆日报社右派。妻离异，有三子。在长寿湖近20年。

10、文履平——合川人，1925年6月生，大学文化，重庆日报记者，重庆日报社右派。

（重庆日报社在1957年划了近20个右派，其中包括总编贾唯英、党支部书记詹光。另外划中右和开除党籍的有几十个人。除了送到四川峨边劳改的极右外，下长寿湖有14人，其中5人死于“改正”前。）

11、张晓——广东人，1921年4月生，大学文化，作家，重庆市作协右派。

“一顿吃16斤3两”——关于张晓的一个故事

1961年的一个冬日，张晓劳动回来，收到家里寄来的一个包裹。他捏了捏，估计是吃的，便躲开他人，独自钻进厕所。厕所里漆黑，张晓撕开包裹，一股葱油饼香味扑鼻而来。张晓大喜，他原本最喜欢吃葱油饼，何况是在饥荒年。但是，他刚刚吃了三两饭，有些不忍“浪费。”

葱油饼的香味压倒了一切，包括厕所里的其它气味。张晓决定吃一个。不料，这一吃就收不住嘴，一个、两个、三个……一斤葱油饼全下了肚。

张晓心满意足地回到宿舍，点亮煤油灯，开始看妻子的信。当他读到“我们千方百计省下15斤粮票，舍不得用，同葱油饼一块儿寄给你”时，全身一震，粮票？哪儿有粮票？！张晓翻身就往厕所跑，打开电筒反反复复地寻找。

粮票无影无踪。

“我一定是吃得太猛，把粮票和饼子一块儿吃下去了。”张晓想。

当夜，张晓翻来覆去，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跑到“天灾岗”（“消灭资产阶级山岗”），找了一块好地，蹲下，全身使劲，然后在粪便中细细寻觅。如此三天，一无所获，张晓终于绝望，失魂落魄地对其他右派说到此事。那些饿得面黄肌瘦的右派们听说后羡慕不已，连连说：“好哇，好哇，张晓，你一顿吃了16斤3两。”（即三两晚饭，一斤饼子，十五斤粮票。）

张晓于“改正”前去世。

12、刘盛亚——重庆市文联右派，著名作家，早年留学德国，抗战爆发后回国，任四川大学教授，文协成都分会理事，创办“针贬时弊，讴歌抗战”的《文艺后防》月刊。1941年在重庆创建《群益出版社》任总编辑，出版名家系列著作，并写出《夜雾》、《再生记》等多部作品。1957年划为右派抓入四川峨边劳改，于1960年死于劳改地，终年45岁。

13、李南力——重庆市文联作家，右派。1939年到延安，曾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9年后曾任《红岩》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重庆分会副秘书长。

于1970年病逝，终年50岁。

14、温田丰——重庆市文联右派，情况不详。

15、游黎——重庆市文联作家，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成都去世。

16、刘星火——重庆市文联“坏分子。”文革时在大邑县弯丘五七干校被整死。

17、洪钟——重庆市文联“反党分子”？

18、余薇野——重庆人，1924年11月生，大学文化，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右派。妻子同为右派。

19、吕琳——陕北出生的老干部，右派，四川省美协画家，去世时间不详。

20、汪子美——四川美协著名漫画家，右派，下长寿湖后又去四川峨边劳改。

21、高龙生——四川美协著名漫画家，右派，“改正”之前去世。

22、杨济川——四川美协著名国画家，右派。

23、岑学恭——四川美协著名国画家，右派。

24、宋克君——四川美协版画家，右派。

25、杨鸿坤——四川美协画家，右派。

26、刘慕宇——自贡人，1921年12月生，大学文化。1959年1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办事处（编辑室主任）打成右派，1986年2月6日去世。

27、王文琛——夹江人，1922年12月22日生，大学文化。1958年在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副主任）打成右派，1987年6月11日去世。

28、聂云岚——江津人，1922年11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出版社编审，作家，1958年在重庆人民出版社打成右派，1994年12月16日去世

29、黄幼林——重庆市出版社右派，文革前病死。

30、刘运暄——重庆市出版社会计，右派，饥荒年因半夜偷食堂馒头被抓去劳教。刘2003年去世。

31、李岱林——涪陵人，1929年6月生，中学文化，重庆市出版社右派，2006年去世。

32、叶穗——重庆市出版社右派。

33、刘时雨——綦江人，1929年7月生，重庆市新华书店右派。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34、卢仲秋——营山人，1925年7月生，初中文化，重庆市新华书店右派。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35、龙培云——宜宾人，1929年1月生，高中文化，重庆市新华书店右派。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36、余光华——重庆市新华书店“坏分子”，1960年病死长寿湖。

37、胡朝栋——重庆人，1932年5月生，初中文化，重庆市新华书店右派（与去世的胡朝聘是兄弟右派），在长寿湖近20年。

38、胡朝聘——重庆人，1925年1月生，中学文化。（原中华书局店员）1957年在重庆市新华书店被打成右派。

39、杨德明——綦江人，1934年2月生，重庆市新华书店右派。

40、陈先齐——江北县人，1933年11月生，高中文化，重庆市新华书店右派。独身。

41、李进秋（音）——重庆市新华书店“坏分子”（因未婚同女友睡了觉）。李2001年去世。

42、刘宗钦——荣昌人，1929年3月生，高中文化，重庆市新华书店右派。（与廖品云组成长寿湖又一对夫妻右派）于2007年去世。

43、覃奇才——重庆市新华书店右派。

44、文英——重庆市新华书店右派，1961年饿死在同心岛。

45、王相成——重庆市文化局戏剧改革委员会右派，解放前曾与老舍一起工作过。1957年他没有鸣放。一天叫他站起来交代问题，他一站起来就说：“我从旧社会来，有罪，有罪。”斗他的人说他老奸巨滑，他连连承认：“是，是，”一心想求平安。但是，他仍然被划为右派，1961年去世，终年约65岁。

46、黄必康——重庆市文化局党办干部，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右派。

47、刘梨——重庆市文化局文艺科干部，1957年划为坏分子，1960年饿死于长寿湖狮子滩。

48、陈应善——重庆市文化局文艺科干部，爱唱歌，娶了比自己小得多的年轻妻子，被认为是勾引诱惑女青年，划为“坏分子”。本人和父亲（山水画家陈漫漫）不服，强烈表示不满，由此被重判入狱劳教，新婚妻子与之离婚。

49、徐文彬——重庆市博物馆右派，书法家。

50、陈敏戎（女）——江津人，1924年2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电影公司右派，丈夫离异。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51、秦开端——重庆市电影公司右派。

52、韩忠良——江苏人，1925年5月生，初中文化，西南服务团入川，1959年3月在重庆市电影公司打成右派。有妻（劳教三年）。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53、蔡治奎——重庆市体委右派，1949年后重庆第一代篮球运动员，1996年9月15日去世。

54、王余——重庆市文联诗人，右派，下长寿湖后又转送四川峨边劳改。

55、李若愚——重庆市文联编辑，散文作家，极右，送四川峨边劳改。

56、罗泗——重庆市文联诗人，极右，送四川峨边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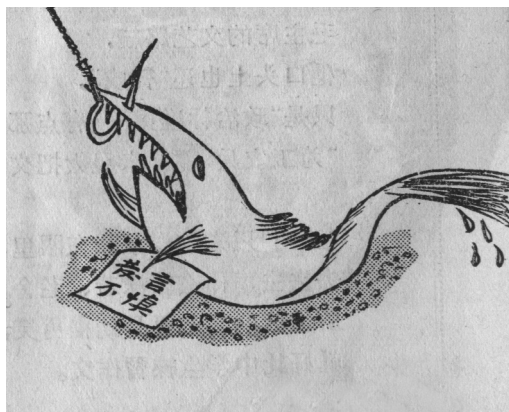
历史到今天，共产文化肆虐泛滥，横行百余年，祸乱华夏，是我们民族悠久历史中最野蛮最血腥的一页，它对维系我们的文化的摧残、蹂躏可谓前无古人，怕也不会有来者，它竟把实话、正派当成大敌，它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诚实，残杀正义，它五十多年的统治竟让民族论落到无理可论的地步，竟使整个国家陷于黑社会的恐怖，使政权成为野蛮的摧残力量。

——孙丰

五、海外归来

1949年，一个崭新的王朝横空出世！
芸芸海外赤子，捧一颗滚烫的心，跨越万里风尘……
几十年过去了，苍茫大地，乱坟凄凄，荒烟袅袅……
几个幸存者，吁吁残喘，抚遍体伤痕，满面泪迹。

1、熊明鑫 2、张志荣



1957年反右漫画

搞什么航天飞行？喂猪去！

熊明鑫

1957年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1923年生



你来挖这段往事，哪个说哟，我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我真的是不想提呀。

抗战时我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后来又考入无线电通讯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在飞机上搞通讯导航，不久，我就成为该公司的技术骨干。

中国航空公司在1949年时，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排在美国PIA航空公司、英国BOC航空公司之后。大陆解放时，中航一片混乱，1949年底飞到香港机场的飞机就有上百架，大量的中航职工聚集在香港。当时主要有三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到台湾、留香港、回大陆。此外还可以到世界各地，那时飞行人才在全世界都是抢手货，我们中部分人就被一些国家用高薪挖走，例如，英国挖了一些人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中航近3000人中，约有500人选择了回大陆，我是其中之一。

我为啥回来？当然有原因。

我经常跑国际航线，到过近20个国家，亲眼看到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情况。我认为祖国强大，海外华侨才有地位，在外面流浪总不及呆在自己的祖国，我的技术肯定能为祖国服务。还有，我虽是搞技术的，但也有点历史知识，我那点浅薄的知识告诉我，开国皇帝总是比较好的，奋发向上的。共产党能够打败强大的国民党，一定有它先进的道理。还有，1945年我在重庆机场见过毛泽东，听过他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亲切，宽厚，开明，而且很有才学。他提出要联合，要共商国事，要政治协商，我非常赞同。总之，那一次毛泽东给我留下的印象好极了。1949年10月，我在香港读到他在开国大典上的致词，读到“共同纲领”，我激动得很，觉得中国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走上富强、民主、光明之路。我才26岁，人生路还长，不为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效力，还到哪儿去效力？

1949年11月9日，12架飞机载着53名机组人员（包括中航的经理），突然从香港升空，穿云破雾直飞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两航起义。这事不仅国民党没想到，美国没想到，就连共产党也没想到——天上突然掉下来12个馅饼！

中航的职工，除了那随机的53人外，陆陆续续返回大陆的有50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留在了重庆，共产党刚刚执政，西南地区航空人才奇缺，我成了宝贝，不仅马上被录用，而且进入了专门接送邓小平、贺龙等大人物的专机组。

我们当时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只是共产党最初承诺的高薪和用美元支付没有兑现。我每月只有100多元人民币，只当我1949年之前三个小时的飞行津贴。我们回来的

人中，有 100 多人因此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或世界各地。

我没有走。我回来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祖国强大，我自以为自己能干，能做出贡献。但是，我不久发现一些问题。

1952 年，叫我们捐款支援抗美援朝，大家都有觉悟，都自愿捐款，我们不到 100 人就捐了 48 万，买了三架飞机，两门大炮。但共产党要我们捐款的方式不对。他们给我们算帐：你在中航干了多久，应当有多少钱，所以，你起码应当捐多少。而且还来硬的，比如说某人交了多少，你也得交多少，某人钱全部交了，你也得全部交，不交不行，搞得不是像是捐款，而像是逼债。在那次捐款中，我们一起回来的有两个人，被逼得没有退路，上吊死了。我的家底比较厚实，我爱人叫杨世华，她哥哥杨少华是中南空军司令，蒋介石直升机的驾驶员。1949 年前我家属于富有阶层，捐款前，家里还有不少黄金和美钞，到捐款结束时，除了还剩点首饰，基本上洗空了。

捐款给我心上投下一点阴影，但没有影响我工作。新中国的航空业刚刚起步，太需要人了。我训练飞行员，举办学习班，开辟新航线，一年到头在外奔波，忙得不亦乐乎。周恩来出访万隆的飞行我提供了气象数据，中缅国际航线的开通是我奠定的基石，我还为贵阳民航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1956 年我被评为民航全国优秀员工，刘少奇亲自给我授了勋。

1958 年是我人生路上的“滑铁卢。”

前一年的整风、反右虽然搞得红红火火，但我一点没参加。为啥？一个字，忙！

1958 年，重庆市领导认为，民航中有人来自旧社会的中航，这些人在外面日子过得十分滋润，薪金极高，为什么“人往低处走”，甘愿回大陆拿低薪？说不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虽然一时没有线索，但不妨分配两个右派名额，敲山震虎，防患于未然。这样，市里专门拨下来两个右派名额。

那天，民航政委亲自上门来找我，请我对民航工作提点意见。我正忙，没空说话。政委见我实在抽不出身，就说，不要紧，等你空点了我派车子来接你。

几天之后，我到政委办公室，说了几句心里话，包括三方面：

一、培养新生力量要注意知识面，不能只强调出身。

我提这个意见是基于惨痛的教训。例如，1951 年我在成都负责培训 13 名女飞行员（因为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有女飞行员），这些女学员按出身好——雇农（贫农都不行）；政治好——中共党员；身体好三条标准从部队里选拔。三条中唯独没有文化标准，我们训练时，费尽移山之力。由于学员文化太低，一个小时能完成的训练，花十多个小时都达不到要求。折腾下来活脱脱报废了两架宝贵飞机，那发动机和配件是美国货，当时根本配不到。这个想法（即选拔注重知识），我在 1952 年曾当面给朱总司令提过。

二、希望今后考虑配备懂业务的副局长。

民航的飞行和管理的工作，技术含量很高，我们的局长、政委等都是军队干部，他们打仗行，但搞航空外行，我不同意外行领导内行，我记得刘少奇就说过，我马列主义水平再高也开不动飞机。局长不懂业务，我们中层干部很难处，没有决定权，但要承担责任。向局长请示，他不懂，说我们认为行就干。干得好自然相安无事，一旦出了问题，领导（当

时叫首长)可以推说他不懂业务,责任全在下面。我们中好些人因此被判刑,而且一判最低六年。所以,我提出在党领导全面的前提下,最好配一名业务副局长。

三、希望提高民航干部的待遇,因为当时实在太低。

我提这几条意见,政委连连点头,样样同意,很把我感动了一回。

哪晓得转眼就变脸!共产党我摸不透,红脸白脸眨眼变。后来在长寿湖,管教人员教育我们说:“形势变了政策就要变。”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因此我们管共产党的政策叫“月亮政策”——天天不一样。

我这三条意见都有回答:一、污蔑工农学员,以技术权威要挟党组织。二、想篡党夺权,自己当业务副局长。三、梦想恢复旧社会资产阶级特权生活。

这几条罪状把我惊呆了!告诉你,从那以后到现在40多年,我再没提过任何意见。

公平地说,西航并不想一棍子把我打死,原因是我的技术。我担任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统领十余个科室,50多号人,负责整个西南地区的飞机导航与通讯。还有,这些年来,我是怎样在干,他们应当看得清楚。

发放名额的重庆市“首长”非要完成任务,他们一状告到省委书记李井泉门下,李井泉马上将民航局长和政委找去,说了一句话:“两个右派都处理不下去,是不是要我报到中央去批?!”

抓我,采取了军事上的突然袭击。那是1958年4月的一个晚上,一辆军车突然开到白市驿机场,把我抓上车,押往位于大巴山深处的通江劳改农场。

我当然不愿把这事告诉父母,但是我有两个娃儿,儿子七岁,女儿五岁,我一走,他们怎么办?我不得不写信回武汉老家,请父母来重庆把孩子接走。

妻子?她在1957年因病去世了。说到她,我心里很难受,她194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医科大学。结婚后,我一直在外忙,很少回家,更说不上照顾她。她弥留之际我从成都匆匆赶到医院,她躺在病床上,双眼睁着,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俯下身去抱她,非常伤心,旁边的医生、护士在流眼泪。后来我才知道,抱她的时候,她已经断气了,但是她的眼睛没有闭,我在她的遗体前站了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望着她。至今我都觉得对不起她,怀念她。

再说那封信,正是那封信断送了父亲。

那几天父亲心情正好。老友董必武先生发来通知,接他进京做点事。他行李已经打点好,喜滋滋准备进京。他收到我的信,坐在藤椅上品读。信还没读完,他突然大叫一声:“这个杂种不争气!”他头一歪,倒在藤椅上。家里人赶紧把他抬到医院,脑溢血,已经没救了。

在大巴山劳动四个多月后,重庆把我们接回来,准备转到长寿湖。这个时候,大跃进在全国展开,民航也要大跃进,要在15年内赶超英国。他们觉得我正是可用之材,不必发配我到长寿湖,只需要把我“阉割”一下——保留“拉磨”的力气,去掉“传宗”的功能,用他们的说法,叫“政治上打倒,技术上使用。”

我不干,我是头犟驴,宁愿受惩罚,也不愿被阉割。我跑出来,自己买船票去长寿湖。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有力量搞航空,可以不依靠美英把新中国的航空业搞上去,我就是为此回国。后来我们中很多人离去,我也有去香港的机会,我不走,也是为了这番事业。但是我决不以一个“分子”的身份来干事业。

我到长寿湖后，劳改名单中没有我，农场不接收，不给我安排住处。我铁了心，找到一间教室（当时还在放暑假），将几张课桌拼拢作床，然后跑到农场的养猪场，挽起袖子就干活。白白送来一个劳动力，猪场居然不要。我不管，天天去宰猪草，也不多说话，操起菜刀，“通、通、通”一阵猛宰。时间一长，人混熟了，养猪场终于收留了我。

这年我35岁，开始长达20年的长寿湖生活。

我当右派后，只发9元生活费，后来按市政府规定发18元，1962年加到30元，一直到1979年“改正”后才恢复原工资。饥荒年我全靠卖首饰，一件接一件卖，卖了就赶紧买吃的，1952年没捐走的那些首饰救了我一命。

但是，我个子大，消耗多，还是饿得全身浮肿，1960年，管教干部孙重看不行了，开恩特批我回武汉老家养病。

（在我采访的所有长寿湖右派中，熊明鑫是唯一提到孙重好处的人。）

那个时候，武汉条件相对四川好一些，关键是我呆在母亲身边，她像护理婴儿一样护理我，把家里和能搞到的好东西全部给我吃，几个月时间，我又恢复了人样。

我该回长寿湖了。头一晚上，母亲流了一夜的泪，她怕我又要挨饿，在长寿湖活不出来。

第二天，母亲和姐姐送我到江边。

船拉了汽笛，要开了，她这才放我的手。

我转身匆匆朝轮船走去。

母亲一直呆呆望着我，就在我走上跳板，要登船那一霎那，她突然站立不稳，踉踉跄跄往前窜了几步，一头栽倒在地上。姐姐惊叫起来，我扭头一看，飞也似地奔回去。母亲睡在地上两眼翻白口角抽搐，已经不能言语。我与姐姐一起将母亲送到医院急救。她没有再醒来，第二天，她走了，她不会再挂念我了。

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啊，都死在我手上！

母亲去世后，我把我的两个孩子分送到姐姐和妹妹家，姐姐收养儿子，妹妹收养女儿。事情还没完，文革还有一道鬼门关在等我。

1967年，一群造反的学生气势汹汹杀进岛来，把我们拖出来跪成一排。

他们在我胸前挂一块大牌子，强迫我双膝跪在煤渣上。这次，给我定了一个“美蒋特务”的罪名，命令我向毛主席认罪。我跪在煤渣上痛得冷汗直流，突然，一个红卫兵飞起一脚踢来，这一脚狠，力量特大。我惨叫一声，向前扑出三米多远，额头在地上碰得鲜血直流。这一脚踢在我腰上，肾脏受了严重损伤，我躺在床上几个月起不来，整整拉了两年的血尿。幸亏那人穿的是双回力鞋，要是大头皮鞋，我肯定当场就报销。

他们为什么下死命踢我，原因是他们抄家搜到我当年同美国飞行员一起照的像片，说我里通外国。

那次挨打后，我把过去的照片统统烧光，一张不留。

（毛泽东也同美国飞行员照过相，那是1945年9月16日。那时毛看上去无比亲切、宽厚、“民主。”）

造反派打人不说，还抄家。我在长寿湖的“家”被抄得只剩下一件劳保服，真正成

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我身体垮得很快，1971年初，终于倒床不起。我料想我不行了，快去见我父母了，别人也这样看。管教干部郑修成来到我床边，问我有什么话要说，也就相当于遗言吧。我告诉他，这辈子我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子女，没有做一件亏心事……

然而，我大难不死，盼到了1979年的“后福。”

一天，狮子滩场部来了一辆豪华轿车，这车在当时当地极其少见，车上下两个气宇不凡的人物。场部办公室人员一看介绍信，慌了神——来者竟是地师级官员——渔场场长也不过才县团级。办公室人员赶忙把场长叫来接待。“地师级”告诉场长，他们要见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熊明鑫。

场长说，熊明鑫住得远，一两天出不来，有什么话对他讲。“地师级”表示，他们愿意等。

三天之后，我才从长寿湖最偏远的一个地方——飞龙岛划船出来。

“地师级”在场部招待所接见了，我那时已被改造成一副“熊”样。我看见桌子上放着我一尺多高的档案，里面装有我多年的思想改造汇报，每年每月的劳动评审鉴定，认罪服法表现，言论思想记录等等。

“地师级”态度非常诚恳，他对我说，当年把我错划成右派，组织上决定“改正”，接我回原单位工作。

我本来早已心如死灰，这几句话来得突然，一下子把我撩翻，我也不知为什么，由“熊”转“牛”，一跃而起，指着“地师级”的鼻子大骂：“一句整错了就算了？！，老子是二十一年冤屈，九死一生哪！”

“地师级”非常有涵养，他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来之前首长就给我们交待了，说熊明鑫同志能力很强，水平很高，但性子急。你受了几十年的苦，心里有气，骂我们，打我们，往我们脸上吐痰都可以，只是请你出了这间屋就不要再乱说了。”

这一招，以柔克刚，我伸出去的那只手垂了下来。但是，这几十年我伤透了心，民航伤透了我的心，情感上我无法再回民航。这就像一个把灵魂和肉体全部奉献，但却被无情抛弃和折磨的女人，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男人的怀抱。所以，我申请调到了重庆气象局。那时气象局的三个局长都不懂业务，我还算懂气象业务的人，能够做点事。

我进气象局时国家正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1979年我已经56岁了，因此，我自愿放弃官职，当一个一般技术人员。就这样，干了几十年退休完事。

从1949年到1979年，经过30年的折腾，两航起义的500多人已被整肃得所剩无几。文革中，仅在北京一地，便有48名起义人员被当作美蒋特务整死。那位策划并指挥了著



▲ 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红岩接见三个美国士兵

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在华美军第14航空队士兵在重庆合影

名的“北飞行动”，将12架飞机和53名航空人才交到共产党手中的潘定国，也被打断了背脊骨。若不是周恩来念他立下试航首飞拉萨之功，保他一命，这位著名的飞行员也活不下来。文革之后他去了美国。

我后来听北京的朋友讲，我当年训练的13名女飞行员之一诸XX，在林彪手下当了民航总局副局长，文革中她曾到处找我——我在训练时几次想淘汰她。北京的朋友说，幸亏我早早躲到了长寿湖，如果落在她手里，必死无疑。

说来不可思议，我两次差点死在长寿湖，但长寿湖终究救了我。

采访时间：2001年5月20日 地点：重庆市气象台

采访后记

熊先生身材魁梧，步履稳健，一眼望去，犹有当年蓝天上叱咤风云的气魄，甚至还有几分“大首长”的风度，虽年近八旬，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由此可想，35岁“下岗”时，是何等精神。

长寿湖猪场的菜刀“通、通、通”，把熊先生十八般武艺宰得稀烂，拌合他回归大陆的热忱，效力祖国的愿望，一起煮熟，倾入猪槽。

2001年深秋的一天，我登上长寿湖同心岛，这儿是熊明鑫劳动改造过的地方。我沿着一条土路往半山坡走去，四周非常寂静，看不到一个人影，凉嗖嗖的秋风扑面而来。我走到一家农舍前，一眼就看到一个大猪圈，几头肥猪在圈里拱动，吧吧嗒嗒地争吃槽食，空气中飘荡着粪水和谷草的气味。我站在猪圈旁，望着深秋有些萧瑟的山坡，感到一种远离社会、远离文明的荒寒。

吱呀的木栅圈门，潮湿的石头猪槽，一堆红苕藤，沾着泥粪……

熊先生留我吃饭，席间，他叹了口气：“我今天说了好多话，破例了。前不久有人来找我了解1945年重庆谈判的一段往事，我客客气气，但绝不多说，更不表态。电影《重庆谈判》和反映两航起义的电视剧《北飞行动》与我所了解的一些事实有很大出入，可我一言不发。不怕你笑，我被整怕了，看见一根草绳，便怕是毒蛇。我现在有心脏病，共产党再整我一次，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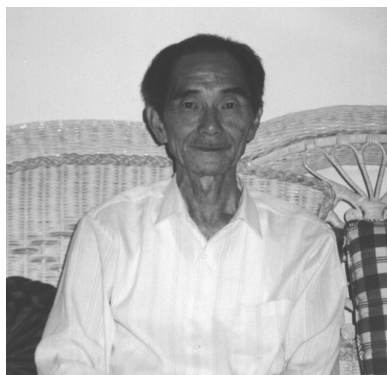


2004年5月16日，熊先生最后一次参加长寿湖右派难友聚会，在会上，他与分别了37年的长寿湖难友谭显殷重逢。一年后（2005年8月2日），这位厚道的老人永远走了。

投奔“新中国”，换来终身悔

张志荣

1957年重庆市一中高二学生



我做梦都没想到，从国外回来是这个结局，说个不好听的话，是非人的生活。人生不可能倒回去重新来过，我只有认命。

我出生在印尼，爷爷那一辈从广东漂洋过海去到印尼，我的三亲六戚都在印尼。七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我是独子，与母亲相依为命。该上小学时，日本人占领了印尼，很多中国人都不去读书，我也不去，直到日本投降我才进小学。

读到小学四年级时大陆解放。学校华人学生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新中国，一派拥护国民党。我这个人从小就关心、热心社会活动。母亲常常教育我，虽然生长在国外，也要热爱祖国，要好好做人。我订了一份大陆出版的《人民画报》，那上面图文并茂，使我对祖国、对新中国十分神往。当然国民党也在宣传，说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好。解放时，大陆出来了很多人，不少人也说共产党不好。我在心里想，共产党不好它怎么得了天下？国民党一定是失了民心才把一个大江山丢了。我当时只有十多岁，头脑很简单，但是同我有一样想法的人不少，所以，学生中支持新中国的占多数。

1955年我小学毕业，已经16岁了，我很想回国，因为这个时候我认定新中国好，共产党好。我有一个好朋友，1954年回到大陆，他走时我请他写信告诉我大陆的真实情况。为了防止在受监督的情况下说假话，我们约定，如果该信完全是在自由状态下写的，就在信底加一个符号作为暗号，如果没有那个暗号，就表明这信受到监视，言不由衷。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国民党大肆宣传共产党国家没有自由，苏联就这样干过。我朋友连来了三封信，都说新中国好，而且都有符号！所以，从第四封信起，我们又约定，既然是自由的，从此取消符号。

妈妈不放心，我把同学的信拿给她看，她问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妈妈还是不放心，她想跟我走，我不同意，我说我回去是读书，不能挣钱养你（妈妈没文化），等我毕业有了工作，再接你回国。

妈妈好不容易点了头，三亲六戚又不干，说我是独子，不能撇下妈妈孤零零的。但我去意已决。

那一批我们学校共有30多人回国，其中我们班有七男七女，我是30多人的团长。我们上的那条船有100多归国印尼华侨，除学生外还有工人农民。同时出港的还有一条开往台湾的船，上面投奔台湾的印尼华侨只有一个人。当时，我们根本不相信台湾会搞

得好，那地方小，又是个被打败的政权。大陆大，刚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朝气蓬勃的政权。另外，自己的祖宗根脉在大陆，印尼那边的人对祖宗很重视。我们这条船 100 多人，欢声笑语，生气勃勃，充满了希望。去台湾那条船，冷冷清清，很凄凉。虽然我们回大陆全是自费，而去台湾的全部免费，但回大陆的人多得多。

回国后在广州集中，两个多月下来，我对广州印象不好，不说别的，光那衣服就单调死板——清一色的蓝布。

我那时还没有见到其它城市。

我提了几个我所知道的城市，北京、天津、南京，希望到那儿去读书。上面说不行，那几个地方名额满了，问我去不去长沙，我不知道长沙在哪儿，忙去找地图。翻开地图，长沙没看见，先看见了重庆，咦，重庆！重庆我知道，抗战陪都，大名鼎鼎，居然一时没想起。正在这时，重庆市教育局来我们广州华侨补习校作报告，听了报告，我觉得重庆简直是人间天堂，北温泉、南温泉、南山、缙云山、两江环抱，物产丰富……又位于天府之国。对了，天府之国我在国外也听说过，的确是个好地方。报告一作完，当场就有 300 多人报名，我们学校有 4 个，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 300 多人编为 12 个大队，我担任一个大队的大队长，浩浩荡荡开赴重庆。

到重庆后，我们中的 100 多人分到市一中读书，我因年龄大直接读初三。由于我思想积极，工作热情高，学校任命我当了校侨生工作组的主任，上面对我很重用。

我离开印尼前，也同妈约定，写信使用秘密符号。回国后，我觉得很自由，没人监视。我给妈妈的第一封信就说，取消那个符号，用不着。

一中对我们华侨学生比较照顾，吃饭是单独的伙食，有座位，而国内的同学都是站着吃。这种等级让人并不舒服，我给校方提出，大家都是同学，用不着搞特殊。校方认为意见很好，于是，我们也同国内的同学一块站着吃饭。

学校认为我表现好，思想进步，让我参加很多活动，我是重庆市学生会成员，又是市统战部联谊会的成员。但是，会太多，影响了学习，有时我正在上课，学校派人来一敲门就把我叫走。到高二时，我明显感到吃力，学习上拖不走，压力很大。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身的“小事。”

1957 年反右与我们华侨学生无关，可是，一中被安排为一个反右的场地，1957 年暑假，全市教师集中在一中整风学习。国内学生放暑假都走了，我们华侨学生没家，只能住学校。上面认为不能让我们了解反右的活动，不能看他们的大字报，于是把我们 100 多人全部安排到北碚西师去住，我们服从了，没有多说。问题出在寒假，市教育局又把一中作为反右学习和批判的场地，要我们全体搬到市二中（在化龙桥）。当时，国内的同学很听话，领导说一不二，我们华侨学生要独立得多，有些同学不愿服从，认为自己的家就在一中，这是自己的居住权，不能被赶来赶去，其中五个同学更是坚决不走。到最后时刻——第二天教师就要进校，学校紧急派我去作工作，我当时在华侨学生中威望很高。我劝他们说，整风的事，不能外传，大字报不能让我们看，这是上级的安排，不该我们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那五个同学还是不买帐，他们说，保证不出去看大字报，保证安安静静呆在宿舍。我费尽了口舌，终于在晚上 11 点说通了他们，搬到了化龙桥。

寒假之后，校方决定给那五个同学记过。我一听，火了，找到专管我们的主任说，我们千辛万苦从国外回来，没有家，学校就是家，他们不愿意走，可以理解，而且，最后人家还是搬走了，没有影响整风，为什么要记过？另外，我还发了点牢骚，说一中有100多侨生，还有少数民族学生，为什么要一次接一次把一中作为反右场地。同时我对主任说“李主任，你管我们三年了，对我们关心太少，从没见过我们宿舍一次，我是你直接领导的下属，你就不知道我住在哪儿。”

一天，学校对我说：“你学习压力大，本人又希望多体验生活，现在就派你去体验生活。”

我从小爱好航海事业，我表示希望去青岛，那儿有大海。

校方领导微微一笑，让我收拾行李到市中区凯旋路中学集中。

在凯旋路中学，几十个人集中在一起，我都不认识，大家都不知道去哪儿。

第二天一早，上船下船，坐车，又上船，又下船，最后才知道到了一个叫长寿湖飞龙岛的地方。

我们十多个人被安排到猪圈旁的一个烂棚棚里，十几个人睡通铺，彼此一打听，他是反革命，他是坏分子，他是地主……总之，没一个“好人”。他们问我是什么分子，我说是中学生，不是分子。我当时不知道，学校已经给我定了一个“分子”——“内管分子”。

你不信？真的有这种分子，长寿湖另一个下放的华侨学生，三中的许祥娥，也是“内管分子”。

接下来干体力劳动，挑泥巴，抬石头，当然也参加学习会，批斗会，同那些分子们一样。我最令他们羡慕的是我妈在灾荒年给我寄包裹，里面有肉，肥得很，把那些右派、反革命惹得清口水长流。

我在长寿湖一直干到1962年春节。我没家，无亲可探，春节只能回一中。在一中，有人对我说：“你怎么不回来？你可以回来呀，去找领导。”

我一想，是呀，这个生活体验四年了。但是学校不表态，我找到统战部，统战部一个处长说，你要回来就回来。于是我又回到一中，接着读高三。

哎，那个日子并不好过，断了四年多的学习，跟不走。还有，我个头高，年龄大，学生不像学生，教师不像教师，到食堂吃饭不好意思，勉强读完高三，我知道自己不行了。这个时候，我心灰意冷，对重庆感到厌倦，想离开。几年前到一中的100多个华侨学生，此时连我在内只剩下七个。去三中的100多人也几乎全走光，绝大部分通过各种渠道去了香港，小部分去了广州，我们剩下的几个人也想去香港。

市统战部给我们几个人做工作，希望我们留在重庆。说是“希望”不准确，实际上告诉我们，要走不行，只有两条路：一是再读一年，二是自找工作。统战部认为华侨学生走光了影响不好，总得有几个代表。

我不想再读书了，决定找工作。

沙坪坝新华书店里有一张图片，上面是一个工人，穿着工装，戴着帽子，在一台机床前干活，那样子很神气。我一下被吸引，觉得到工厂当工人挺不错。

统战部马上同意，安排我到大坪的一家工厂。我没家，希望厂里单独给我个房间。厂里说，两个人住，另一个人只住白天。我觉得也可以。到工厂一看，那一个人是厂党支部书记，我连忙说：“算了算了，我不同书记住。”

那个时候，我对那些当官的已经有认识。

统战部又给我们联系了位于江北茅溪的红旗化工机械厂。

我们四个华侨学生一块去看。

先坐船，再爬坡，越走越偏僻，另外三个还没等走拢厂，就打退堂鼓。最后只有我一人留下来。我想，偏远一点好，我对这个社会已经感到反感。

1965年4月，我接到妈妈的信，她病重，要我一定回去看她。我赶紧打报告给公安局，说明我是独子，妈妈只有我一个亲人。一个多月里，我三天两头跑去催问，都说：“交上去了，还没答复。”这时，第二封信来了，不是我妈妈的信，是亲戚写来的，告诉我妈妈已经去世，盼我马上回去料理后事，继承遗产。我又急又气又悲伤，赶紧再写了一份报告，连同信一起交给单位保卫科，再从保卫科转到公安局。这一去又是石沉大海！印尼那边见我迟迟不动身，以为是没钱，赶紧给我寄来2500元路费。我第三次打报告，再交公安局，公安局一如既往地一声不吭，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当没这回事。我去求厂长，想请他帮忙。厂长给我一顿臭骂：“我吃饱了饭，管你的闲事。”我又急又气，同厂长吵了一场。

半年过去了，1965年10月，报纸报道印尼排华。这时，公安局终于给我答复，大意是：鉴于印度尼西亚局势不稳，为了保障印尼华侨张志荣的人身安全，出国申请不予批准。

我妈去世都五个月了，我死心了。

几个月后，文革开始，社会大乱（不知这叫不叫“局势不稳”）。我回国已经11年，经历了风风雨雨，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关心、热心社会活动的进步青年。我不想关心国家大事，只想过点安宁的日子。嘿，正像他们说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天，一排大字报直冲我而来，上面大书：“质问张志荣的险恶用心”、“张志荣为什么要积极出国？”、“宣扬资产阶级”等等，连国外寄钱来都成了搞资产阶级特权的罪证。我一张接一张看下去，越看越严重，惊出一身冷汗。

为什么要整我？因为我同厂长吵过一架。不过，这次我没伤筋动骨，因为没过多久，厂长自己就被揪出来挨斗了。

真正把我整得惨还是同长寿湖有关。

我在长寿湖认识了一个教师右派汤儒君，彼此关系不错。汤儒君后来被市教育局开除公职，放回农村劳动。在一次挖土时，汤挖到一根人骨头，他抓起骨头，顺手放在旁边的石头上，说：“大家看，一根人骨头。”他没注意到那石头上刻有毛主席语录。汤马上被抓起来，五花大绑，判为现行反革命。

抄他家时，发现我写给他的一封信，其中有一句：今天中午，我们吃了黄瓜炒花生米。他们认为，“黄瓜炒花生米”是一句暗号，非要汤君儒交待。汤交待不出，就把他装在麻袋里，吊起来往死里打，汤受刑不过，乱说一通，说那是要出国的暗号。

公安局这次行动迅速，马上来了三个人，把我抓起来隔离审查。他们认为我申请过出国，国外寄来了路费，我同右派分子有联系，肯定是要投敌叛国。罪证？罪证就从

那些大字报中去抄。斗我一通之后，把我押送到华新街看守所关起来。这一关，关了我359天才宣判。同狱室的人说，我可能要判10-13年，结果判了我5年。罪名改了，定为“现行反革命”。具体有四大罪状：1、丑化社会主义制度；2、宣扬资产阶级思想；3、梦想资本主义复辟；4、大肆鼓吹封资修。

宣判后，游街示众。我站在卡车上，挂着牌子，五花大绑。车子沿市区街道缓缓而行，一路高音喇叭呼喊口号，街两边挤满了观看的人群。我觉得自己是个丑陋的猴子，我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我神志有些恍惚，不知不觉忘了所处的环境，我想到在印尼渡过的童年、少年，想到我妈妈，想到当年一心要回国，想到自己太好笑……

我沉浸在自我回想中，没注意表情，也许我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笑，路边一个老太婆突然大声叫：“解放军！解放军！中间那个反革命还在笑！”身旁的解放军马上压我的头，勒紧绑绳。紧得惨呐！胳膊被捆得钻心的痛，只十来分钟，我就头昏，想吐。我在心底一声声地叫：快点！快点！快点！我要昏倒遭不住了！要昏倒了！

回到华新街看守所，所长都吃了一惊——我的两个胳膊变得乌黑！所长问我是不是路上不老实。我说不出口，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当晚在牢房，我心如死灰，那种悲哀和绝望无法言说。

5年的徒刑，我没在监狱里服，押回工厂监督劳改。我回厂时，头发长，胡子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当时很想照张像，作个永远的纪念，但没能如愿。

厂里是造反派当权，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服，彻底服！他们说服就好，好好改造，争取摘帽。

那个劳改可怕，我个子瘦小，竟要我抬360公斤重的东西！

几年后，我利用一次进城挑电影片的机会，去找市委统战部，那位处长还在，这时他才知道我的情况。统战部帮了忙，1972年3月给我平了反。平反时我心已经横了，我在这个国家孤身一人，没什么值得我牵挂的！我不要求补发工资，不要求什么政治名分，我只要求办我案的那几个公安人员进看守所关一年。当然，这不可能，大量的冤假错案，整了就整了，能平反就不错了。

平反后我坚决要求离开重庆，我想到广州，然后找机会逃出去，就是逃不出去也呆在其他地方。

上面坚决不准我调，那些年月回国容易出去难呀。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喝酒，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成了酒罐。

1974年，我同事的一个外婆对我说：“张志荣，我还没吃过你的喜糖。”我回答：“女朋友都没得，吃啥子喜糖。”她说：“没有哇？我给你介绍一个。”她当真给我介绍了一个。几个月后，我成了家，妻子对我很好，我这才过上了点安稳的生活。

前些年，统战部召集我们“倒苦水”，但是，规定要在说共产党好的前提下诉说点冤屈。我还能说什么？你来采访，不要以我的专题形式出现。那几十年，你没有亲身经历过，我心有余悸。今后会怎样，会不会又整人，我不知道。我不顾一切地回来，想为新中国做点事，一辈子快过完了，回想起来，说个不好听的话，是非人的生活，想起来就寒心。我本人只有认命了，但我有一个独子，我要为他着想。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9日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采访后记

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这位长寿湖的华侨“分子”并说服他接受采访。

“分子”中他算年轻的，但看上去衰弱而又苍老。

他在说“不要以我的专题形式出现，我有一个独子，我要为他着想”时，表情十分严肃。

我很同情这位不幸的老人，尤其感激他在担忧和恐惧中仍然从头到尾地向我这个陌生人讲了他的经历。我不想给他添麻烦，但是，考虑再三之后，我还是决定违背老人的意愿，把他的讲述作为“专题”。

多年前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片名忘了），其中一景印象极深：女主人翁雷娜从监狱中出来，深夜将几个孩子叫到身边说：妈妈甘愿被开除、离婚、坐牢，是为你们今后着想，想为你们挣得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挣得良好的（适合人的）生存环境”，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付出，就要让我们的“独子”们，“独子”的“独子”们去付出。

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

“你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曾有过多少冤假错案吗？”

2003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编了个《知识分子工作手册》，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大概是由于知识分子工作自胡耀邦以来一直由组织部牵头抓，该办公室为了体现组织部门工作成绩，且该《手册》的发行十分有限度，或许也是一时差错，破天荒地在第50条“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词目解释中，权威性地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

——顾则徐：中国知识分子，鱼肉耳！

《大参考》2004年10月24日

其他个别归国者简况

1、许祥娥——女，泰国归国华侨学生，在重庆市三中（南开中学）读书时被定为“内管分子”。下放长寿湖几年之后，许祥娥神智有些错乱，说了一些“反动”的话，大约在1963年被抓去劳改，至今生死不明。

黎民苏：“我最后一次见到许祥娥是在狮子滩，冬天里，她赤着一双脚，卷缩在一个大灶炉前。”

张志荣：“我为许祥娥的事找过市委统战部，希望组织出面寻找她，是死是生有个结果。但是，没人理。”

2、赖冠生——美国华侨，生长于美国，抗战时来到中国，是“北飞行动”十二架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之一。1952年被关押审查四年，1958年下放长寿湖。妻子（印尼华侨）与之离婚。他1962年调回城，在水运公司看守仓库。1979年因英语教师奇缺而进入渝洲大学教授英语，评为副教授，1998年去世。

他临终遗言是：“1949年之后，我就成了一个尿壶，谁都可以把我提去用，但又嫌我臭不可闻。”

3、袁达成——香港人，1915年生，参加1949年11月“香港起义”，是著名的“两航起义”人员之一。袁1957年在中国民航重庆站无线电机械长职位上被打成右派。

袁出生在香港，投奔大陆之前，结婚不久，有一幼女，妻子宋菊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空中小姐。她劝袁等一段时间，看看大陆的情况再说，袁不同意，执意要同其他起义人员一块走。飞赴北京前，夫妻俩在香港机场外分别，依依难舍。

袁飞到北京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然后被分配到重庆白市驿机场。不久，袁将妻子和幼女接到重庆。

1957年，袁说了一句：“你们办事太拖沓，如果是在香港，这样办事要被炒鱿鱼（辞退）。”袁因“赞扬资本主义”被划为右派，先下放四川通江劳改农场，后转到长寿湖。

宋菊珍独自在家，因容貌出众常遭遇一些麻烦（包括一些权贵的骚扰）。文革时，街道上的人把她抓出来批斗，说她“男女关系作风不正。”一次，在斗她时，批斗者强迫她女儿（中学生）上台批斗、打她，要她同“道德败坏”的母亲划清界线。

当天回家后，宋菊珍从抽屉里拿出当时十分珍贵的肉票，叫女儿上街割肉回来吃。女儿十分奇怪，妈妈此时还有心情吃肉？

女儿买肉回来，推门不开，大声呼喊，没有反应。邻舍来帮忙砸开门，宋菊珍已悬梁自尽（死于1966年）。

袁达成在长寿湖得知噩耗后，精神更加压抑。一天早上，他倒在飞龙岛的一条大船上，人们叫他，他不言不语——人变呆了！

管教干部见袁已经神智不清，便停止了对他的“改造”，将他送回了重庆。几年之后，袁与世长辞。

4、董时光——著名学者，1950年从美国归来，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1957年划为极右，抓入四川西部峨边劳改营，于1963年死于劳改营。

六、工会（厂）干部

重庆市工会和工厂里的中箭落马者：

- | | |
|-------|-------|
| 1、郑汉生 | 2、马季常 |
| 3、王廷芳 | 4、李宁熙 |
| 5、顾大鸣 | 6、范广受 |
| 7、方 奇 | 8、罗克灿 |



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陈华摄）

1957年，我憋了一肚子不满

郑汉生

1957年重庆市总工会秘书



我这个人肯定是要当右派的，跑不脱的。我个子不大，嘴巴敢说，从小叽叽呱呱，1957年也叽叽呱呱，痛快了一时，付出了一生。

解放军打下成都时我18岁，高中毕业不久，正好遇上彭德怀派来支援贺龙和李井泉的一支部队，我参了军，当了一个连队的文化教员。

在部队干了两年半，剿光了金堂地区的土匪。1952年部队上朝鲜前线，把我刷下来，嫌我个子小身体单薄。我转业到重庆市总工会，当了一名秘书。

我是很活跃的人物，个子虽小精力旺盛，尤其是嘴巴没遮没拦，叽叽呱呱啥都敢说。到了1957年，早就憋了一肚子不满：对市委的封建衙门作风；对总工会的思想工作方法；对肃反的扩大偏差；对一些党员的专横骄傲；对用人任命的宗派主义；对党的思想改造政策等等等等我都有意见。党号召我们帮助它整风，提意见。我认为机会来了，噼噼啪啪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我说市委机关像衙门，脸色难看、态度冷硬；说总工会本是群众团体，也变得官僚化、衙门化；还指责一些党员干部耍特权，说大话。我不光说，还动笔写。我公开说过：“我要看一些共产党员的丑事和新闻”。我用“耻闻”的笔名写出一串大字报。还写了一些顺口溜，例如：“X书记放大炮，X部长莫家教，XXX伸手要，XXX多骄傲”等等等等。



1950年郑汉生在一野部队

嗨，那几个月，我潇潇洒洒痛痛快快地走了一回。嗨，我太年轻，完全不懂事，该遭！

把我揪出来斗的那个场面吓死人。台下群情激愤喊打喊杀，批得我昏头转向，骇得我屁滚尿流！批我斗我的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其中还有我的好朋友。我噗地一声软了，我觉得自己做过头了，把共产党骂狠了点。后来，中央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出台，我一看，妈呀！我几乎条条适合！

给我定罪，果然每条都挂上号。只有一条有些冤枉：破坏党的国际主义政策。当时总工会住得有日本工运的实习小组，打开水时我错拿了他们的热水瓶，争吵了几句。

不过，总的来说我该遭整，判我监督劳动不冤枉，尤其是同那些啥也没说就划右的人相比。

我被隔离审查，父亲来看我，旁边守一个人。父亲对领导说：“儿子不忠，我带回去管教。”

这是“新社会”，根本不可能。

1958年3月，我被押送到长寿湖。

到长寿湖后我还很天真，心想，我言语虽说激烈了点，但毕竟是响应党的号召，最多发配我两、三年，两、三年后我才30岁，回城结婚不算迟。

当右派后只发15元生活费，这一招立马让我全家陷入困境。我虽然没有成家，但我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个弟妹，每月都要寄钱帮补家用。工资一断，两个弟弟马上面临失学，真的立竿见影。1979年“改正”后，我工资恢复到1957年的57元。我算了笔帐：1958年到1961年，每月15元，1961年摘帽后加到每月30多元，农场觉得多了，又扣了一点。1971年说我表现好，加到41元，1977年再加到47元，两年后“改正”，恢复到57元。算下来共产党共扣我工资6705元。哎，你说，把人冤枉整20年不说了，扣的钱总该补吧。不！分文不补！知道不，当年好些饿死的人，每月只要多三块、五块就可以活一命。整右派从经济上下手，导致了好多家庭家破人亡！“改正”后，抛出一句话“国家困难”，把20年剥夺的钱一笔勾销，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我1984年给市总工会申诉，要求党和国家补发扣去的工资，这是对一个无辜受害20多年公民最起码的责任。我在申诉信上说，这笔钱不补发，不对我们进行赔偿，我死都不会瞑目。



郑汉生转业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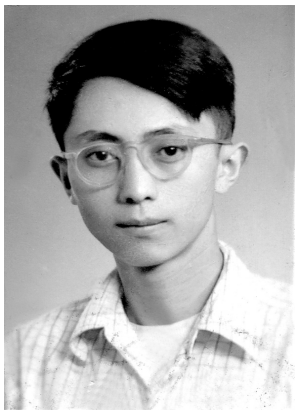
（刘宾雁在丁抒著《阳谋》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那些右派，除极少数人外，二十二年来不是被剥夺了全部工资，也是降了几级，绝大多数人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给他们补发工资，主管财政的李先念一口回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由于许多右派与海外华侨有亲属关系，大约在1982年，宋庆龄代表海外华侨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你们若真的没有钱，我可以建议华侨在海外募捐，用以补发右派的工资如何？我本人也可从我的财产中拿出钱来，如何？”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次考虑这个问题，连续提出过几个方案，结果都因遭到抵制而搁置。）

在反右前夕，我去照了张像，当时我25岁，正是青春大好年华，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那时我十分单纯、天真。实际上也如此。我认为不对的，一定要提出来，不会见风使舵。例如我批评肃反扩大化了，例如我认为“大毒草”《草木篇》中“纵然死了腰也不肯弯一弯”说得有道理，等等。

仅仅几年后，1959年，劳改一年多的我看上去就面目全非了。那年冬天，农场临时派我到外地劳动，回场时路过重庆，我想去看望父亲，他们准了我两个小时的假，我匆匆把父亲和读中学的大妹妹约出来，由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们就去照了张像。照片上的我，完全没有了反右前的神光和风采，活脱脱的一个“劳改犯”形象。照片上

父亲和妹妹也是一脸愁苦，可以想象我们当时的心情。



郑汉生当右派前(25岁)



1959年，“劳改犯”郑汉生与父亲和妹妹合影

(郑汉生由于个子小，粮食就消耗得少，又由于体力弱，免除了一些重体力活。这样，他无惊无险地渡过了那三年大饥荒。)

郑汉生：正是由于个子小，救了我一命。我们单位一块下去的右派张樾人高马大，食量大，遭不住，1960年饿死了。那几年，我亲手埋了好几个饿死的右派，其中就有大汉张樾。

(个子矮小自然有助于渡过大饥荒，但却不利于“男大当婚”。1970年，郑汉生不不仅是“大”了，而且是成熟得有一点“老”了。眼看进入“不惑之年”，他还形单影只。

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同他相遇了，此人也是长寿湖右派，叫李武珍。她上有患癌症的老母，下拖两个饥寒交迫的女儿，正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候。

两个处境艰难的右派走到了一起。

第二年，年满40的郑汉生有了一个女儿，葱葱。)

郑汉生：我很珍惜这个家，来之不易呀，就是挨批挨斗，也觉得有勇气多了。

记得女儿刚出生李武珍还在坐月子时，遇上红卫兵进岛斗右派，李武珍吓得不能轻，我抓起她的手说：“不要怕，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年多。1974年，李武珍调回了城，而我呢，何时回城遥遥无期。另一个也调回城的长寿湖右派同李武珍好上了。

我只有离婚，离婚时女儿才四岁，判给我，她是我在长寿湖唯一的寄托和安慰。

她生在长寿湖长在长寿湖，小时候她跟我的右派难友卢光特上山照看果树。卢光特是川东地下党游击队的政委，后任歌乐山烈士陵园副馆长。我女儿在右派群中长大，可



郑汉生与他女儿聪聪
(谭松摄)

以算作长寿湖的“小萝卜头”。（注：小说《红岩》中，白公馆监狱里的人物。）

女儿从小就很懂事，她看见别人有妈妈，自己没有，虽然很伤心，但很懂事，她对我说：“你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爸爸。”

我1979年“改正”，同女儿一起回到重庆。1987年我又找了一个老婆，对方有四个儿女，是农转非的工人。她对我生活上照顾还不错，但没有文化，我买书她不高兴。发生一点口角，她要跑到门外去大叫大闹，搅得左邻右舍不安。但最主要的是，她容不得我女儿葱葱，没法子，几年后我们离了婚。打那以后，我死了心，有个女儿，够了！我同她相依为命过日子。

这辈子，其它我都不计较了，只是女儿年已三十，仍然没有正式工作，我只希望这个在长寿湖苦难中诞生和长大的女儿，现在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采访时间：2001年7月7日 地点：重庆出版社

采访后记

1957年年轻的郑汉生敢说敢写，剑锋直指专制丑恶，他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晚年的郑汉生老人依然敢说敢骂，多次在公开场所痛斥独裁暴政，毫无顾忌。

专制政权多年来要根植于国人心中的那种恐惧，在郑汉生老人身上失效了。

我在这种经历了九死一生而依然慷慨悲歌的老人面前脱帽致敬。

不过，最让我感动的是郑汉生老人对长寿湖难友的那种深切关爱和悲悯。他细细地保存着长寿湖难友们的名单，每次聚会他都热心张罗，每一个难友的去世他都万分悲伤并一定要前往哀悼。我曾同他一起参加了长寿湖右派陈大中的葬礼、参加了为白永康补办的追悼会……他在难友遗像前的深深鞠躬与斑斑泪痕给我很深的印象。



郑汉生右边的这三人是他的高中同班同学冯孝寅、罗耀禄、赵光东。1957年他们都被打成右派。50年后，他们在成都相遇合影。同班的还有柴与言、郑竹生也是右派。

听其他右派说，当年郑汉生在掩埋难友张樾的遗体时，曾哭得肝肠寸断！

2009年春，当我决定为幸存的长寿湖右派录像时，我第一个选择的就就是郑汉生。4月30日黄昏，我们俩在长寿湖边，老人时而慷慨激昂，一泄千里；时而沉默凝望，一言不发。他那久久凝视暮色中湖水岛影的神情让人黯然神伤。

张樾等埋葬在长寿湖的难友的尸骨早已荡然无存，郑汉生老人自身也已走到了黄昏暮色，我唯有用镜头留下这即将被岁月淹没的音容。

（谭松补记于2009年10月）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前言约去：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叛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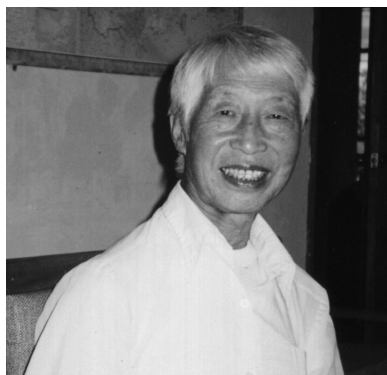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对活动的分子。

“工团主义反党分子”

马季常

1957年重庆市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

产业工会主席。1921年生



我1957年重庆市市级机关打了三大块右派群，一是宣传部系统，以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为首，二是市政府系统，以市府秘书长陈筹为首，第三是工会系统，以市总工会主席张显仪为首。

为什么对工会系统大开杀戒，主要是为了反工团主义。

工团主义，指的是工会闹独立，不要党的领导。

其实，所谓“工团主义”是无中生有，工会从主席到下面的部门负责人，几乎全是中共党员，市委还派了两名党员干部来做副主席和组织部长。当时，全工会上上下下根本没人闹独立，连想法都没有。党还是不放心，一点小事忘了汇报，说成是闹独立；把工作中的一点不同意见说成是拒绝党的领导。刚才我提到市委派两名干部来当工会领导。这两名干部，其中尤其是一个姓邢的，素质很差。工会的人提个意见，说这两个人不合适，就成了反党。

给我戴的帽子叫“工团主义反党分子”。起因是我提出，调整工资最好搞个民意测验，哪些人该调，哪些人该不该调，征求一下群众意见。

就凭这，说我反党，因为资产阶级才搞民意测验。

斗我斗得凶狠哇！还说我是混进党内，我又气又委屈。解放前我在上海加入地下党要冒生命危险，怎么混？不讲道理！

一天，在工会大楼顶楼斗我，斗得我气血直往上涌，我头脑一热，准备从顶楼跳下去一死了之。咳，正在这时，偏偏我老婆推门进来！你说巧不巧，一看到她，我冷静下来，想到家，想到两个孩子。

老婆也在总工会工作，1960年她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南桐农村，我的两个娃儿很可怜，初中都没毕业。



1957反右漫画，反党集团

下放长寿湖实际上是劳改，管我们的管教干部如虎如狼。他们本身也有点问题，为了表示对敌斗争坚决，证明自己革命，又凶又恶又野蛮，把右派们往死里逼。饥荒年本来就吃不饱，还逼着右派拚命干活。我一个月吃十五斤粮，下身枯瘦，上面脸浮肿，不

成人样。逼着我们加班加点干，好多右派就死在这个时期，如我们总工会的张樾。我在一次三天三夜不下火线的劳动中昏死在地，是一个姓兰的医生用一碗羊奶把我救过来。上面看我确实不行了，才调到捕鱼队，其他右派十分羡慕，说：“好了，好了，这下你得救了。”这也算我第二次死里逃生吧。

我 1962 年调回重庆，在江北茅溪一家化工机械厂干活，那又是一段辛酸史，不过，与长寿湖无关了。

采访时间：2001 年 9 月 24 日 地点：重庆市燃气公司



周恩来总理曾在 1958 年到访长寿湖，这成了长寿湖几十年经久不衰的骄傲。眼下作为旅游胜地的长寿湖，在镇中心竖立起了这面巨大的“招牌”——长寿湖真是个好地方！（谭松摄）

宁可错抓十万，不可放过一个

王廷芳

1957年重庆市总工会机械工会组织部长

1929年生



解放后，我们描述蒋介石残暴，多年来说他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我们描述共产党公正，多年来说他是“决不放走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

呸！右派的事怎么说？！

官方公布1957年打了55万多右派分子，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是90多万！但二十年后认定，确实有反党言论的，注意，仅仅是言论，只有80来人！就算言者有罪，为了这80来人，发动惊天动地的大运动，抓、整、关、打90多万人，算不算“宁可错抓十万，不可放走一个”，嗯？！（注）

注：刘宾雁在丁抒著的《阳谋》一书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究竟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现在就有两个数字：官方宣称称为五十五万人，而我从一位掌握当年内部机密文件的人士处获悉的数字则是一百零二万。此外还有很多实际上被作为右派处理的人，并未经过必要程序，即他们本来并不是右派份子，因而那些人很可能还不在这百零二万的数字之内。”

丁抒在《阳谋》一书写道：“关于右派人数，世人及本书首版均引用中共官方数字‘五十五万多’，但本书作者近从中国大陆各县、市的出版物中收集的 数字推算，不算‘中右’，仅‘右派’数字便在八十万以上，很可能接近百万。一百万比‘五十五万多’更接近于真实数字……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持续近一年的那场‘反右派斗争’中，大约一百万，至少七、八十万‘右派份子’，五十万‘中右份子’，三、四十万‘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被制造出来，成了共产党的新的敌人。这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是所谓戴了‘帽子’、有‘份子’头衔的，中共后来给他们平反、‘改正’，还有据可查。”（第十三章：超“指标”贱民百万）

《炎黄春秋》杂志刊载：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了5759·12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子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

——引自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载《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2期

共产党、邓小平认定反右没有错，只是扩大化。几十个人扩大到几十万人，还正确？真是厚颜无耻！太无耻！

共产党当政几十年，杀死、整死、饿死、打死的人超过了二战死亡的人数。我一个小人物，挨整几十年算什么，傅雷、老舍、储安平……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都迫害死了！毛泽东这个人，无比残暴，甚至超过了斯大林。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这就要说到 1949 年前在上海的“启蒙教育”。

我是上海人，父亲是工人，他去世很早。我妈生了 13 个娃儿，带活 8 个。我是家里的长子，父亲死后，担子就落在了我身上，我 14 岁就出去打工挣钱，拉过三轮车，修过自行车等等。后来进了上海振旦机械厂。正是在这个厂里，我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我有个师弟，他的哥哥是地下党，从那儿我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共产党代表劳苦大众，为工农谋幸福；共产党要让劳动人民翻身当主人，要创建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那个社会没有剥削，人人丰衣足食，而且享有民主自由；共产党统治的解放区，是中国最好的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

我被迷得如痴如醉，解放区太神圣！太美好！巴不得马上投奔。我那年才 16 岁，认定共产党是天下最好的东西。我卷起裤腿，跑得飞快，帮地下党传递情报，收藏违禁品，同时，上街游行，反对国民党……

上海解放前，我们厂搬到台湾和海外，我的不少师兄师弟都跟老板走了，我毫不犹豫地留下来迎接共产党。上海一解放我就参军，加入了西南服务团，从常德一路步行到重庆。

我离开上海，全家反对，我是长子，家里的顶梁柱，母亲更是舍不得，抱住我痛哭。但是我要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在进军西南途中，我入了团，到重庆后，入了党，担任市总工会机械工会组织部长。不久结了婚，有了两个小孩。1957 年之前，我算一帆风顺。其间，对“胡风分子”刘焰的疲劳轰炸，我也参加了，党叫干啥就干啥，没多想。

1957 年反右，机械工会打了两个右派，一个是李宁熙，他在我组织的一次鸣放会上感叹地说，他很渴望读书，但出身不好，没机会，现在只保送工农子弟。我把发言记录交到总工会，总工会反右五人小组说，这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反对工农子弟上大学，对党不满。

李宁熙自然没读成大学，当了右派，至今还在长寿湖。

另一个叫谢卿梁，他解放前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在校期间，他听过两次托派的讲课，解放后他对组织上交待过这事，组织上也没认为有什么不得了。1957 年，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他是右派，而且是逮捕法办！我是组织部长，他的问题我很清楚，一个学生，听两次课，就成了托派！就打成右派！谢同我一块在上海参加西南服务团，工作非常认真，不多言，一头“老黄牛”，1957 年什么意见都没提，说抓就抓，太过分！

在抓他的会上，我不忍心看下去，扭头就走。嘿！这就成了我后来当右派的两条罪

行之一：同情支持右派。

谢卿梁在监狱里整整关了 25 年，他比我惨得多，50 多岁出狱后才结婚。

反右之后党内整风，有人提议给中央写封信，反映工会工作的一些问题。当时机械工会的两个主席都不在家，我主持了这件事。

为什么写信？

五十年代我们搞工会工作很苦闷。工会是个群众组织，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党团组织和行政领导把一切都管完了，工会只能搞点职工娱乐活动之类的事。解放前工会是工人的组织，代表工人的利益，同厂方、资方斗争。解放后说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工会的这个性质就不存在了。我们常常觉得无事可干，下基层厂矿不能给工人解决任何一点实际问题和实际困难，觉得工会这个组织可有可无。我年轻，想多干事，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领了工资，是劳动人民养活我，我应当为他们效力，否则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我的良心。写那信的目的是希望中央组织一次工会工作的研究，看如何把工会工作搞好。

煤矿工会的人也写了一封信，主要是向党中央反映，解放好些年了，煤矿工人仍然很苦，工资很低，住房很差，没人关心。

两封信被中央退回重庆市，市委书记任白戈看了信，用红笔勾了一个框，下了判决：这是两条黑线。

斗我的大会同抓谢卿梁一样，突然袭击！

那天开会，我一走进会场，迎面一条大标语：反党分子王廷芳要老实交待！

斗我的语言才叫蛮横：“你以为你是谁，嗯？！你比毛主席还伟大？！毛主席没有想到的问题你想到了？！你混进党内，给右派提供炮弹向党进攻……”

我懵了，转不过弯，写信完全是一片善意，成了向党进攻？

连续斗了我四天，不准回家，房间里把绳子、钉子都收了。我说：“不用收，我不会自杀”。几天后我回到家，抱住妻子大哭，真的是嚎啕大哭，我爹死了我都没这么伤心。我妻子也哭，我觉得我不该来重庆。

紧接着要我坦白交待罪行，叫我挖根子——即追究骨子里的反党根源——我挖啥子根子？我是血统工人出身，解放后当了国家干部，哪来反动根源？不交待不行，逼得我发疯，我把心一横，这个革命我不干了，回上海去！

有人劝我，说不是那么简单，现在比不得解放前，可以随便走，随便找工作。不如认个错，下去劳动一两年就回来，不认罪要被抓去劳教。

这是事实！我亲眼看到不服气的人被抓走。我长叹一声，不得不低头。我苦苦想了几天，才编出一个“反党根源”。我是这样编的：解放前，我在上海当学徒，看见灯红酒绿，心里羡慕吃得好穿得好的资产阶级生活，解放后，没过上那种生活，就反党。

噢，你别说，我这一认罪，一挖根子，就不再逼我，算是“过关”了。

宣布开除我党籍之后，我趴在桌子上放声痛哭，又是嚎啕大哭！我一生中有三次痛哭，两次都为这事，我舍不得离开党，我真的热爱它，我把全身心都交给了它。我孤身一人从上海来重庆，党就是我的亲人。下放长寿湖之后，我一直都热爱党，信任党，渴望回到它的怀抱。

直到 1988 年之后我才认清了它。

我妻子受我影响，失去了水轮机械厂党委秘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两年之后，她毅然抛弃了城市户口和工作，带着两个孩子来长寿湖落户，她对组织上说：“我去帮助他改造。”这样，我们在长寿湖建了家，20年后才迁回重庆。

我懂机械技术，进了农场的机械厂，妻子来又带给我家的温暖，所以，我在长寿湖少吃了很多苦。

“改正”后我担任了重庆无线电三厂副厂长，主管财务。三厂当时是个很火红的大厂，我兢兢业业地干，没为自己谋一点私利。八十年代末我退休。后来的人，咳，别提了，一个好端端的厂败得一塌糊涂！1500名职工的厂，负债6亿4千万，平均每个职工摊43万！前任厂长已经被抓了，光他养的女人就有7个。去美国与所谓外商（中国出去的人）谈业务，吃喝玩乐一趟回来，花650万美元买一堆报废设备！我实在忍无可忍，前不久我去交党费，我把钱往桌子上“啪”地一拍说：“你们再这样腐败下去，老子就退党！”

说到这个党，唉，气又不打一处来。我们都是它夺天下的工具、牺牲品。死几百万农民，为它夺天下。现在工人又被它抛弃。为劳苦大众？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屁！共产主义是个画饼，充不到饥。自称三个代表，代表什么？代表大量下岗工人？！200块钱饭都吃不起。我儿媳下岗，一家生活困难，儿子对我说：“当年跟着你吃苦，现在还是吃苦，儿子读书学费都困难。”

我说：“你不要找我，找共产党！”

采访时间：2001年9月28日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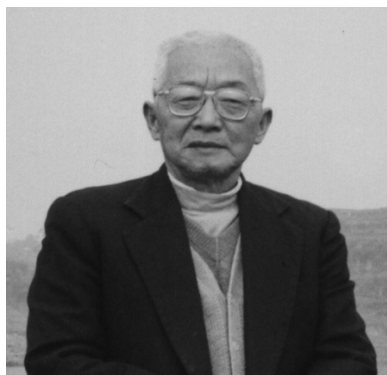
王庭芳（第二排右三）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会上。前排右一为谭松

长寿湖的“守墓人”

李宁熙

1957年重庆总工会机械工会干部

1930年生



我是垫江人，家划为地主，初中毕业那年父亲病故。我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姊妹七八个，我排行老五。我大哥曾是杨森部队里的团长，父亲去世后他回家照顾家业，供我继续读书。我到长寿读高中，快毕业时，长寿解放，学校停课。我回到垫江后，闲着没事干，心里很着急，一门心思想考大学，想学本领。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人生要靠自己奋斗，不要指望家里这点财产，我爷爷也是这样教育父亲。

读不了书，我只好四处托人找事做。1950年8月，经人介绍，我到重庆“中国汽车配件厂”当学徒。这个厂名字大，实际上只有几台车床，那个私人小老板，也是工人出身。

我有文化，老板器重我，叫我记帐，学车工。1951年，共产党派人来宣传，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压迫工人，工人要组织工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同资本家斗争。宣传很诱人，共产主义更是美妙，我很振奋，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好，革命比不革命好，新社会比旧社会好。我立即加入了工会，领了会员证，积极得很。后来，我们那一带的小厂组成一个工会，我被选为工会主席。

我积极参加所有的运动，三反五反，按上级要求发动工人把那些小老板一个个弄来斗，搞得很火。还配合公安局开展监督活动——查看有没有坏人、有没有特务活动。

由于工会很缺干部，1953年我调入市总工会，在第一机械工会当干部。

鸣放期间，组织部长王廷芳再三动员，说提意见是为了党、帮助党、热爱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起来，我慢慢来了情绪，也提了几条意见，比如，不该把人分成几等，干部定几级几级，搞封建的那一套。还有，肃反时电力工会的刘大友（读过国民党的政阳法学院）按要求写了交待，机械工会主席郭X居然根据他的交待把他关起来，动员人斗他。我觉得，一个单位，搞抓、关、斗、打，这是私设监狱。

本来要判我极右，送进监狱，考虑到我年轻，认罪态度好，放了我一马——啥子认罪态度好？斗我时我看到前面的例子，晓得不能对抗，对抗只有越判越重。

我下放长寿湖，精神压力很大。解放前读书，追



李宁熙（左）1955年与侄儿

求政治清明，社会进步，解放后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觉得共产主义太美好了，对共产党一点怀疑都没有，有一点疑虑还觉得自己思想不对头。我劳动很亡命，想表现好，争取早点回去。

除了精神压力，经济压力也可怕。我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给妈寄5元，交8元的伙食，剩下2元钱，草鞋都不敢买，8分钱邮票我都心痛。

我妈划为地主成分，抓起来斗、打，小弟弟才十一岁，也抓来陪斗。斗不说，从家里赶出来，没房子住，住人家的灰屋，别人骂，只得睡在路上。我1953年把他们接出来，住房管所的房子，我当右派后，没钱交房租，他们又被赶出来。弟弟跑到南桐矿区当煤矿工人，妈去帮人，没干多久，别人嫌她老了，不要。妈妈走投无路，到长寿湖投靠我，我在一个烂猪圈旁边搭了一个草棚，安置了她。我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没办法，妈只好每天去猪场铡猪草，挣口饭吃。

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像叫花子（乞丐）一样过日子，本来已经够心酸了，但是这种最卑微的生活都不让我们过。1964年，来了个政策：地主婆不能呆在城里享福，必须回农村劳动。你明天去看看，那个岛子上算什么城市？！我妈一大把年龄，天天在猪场劳动，享什么福？！我心里不满，不敢说，我一个右派分子，哪里敢顶“政策”？妈妈70多岁的人了，孤苦伶仃回到垫江农村。回去之后生产队不给她房子住，让她住在一个烂厕所里，蛆和苍蝇爬满了身子。

妈独自一个人，挣扎了两年，再也起不来了。

传来妈妈死讯时，我正跪在地坝挨斗，胸前挂着我自己的黑牌子：“右派分子李宁熙”。

那些日子，莫可奈何，真的莫可奈何啊！

那群红卫兵，简直就是土匪！他们进岛来，抄家，把我们仅有的一点钱财洗劫一空，还把我们跪在地上斗打。一个流氓气十足的红卫兵，冲着詹光屁股狠狠一刀。詹光是个硬汉子，血流满地，挺住没倒，旁边一个右派“咚”地一声栽下去，面色发紫。我当时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脑门，直冲脑门！气得发疯呀，本能地想反抗，但不敢，也反抗不过，我一辈子都记得，头一阵一阵地发昏，好容易才没跟着倒下去。

“改正”后，有一次右派詹一之回到长寿湖，望着湖水连连说：“这是法西斯专政！法西斯专政！”

1957年我当右派时，结婚才一年，总工会女工部一个姓雷的干部跑到我妻子单位，压她与我离了婚。我现在的妻子是农民，她60年代死了丈夫，独自拖四个小孩，活不下去，我和她成了家，几个娃儿都是我带大，妻子没有文化，但勤劳，懂事。她对几个孩子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今天。”

1975年，总工会把我召回，但没有事做，而且仍然受歧视。我妻子和娃儿是长寿湖的农民，进不了城，我干脆又返回到长寿湖。

我从此留在这儿，一辈子了。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13日 地点：长寿湖造船厂

采访后记

李宁熙低矮的平房紧靠湖边，推开门，便是长寿湖万顷湖水。凭栏望去，秋水长天，景色怡人。

一条小船，孤零零躺在湖边，那是李宁熙的小船，他每日摇起双桨，划向湖心。

李宁熙对长寿湖的每一个小島、每一个水沱、甚至每一条小径都了如指掌。他先后五次带着我登同心、上三台、爬先峰……

一一指给我看当年右派的住处、挨打挨斗的场所、一些右派的死亡地点。

他是长寿湖的活地图，也是长寿湖的“守墓人”。他带我去看女“历反”卢蕴伯自杀的地方时，天下着大雨，我们都没带雨具，路又滑又远又弯曲，我们钻橘子林，穿茅草丛，湿淋淋，汗淋淋。72岁的老人气喘吁吁。我几次叫他不要走了，给我指指方向我自己去。他不干，坚持要陪我。

“卢蕴伯死得很孤独、很凄凉，孤身一人，没有亲人去看她。”老人喃喃地说。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从山坡上下到湖边，大滴大滴的雨点打在卢蕴伯投湖自杀的水面，我同李宁熙站在湖边，默默无语。

卢蕴伯没有家，没有子女，谁来湖边洒一滴清泪，叫她一声妈妈？

李宁熙在讲他的经历时，有两次很激动，其中一次就是说到他妈妈——所谓的“地主婆”。（李宁熙的家史见笔者的土改采访录《血红的土地》）

母亲去世，儿子理应灵堂长跪，然而，胸前的黑牌代替了左臂的青纱，双膝跪得发肿，却是在向另一个“妈妈”认罪。

用暴力掠夺了土地，再把土地的主人（所谓地主）像狗一般凌辱、殴打甚至虐杀，若剥去那一层虚华的意识形态油彩，看见的，是不是一个越货后又杀人的剪径强盗？

以暴力将私有财产收为“国有”，再以权力瓜分“国有”，将“国有”变为权贵们的私有，两件伤天害理的事，都被“妈妈”（它要人这样叫它）干了。

“妈妈”还在，80高寿，依然“伟大光荣正确”。长空中，依然是绵绵不绝的娇媚颂唱：“党啊，妈妈，亲爱的妈妈……”



2009年7月，李宁熙第六次带我进岛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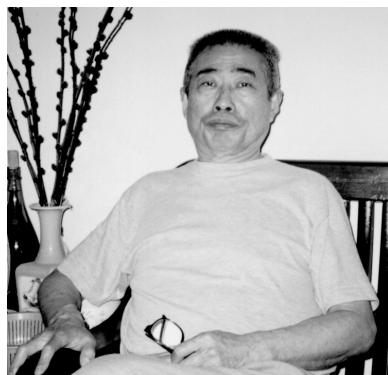
谭松与长寿湖的“守墓人”李宁熙、李长文合影于长寿湖边（2001年10月）

当右派，只因书记想让我走人

顾大鸣

1957年重庆桐君阁药厂厂办秘书

1933年生



上海被解放军攻占那年，我刚好初中毕业，新政权急需调人入大西南，我于是加入西南服务团来到了重庆。

1956年11月我作为下派干部调到重庆桐君阁药厂。

几个月后，整风运动开始了。工厂反应迟钝一些，没有搞轰轰烈烈的鸣放。我不仅没有“鸣”，连人都不在单位——回武汉老家去了。

我当右派是因为厂党支部书记不愿意有一个上面派来的干部呆在他身边，让我走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我当右派。

支部书记定了右派，让我签字，我不签。书记也拿不出任何罪证，他只好耍横，说：“你不签字就是默认。”

我当右派，就这样简单。

（长寿湖有一个叫郭良彬的右派曾经写了首诗，其中两句是：“书记有权来划右，小民无力可伸冤。”）

除我之外，支书还顺便清除了厂里一个资方代理人张鹤林（职务是厂长），张鹤林虽说是厂长，但在厂里说不起话，一切还是“党”——支部书记说了算。尽管如此，支书还是不希望他在眼前晃来晃去。他找了个理由，说张鹤林对党的工商政策不满，将他划为右派，清理出了桐君阁。

除我们两人外，书记还借这个运动摆平了一些人。

厂里有五名工人生活困难，其家属想在厂里找些事做，挣点钱补贴家用。这五名工人联合起来找领导，要求领导解决困难。书记觉得麻烦，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就是借运动将五名“闹事”工人清理出去。



工人不能划右派，但可以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他把那五个工人定为反党小集团——共产党整人总有办法，右派帽子套不住，就有其它帽子套你，总之，只要想整你，你就无处可逃。他把“异己”清除得干干净净，连工作上的小麻烦都被他借运动摆平了。那五个工人生活原来就困难，这下

更惨，其中尤其是一个叫陈子元的工人，他有五个娃儿，老婆靠给厂里洗衣服挣点钱。陈子元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上他历史上的一点问题，进了监狱，直到1980年才出狱。他被抓后，老婆洗衣的活都没了，不知道他们一家怎么活出来，或者活没活出来。

我是1958年8月8日（日期很“吉利”）下放农村监督劳动的，1959年3月，转到长寿湖，每月生活费18元。

离开工厂前，厂里那个老红军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他说：“你没什么大问题，下去劳动锻炼一下，最多两年就回来。”

我去了十九年。

当年在上海读书时，党动员我们来西南，信誓旦旦说：你们先去西南，然后再读书，有的是读书机会，组织上一定会关照你们。结果我再也没能走进校门，倒是被“关照”到长寿湖当了20年单身汉。我不知道这个党是怎么回事，它说话从来不算话。还有，它莫名其妙地整人。1960年我们在长寿湖饿得皮包骨，有人去照了张像，看上去像逃难的饥民。结果把他抓起来斗，说他蓄意丑化社会主义。

我1977年国庆节回到重庆，这年我已经45岁。我找了个老婆，她带了两个孩子来，我把妻子的孩子作为自己的亲生儿女，自己没有要小孩。

我是1983年才获得“改正”，“改正”结论上说：“顾大鸣同志在1957年整风期间没有提一条意见，没写一张大字报，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这时我已经年过半百，我苦笑一声：“只怪当初支部书记想让我离开工厂。”

采访时间：2001年6月22日 地点：重庆南岸区



右派们修建的长寿湖团结荡（图片来自画册《长寿湖》）

一念之差，毁了一生

范广受

1957年重庆热水瓶厂会计师

1920年生



我出生在一个颇有身份和地位的家庭，父亲是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的经理，交往的都是头面人物。我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了金融界和商界。1947年我进入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任营业部主任，后作经理。此外，我和哥哥合开了一家银楼，同时，刘文辉（西康省省主席兼24军军长）聘我在他的成都办事处里专门负责管钱，给了我一个少校军需主任的头衔，但没有正式发委任书。

那时我27岁，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

1949年底，共产党打来了，我收拾好行李财物，别人给我送来了去香港的机票。在去机杨的路上，我犹豫了。母亲不愿走，非要留在家乡，我这一走，怕是不容易回来，怕是见不到母亲。可是不走，共产党会不会对我下手？这时，我想起父亲的至交，曾经担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伯伯说的话：“两位小侄呀，要相信共产党，共产党当政后也需要工商业，也需要工商人士。”

我留了下来。

今年我81岁，这辈子呀，悔呀，就那一念之差。

1951年，朋友介绍我到重庆工作，我只身来重庆，靠我一技之长，进了重庆市工业局，成了行政19级的国家干部。

紧接着“三反”运动，我家开始遭殃，我妈妈、嫂嫂都被抓来关起，强迫她们退赔解放前“贪污”的财产。妈妈把全家几辈人辛辛苦苦的积累连她的结婚戒指全部当作“贪污”交给政府，才被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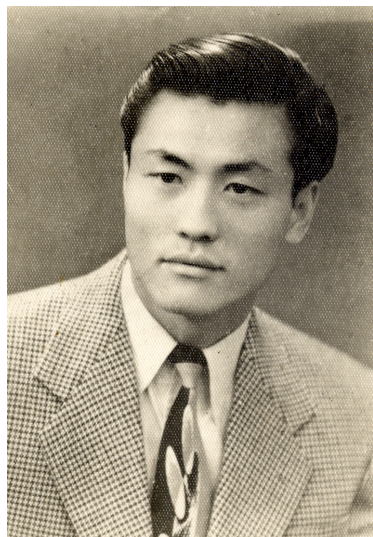
我把妈接来重庆，她带来的全部财产只有几件没被抄走的衣服。不过我想得开，我还有工作，养得起妈。

1954年，没说理由，工业局把我下放到重庆热水瓶厂，当了一名普通会计。

当然，富贵并不是不可转让的专利，小老百姓的日子，也是人生，我对此很坦然。

我的麻烦不是出在帐本上，而是出在对厂长的态度上。

厂长是扛过枪打过仗的人，打江山自然要坐江山。在热水瓶厂这个“分封”给他的



范广受1950年步入“新社会”

“江山”里，他就是君主。他最喜欢别人对他点头哈腰，顺溜拍马。我看不来他那个官腔，我见过的官比他大得多，当年我出入豪门华府，都是风云人物，即使在刘文辉家，最多也是作一揖，别人也平易近人，不像他那么不可一世。解放前我曾经花天酒地，但就是不吹牛拍马。我祖父是举人，父亲是文化人，从小家教里没有奴颜媚骨。

厂长想整我，打我的“傲气”，但我也不是19级干部，同他一般高，他没机会下手。

1957年鸣放，我写了一篇大字报，叫“良药苦口”，主要是说新社会不该搞吹牛拍马，不该搞个人崇拜。这篇文章我写得文采飞扬，又切中要害，在全厂引起轰动，不少人边看边鼓掌。

厂长马上反击，他先找我的历史问题。那些东西在肃反、审干时早就作了结论。他不管，翻出来，证明我在根子上就是坏人。接着他给我罗列了五大罪状：一、攻击党的干部——说新社会有干部喜欢吹牛拍马。二、污蔑建党工作——说某人（工业局的伙食团长）到基层更容易入党。三、让毒草更毒——帮朋友方奇修改文章。四、不听领导的话——自以为懂管理。五、对大右派的文章拍手称快——欣赏西师右派董时光说的“积极分子像国民党特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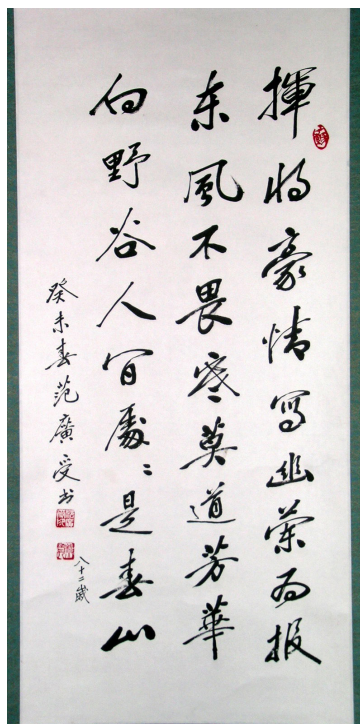
我划右派后于1958年3月下放农村劳动，发18元生活费，我身体弱，从来没干过体力劳动，有人断言，我下去只有死。我当时也不想活了。妈妈劝我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有，我妻子正怀孕。没法，我硬着头皮下农场劳动。我下去时，最多只能挑70斤。那时，我就像突然失去森林下到地面的猴子，面临“生存、还是死亡？”

在长寿湖劳动，要我推二、三百斤泥土的独轮车，我拼老命把车推上坡，下坡时，没力气控制车，车把打过来，“砰”的一声把我打翻在地，我爬不起来，那一家伙，我左肋断了五根肋骨，右肋断一根，一下子断了六根！后来，1966年，我修堤坝又摔断右手腕，所以，我在长寿湖共断过7根骨头。

伤好后，我更加虚弱，又正逢饥荒年，我终于一头病倒，连空粪桶都挑不动了。

伙食团那个炊事员是长航来的一个工人，姓郭，他专门欺侮右派。他将馒头做成四等，最大的给队长、组长，其次给下放干部，第三给能干活的右派，最小的给右派中的病号。有一次他拿错了，把一个大馒头发给一个病号右派，那个右派满心欢喜，没走多远，就被郭喊回去换成小馒头。说旧社会讲等级，屁！再讲等级也没到这个地步！另外，他还把红苕根打给右派吃，把大红苕喂他的几十只鸡，他当着右派的面这样干，完全不把右派放在眼里。

管教干部是另一种坏法，他们认为，所有的右派病号都是装病，是偷懒耍滑。一天，我和另外几个病号被抓到采石场，勒令我们跪在石头上接受批斗。我全身冷汗直流，双



范广受书法（2003年）

膝痛得发颤。我心头喊冤，我的确不是偷懒，不是装病啊！一个管教干部走上来，先冲着我狠狠一拳，再飞起一脚把我踢翻在地，我当场昏了过去。我永远记得打我那个人的名字，他叫沈XX，是工会系统的下放干部。前几年我专门给他去过信，问他当年究竟是为什么。他给我回信，说那时无知，不是特意要整我，他后来因父亲在香港，自己也被斗，他向我道了歉。当然，我也算了，去年书法协会开会，我邀请他，他们夫妻俩还来见了一面。

（笔者注：沈XX的家族在土改时遭遇灭顶之灾，我采访过他家族的幸存者，沈家也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可是，沈XX也帮着中共迫害他人。好在沈XX后来为此忏悔，他在一篇文章中描写了这一幕：“阵阵的嚣叫、闹、吼充满轰轰烈烈的会场，一个‘阶级敌人’——右派范先生拒不认罪，我大怒，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拳打在他瘦瘦的脸上，溅了一丝血在我手中，心中感到‘斗争’的快意……到九十年代，我向昔日的右派范先生深深鞠躬，道了歉。）

那次跪斗之后，我产生了死的念头，人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意思？！当天我就想自杀，成天想如何死。但是我想到女儿，我走时她还没出生，我这一死，女儿注定永远见不到一眼爸爸。

其实，病、累、打，饿也快把我送上黄泉路了。后来，他们看我那张惨白的死人脸不是装出来的，终于给我假让我回家治病。

我不愿回去，生死的问题都没想好，要死，不如死在长寿湖，不要死在亲人面前。这时，另一个右派说：“范广受，你还不快回去，你照镜子看看！”我一照镜子，吓一大跳，那不是我，是个鬼！

几天之后，我右手支一根棍子，左手提一个口袋，一根草绳栓在腰间，像讨饭的乞丐出现在家门口。

离老婆几步远，她居然认不出我，把我当要饭的。

我在家里躺了两个多月，老婆倾尽全力相救，我才捡回一条命。

在长寿湖，有一个词很可怕，这个词叫“汇报”。它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我一想到它就有一种蛇钻进裤腿的感觉。（19）57年之前我不大懂什么叫汇报，（19）49年前更是不懂，（19）57年后我才觉得这个词可怕。它时时刻刻让你处于被监视状态，可以随时随地置你于死命。灾荒年我为了活命，将蚊帐、席子、鞋子全部卖了换吃的，最后卖得只剩一双草鞋。1961年我在场上用鞋子换了一块麦粑，马上被人汇报，马上就斗我，说我违反粮食政策，而粮食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我当时正要摘帽，这次“汇报”让我多戴了六年“帽子”。

（19）78年我从长寿湖回到热水瓶厂，是工业系统右派中回来得最晚的。当年整我的厂长和他的那帮哥们全都健在，一个个日子过得很滋润，由他们来给我改正是件艰难的事。所以，厂长给我的改正结论是：“范广受1957年有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予改正。”

冤枉我、整得我劳改20年的人没有错，我有错？

（注：刘宾雁在丁抒著《阳谋》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二十二年中间，从基层到中央，很多当权者是靠一九五七年后卖力推行左倾路线爬上去的。因而，给右派平反遇到极大阻力就不足奇了。毛泽东的‘宦官’汪东兴首先反对，拿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讲话——‘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邓小平随即回答：‘不是给右派平反，不过是给结论做错了的人改正而已。’这就是为甚么明明是平反，却称做‘改正’的来由。”）

采访时间：2001年5月12日 地点：重庆市陈家坪

采访后记

采访前，范先生在电话上详详细细告诉我怎么走：左拐右拐，上坡下坎。我边记边画，像画寻宝图。多亏范先生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让我在第二天的寻访时少了许多麻烦。

他的家在重庆热水瓶厂一幢宿舍的底楼，房间狭小、阴暗、拥挤。没有客厅，我只能在他卧室床边的窄缝里落座。

范先生坐在一把旧藤椅里，面容瘦弱苍白。

“我摔了一跤，又摔断骨头，花了几千元，还没完全好，站不起来，请原谅。”老人喃喃地说。

重庆热水瓶厂是个早已破产倒闭的企业，范先生每月从社保领取400元钱，他妻子所在的重庆针织总厂也是个破产企业。夫妻俩都报不了医疗费，范先生那一跤，摔得家里债台高筑。还有，顶替他进热水瓶厂的儿子失业下岗，顶替妻子到针织总厂的女儿下岗失业（即范先生下长寿湖时尚未出生的女儿）。事情还没完，17岁的孙子遭遇“新生事物”——校园下暴，被整成精神失常。

范先生身体虽然不好，但目光炯炯有神。他从1949年前讲起，时间、地点，一清二楚。其间，他妻子进进出出，抬头看钟，频频催他快点讲，不要罗唆。

其实，范先生一点不罗唆，虽81高龄，身体瘦弱，但思维敏捷、口词清晰，显示出良好的文化功底。

转眼到了中午时分，他妻子又进来了，瞅了一眼墙上挂钟，说：“该吃饭了，家里没啥吃的，我给你下碗面？”

我慌忙起身，匆匆告辞。

他妻子送我出门，松了口气。

两年后，我又到他家，此时，范先生的家显得更加破败、凄凉。他妻子已站立不起，正倒卧床上声声呻吟；范先生背上的伤痛愈加沉重，几乎难以行走。他说，他唯一吃得起的药是止痛片。

最苦的也许是在父亲被打成右派时还没出生的女儿，她既要外出打工挣钱（下午上班，半夜12点下班），又要照顾全家衣食住行。一家四口每天只吃两顿：中午和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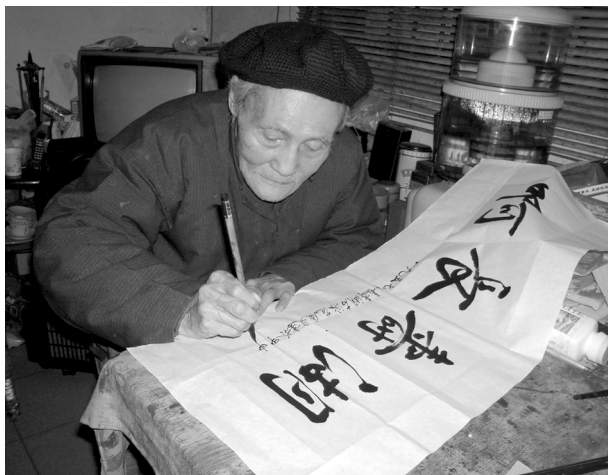
夜一点。

我在范家举目四顾，看来看去，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在哪儿。

2004年春节前，我又去范家，请范先生书写长寿湖右派白永康的遗诗（范是书法家），顺便向他讨要他当年的旧照片。范先生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张1950年他步入“新社会”时的照片。我捧起一看，照片上的帅哥眉舒目展，满面英气，丝毫看不出此刻他已“一失足成千古恨”，即将一步步走向五十四年漫漫长夜。

我目光从照片上的英气才子移到正佝偻身子书写“五七莫须罪，齐囚长寿湖”的耄耋老人，心底一声长叹：“新、旧社会真是两重天哪！”（注：这是共产党“忆苦思甜”的用语）

补记：范广受先生于2008年2月24日去世，终年8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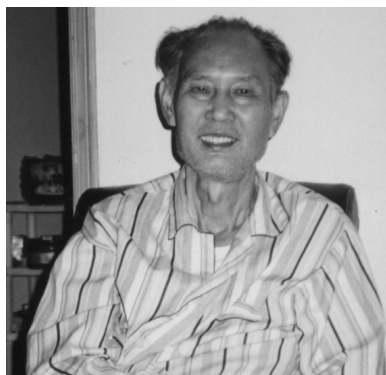


2004年3月，83岁的范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

不写是对党不忠诚

方奇

1957年重庆热水瓶厂劳资股长



我家是“父子登科”，老子、儿子一起当右派。我父亲方德宣，解放前是美丰银行遂宁分行办事处主任，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百货店，算是资本家，按新社会定的标准，我出身不好，属于剥削阶级家庭子女。

但是，1949年我参加了革命，进入解放军11军军大学政治，一年后分到奉节县警卫营剿匪。那时，那个地方穷得很，所谓的匪几乎都是老百姓，饿得没法，抢点粮就成了匪。

剿了一年多，调万县基干团，1953年送新兵到朝鲜前线。1955年初我得了胸膜炎，从朝鲜回国，组织上要我复员，我不同意，为啥子不同意？因为家里来信说工作不好找。但是命令不能违抗，我在日记中发了牢骚，意思是：要人就要人，病了就一脚踢出来。我哪里会想到，这几句牢骚要付出代价。

复员后我分到重庆热水瓶厂——当时在沙区的一个烂棚棚厂。我当学徒，每月9块钱。那点钱刚够吃饭，但我没怨言，我是团员，思想进步。

1957年动员写大字报，我没兴趣——我正在如痴如醉学小提琴。厂计划科科长魏福节来动员我，他说每个人都要写，不写是对党不忠诚，没意见？一点都没得呀？一张不写哪个行？

当时我是厂劳资股股长，工作中倒是有点意见，魏福节上纲上线地动员，我只得写。

我曾经具体负责在厂里一个车间搞计件工资。搞计件前，工人每天做铁扣300个左右，我们把计件定到700，工人亡命，一天干下来，做到1300多个，其他车间马上有意见，说计件工挣那么多钱。厂长一看有意见，马上就叫不搞。我不服，说这是厂务会讨论通过的，工业局还下来看过，作了肯定，三个月试工期还没满就终止，对工人不讲信用，人家做到1300是拼了命，为提高效率想了不少办法。

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挨了批评，工人也白辛苦、空高兴一场。

叫我提意见，写大字报，我就把这事抖出来，说领导说话不算话。

我写了个草稿，会计师范广受看见了，连声说写得好。在热水瓶厂我同范广受都爱好诗词歌赋，彼此很谈得来。他帮我润色，还加了个标题——劳资股演义。

大字报在厂门口办公室前贴出来，影响很大，其他厂的人都跑来看，工人们拍手称快。

我根本没想到会把我整成右派！报上宣传说，右派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向党进攻的坏人。我觉得我离右派很远，我既不向党进攻，更没有“计划”、“组织”、“纲

领”。

厂领导首先整了一个叫刘纯武的人，此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当了几天县长就遇上（19）49年解放。他在厂里搞职工教育，他判得最重，极右，抓到峨边劳改，死在那儿。

其次整范广受，戴右派帽子，只发十几元生活费，他有几个小孩，经济上很惨。

最后是我，本来没给我戴“帽子”，只说我是右派思想，不幸的是我放在抽屉里的日记被人拿去看了，他们翻出我在部队上为复员发牢骚那一篇，说我一贯反党，这一家伙，立马把“帽子”给我戴上。

我父亲这一年也当了右派。解放后父亲的百货商店被收了，政府把他安排在商店当店员，父亲对此并没有说什么，他最不理解、最想不通的是要子女同他划清界线。父亲读的是旧书，不接受新社会的观念，脑子里还是以前那种忠孝仁义的东西，我们子女受共产党的教育多，国家观念、阶级观念很强，家庭观念淡薄，父亲认为，财产可以失去，亲情不能被扭曲，什么叫“划清界线”？他想不通。1957年大鸣大放，父亲把这个“想不通”拿出来说，被划成极右，同刘纯武一样抓到峨边劳改。

父亲在峨边劳改营学会了理发，全靠这个手艺，他活出来，文革中期被放回重庆，当了个理发匠。

我父亲虽是资本家，但一生很勤劳，对我们从小要求很严，要我们劳动，该我们做的事，决不要仆人做。我现在觉得父亲那些章法有道理，忠孝仁义也有道理。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我当右派后，先下放到距南川 50 公里的乐村农场劳动，后转到长寿湖。

重庆市右派们最初分系统下放，工业系统到南川农场，商业局到缙云山农场，交通局到通江农场，教育局到南桐矿区农村。当时南川乐村农场很荒凉，还有老虎。我们中有个右派死在那儿，他背砖修土高炉，从陡坡上栽下去摔死。

我转到长寿湖没呆多久，1962年就回来了，安排在二车间当统计员。厂里没长寿湖那么左，劳动也没长寿湖那么累，说起来比一直呆在长寿湖的范广受日子好过。我回来后面临的问题是婚姻。由于是“分子”——“摘帽右派分子”，没人敢嫁给我。后来，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有三个孩子，我同她结了婚，算是有了个家。

家……唔，算了……不说这事。

我没要孩子，现在这个儿子是她带来的，但跟我姓，叫方华。他们母子俩跟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气，一家人长期抬不起头。孩子受人欺打，不敢吭声，更不敢还手，有好几次被人追到家门口。而家门口就贴着批判我的大字报，门上写着“方奇我儿”。文革把我揪出来游街、斗，还关了一些日子。我搞不懂，这个人哪，平时见面都熟，还点个头，运动一来就不认人，像是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尤其是一些想往上爬的人，平白无故整人，往死里整，毫无人性。

当然，还是有人对我好，有些工人表面骂我，和我划清界线，但私下里说，你这个



1957年反右漫画

人不是坏人，我们知道右派是怎么回事，无非是乱说了几句话。在关押期间，还有工人悄悄在我铺盖下塞了一条烟。那个年代，一点温情特别让人感动，特别难忘。

总的说来，我这个人是被整怕了。当年人家追打方华到家门口，我不敢出来帮他。有个反革命分子对我说：“一死无大难，讨口无二穷，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怕啥？！”但我还是害怕，现在我说话都很谨慎，担心一不留神又惹祸。老婆尤其怕，她听说你今天要来采访，担心得很。

（方奇老婆不时从卧室走到客厅，默默无语朝我投来目光。）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12日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采访后记

方德宣老先生想不通，财产没收了为什么还要“划清界线”——拿父子间的亲情下手。

想不通很自然，这的确确实是个“新社会”——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

群众运动，新！

思想改造，新！

大跃进，新！

文化大革命，新！

定指标抓人杀人，新！

学生斗、打老师，新！

吃被打死老师身上的肉（文革时广西宣武县宣武中学），新！

……

这些东西，不仅老祖宗家谱上没有，苏联老大哥的血红史上也没有。

满脑子忠孝仁义传统的老先生，一头撞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新生事物，怎么想得通？

想不通便打发去峨边的铁网高墙。

《青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披露了“文革”时期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

北京幸福大街中国水暖厂有一个叫杨秋光的人，在1954年公私合营时他以定股900元被划为私方（即资本家）。“文革”时一群红卫兵用鞭子轮番抽打这个“阶级敌人”和他妻子，打得老两口满地乱滚。一名叫胡汉山的工人在红卫兵的配合下，喝令杨秋光的儿女上台痛打自己的父母，以示“划清界线”。杨家兄妹便登上台，与红卫兵一起使劲抽打亲生父母。终于，老杨夫妇被红卫兵、也被自己的儿女合力当场打死。杨家兄妹没流一滴泪，边打还边喊：“打倒反动派”。（第116页）

几年来，这个“故事”像阴森森的恶梦，沉甸甸压在我心头。

究竟是什么魔法，可以驱使儿女活生生打死父母还高呼“革命口号”？

“神圣”的意识形态真的威力无边？在它“崇高目的”的辉照下，一切作恶（哪怕是对无辜的父母下手）都没有了负罪感？

一种学说，一个政党，鼓励杀向最基本的人性，最美好的亲情，是神圣还是邪恶？

这个“新社会”，以暴力和谎言在短短几十年里，将数千年的文明和道德摧毁得干干净净，建起一个巍峨的权力祭坛。奉献在这个祭坛上的，是无数无辜的生命和被败坏了的人心。

方老先生想不通，感到气愤；

我想通了，感到绝望。

* * * *

父子双双划右，我遇得少，来了兴趣想多问几句，然而，方奇不时不安地望一眼卧室，欲言又止——他妻子正在里面不安。我本能地感觉到，他还藏有大量的“货”。

还是那个老问题——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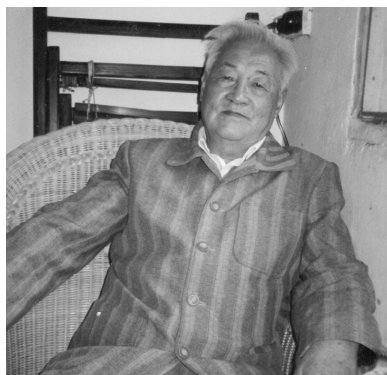
为配合反右运动在全国上演的戏剧《百丑图》（陈华画）

最不幸的是我的妻子儿女

罗克灿

1957年重庆市工业局计划科副科长

1920年生



我194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商学院，马寅初曾经给我们上过课。毕业后我分到教育部（当时在青木关），干了两年左右，抗战胜利后，我随教育部迁到南京。1947年，我同戴学珍结婚，她是女子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淮海战役之后，教育部搬往广州，我不愿去，回到重庆，在市政府当统计员，一直干到1949年。

1950年2月，人民政府来了个通知，要我去工商局工作。我解放前没参加任何党派，业务能力又很强，因此领导比较赏识器重我，到1957年之前，我没受到冲击，还当了工业局计划科副科长。

鸣放时我只提了一条十分温和的意见：党对知识分子信任不够，重用不够，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建设新中国的人才。

1957年底我从成都开会回来，把我抓出来，说我有右派言论。两个局长王XX和江XX平时很器重我，认为我是可用之才，不同意整我。他们给市委打报告，还到家里来安慰我，说我问题不大。为这事他俩被划为右倾，一个停职，一个下放。我当右派主要是工业局组织部部长一心要整我，他说我一是地主出身，二是有反党言论，搞阶级报复。

我先随工业系统的右派下放到南川的农村劳动，一年多后转到长寿湖。1961年我妻子拖着四个小孩也来了。

她当然不是自愿来的，她也是右派！

妻子原本在市一中教高中语文，因为评职称和加工资的事与校领导过不去，领导说，戴学珍这个人泼辣。1958年底把她划为右派，由于有四个孩子，没下放她，但不准上课，降薪降职。到了1961年，据说下达了文件，要把右派清除出各个单位，她只得带上小孩来长寿湖。



罗克灿、戴学珍结婚纪念 1947

几个小孩，大的两个每天走十几里路读小学，小的请人带，我得水肿病进了长寿湖疗养所，妻子在园艺队，一家人扯得四分五裂。在疗养所仍然要干活，我负责100多水肿病人的伙食，每月都得划船去运东西。我不会游泳，好几次死里逃生，高峰岛的一个伙食团长就是运货时淹死的。到1961年底，我的水肿病越“疗养”越肿，长寿湖没办法，

便送我回工业局。我在市三院住了三个月，才捡回条命。

1962年，工业局把本系统的长寿湖右派全部招回，我下放到水泵厂一车间搞生产统计。第二年，妻子也被教育系统招回，但教育局不是安排工作，而是把教师右派全部扫地出门，凡在农村挂得起钩的统统赶下了乡。我妻子挂不上，成了无业游民。那个年代不准“分子”找工作，也没有哪个单位敢招用“分子”。所以，从1963年到1979年，整整17年，我妻子干的全部活是糊纸盒，还捶过铺铁路的石子。

在某种程度上说，最不幸的是我的四个孩子。大的两个孩子学习很刻苦，成绩是班上一、二名，初中毕业便不准再读高中。儿子远走他乡，大女儿到涪陵农村落户8年，1978年进入水泵厂大集体。虽说努力读了一个工业局的职大，但还是没摆脱下岗的命运。儿子回来后在重棉二厂当工人，读了一个电大，现在二厂停产，他也下岗。二女儿糊了多年的纸盒，无法读书，能在街道打点零工就算好日子，后来她进入新桥水泵厂，四年前这个工厂倒闭，她和丈夫双双失业，房子都没有住的，同我挤在一起。她女儿今年考上渝大，一进校就得交6200元。女儿把街道和厂里的贫困证明给学校看，请求减免，渝大根本不理。我大儿子的儿子高中毕业找不到工作，20多岁了在家耍起。小女儿耍了多年，最后顶替我进了水泵厂，眼下也是个捉襟见肘的单位。

我老了，81岁了，一身病。前不久进医院，先叫我交八千元，我说：“八千？一千都没有，我回去！”

我和我的儿女们，看来永远走不出这个困境了。我儿女们本来应该成才，至少像他们父母一样，考上大学，但是，这个社会只给他们打压和羞辱，没有给他们机会。

你问我妻子？她已经去世近20年。“改正”后她回一中教高中，工作拼命，被评为高级教师。仅仅几年她就得了病。她1993年4月去世，死得很痛苦，她一辈子没过几天安稳日子。我同她高中就认识，几十年风风雨雨，感情很深。她去世后我不再娶。我现在尽量往宽处想，后退一步自然宽，平平淡淡过剩下的日子。



罗克灿、戴学珍与子女合影 1972年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10日 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

工会、工业系统右派简况

1、张樾之死

张樾——重庆市总工会右派。张樾下长寿湖后，每月生活费 15 元。张樾个子魁梧高大，饥荒年，那份定量粮远远不够，而管教人员又根据他人高马大的身材，分配给他重体力活。他饥饿无力，完不成任务，遭扣饭，扣饭更饿，更完不成，张樾身体很快垮了。

张樾当右派后，他在茶厂工作的妻子马上与他离了婚，她说：“就算我不怕，我总得为儿子着想”。这样，张樾在饥荒年没有一点家庭的救助。

郑汉生：“他先是饿得双眼发昏，后来饿得眼睛往外凸，他不顾一切地捞东西吃，从猪圈里的泔猪食到滴水缸里的烂菜根，都往肚子里吞。一天早上出工时，他倒在地坝上站不起来。长寿湖教养院一个叫舒 XX 的 16 岁少年走上来，抓住他双脚，将他倒着在地坝上拖了一圈，一边拖一边骂，说他想逃避劳动。当时教养院的那些娃儿被教育说，右派是坏人，用不着把他们当人看。张樾被拖了一圈后，更站不起来，我们把他抬到床上，他还有一口气，但已经说不出话。他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要凸出来。不一会儿他就断气了，眼睛还鼓着。”

张樾死时 31 岁，郑汉生与另一个叫秦开端（电影公司）的右派将他埋葬在长寿湖三台岛瓦银坳湖边。1979 年郑汉生获得“改正”后，专程去找到了张樾的前妻，告诉她张樾的情况。她脸上毫无表情，那个 20 年前的夫君早已在她生活和心灵中消失了。

（笔者注：我曾专程登上三台岛瓦银坳，希望能找到张樾之坟，但一切都消失了，只能为他留下这一点文字，是为我后来者永恒的纪念。）



三台岛上那棵大树在黄昏的血红中默默守候
（谭松摄于 2003 年 7 月，距张樾遇难 42 年之后）

2、谭希文之死

谭希文——手工业管理局右派。1961 年因饥饿水肿，在高峰岛下船时无力而落水，救起后抬到饭厅，因无人理睬，三天后死去。妻子来后痛哭，但不敢找管教人员闹。

3、“无知的谢苗罗夫”

谢汝卿（谢苗罗夫）——巴县人，1917年12月生，初中文化，重庆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右派。他把前苏联领导人的名字读得七零八落，长寿湖右派们便赠了他这个俄罗斯名字。1957年站长对他说：“我们有一个右派名额，我看你合适，就给你吧。”谢苗罗夫以为站长关照他，把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他，很是感激，连忙向站长道谢。但是过了很久，还无音信，他还以为好事落空了。后来通知来了，叫他下长寿湖。下去之后，他才晓得右派是怎么回事。他又气又恼地说：“背时了，龟儿站长二天生儿子肯定没得屁眼。如今工资也没得了，我肚儿大，能吃，怎么办？！”

4、黄德的“烟屁股”

黄德——四川遂宁人，1923年3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邮电局右派。

一个大热天，黄德一口气挑了好几挑粪，累得头昏眼花。突然，他看见一个烟屁股（烟蒂），黄德大喜，抢上一步抓起烟屁股夹在耳朵上。走了几步，黄德感到耳朵上热乎乎的，“这个烟屁股还有火”黄德心想。“何不赶快抽一口？”

黄德取下烟屁股，叼到右嘴角，贪婪地狠狠一吸。

一阵刺痛让黄德失声大叫。他慌忙捏住烟屁股，凑到眼前（黄德高度近视）细细一瞧，烟屁股原来是个大马蜂！

当天，黄德右半边脸和头就肿得发亮。在同心岛马鞍山那偏远的地方，眼看就有生命危险。黄德幸好遇到右派医生吕汉章，吕汉章说：“你饿烟也不要不顾死活嘛。”

黄德回答：“是我眼睛不好，眼睛不好。”

5、吕汉章——无锡人，1907年2月生，大学专科文化。重庆震旦消防器材厂医生，厂职工代表，因帮工人说话被打成右派。吕汉章出身于医生世家，是一个非常具有医德、有教养的知识分子，1949年前很有名气。吕汉章1979年获得“改正”时失声痛哭，当年即病逝。

6、陈援——重庆市商业工会右派，死于饥荒年。

7、回恩浩——重庆市工业系统右派，1959年死于长寿湖瓦银坳，死因不详（据说是在出工路上因病累交加倒下去不治身亡）。其子女到瓦银坳反复寻找父亲遗骨，一无所获。

8、杨昌林——重庆市工业系统右派，饥荒年在飞龙岛被教养院的娃儿打死。

9、刘文秀（女）——重庆大学毕业，因加入过三青团，在重庆市总工会被打为“历反”。由于“历反”比右派地位更低，在长寿湖她说过“我真羡慕你们右派”的“名言”。

10、陈蜀于——重庆市北碚复兴隆煤矿右派，去世时间不详。

11、朱泽厚——重庆市北碚复兴隆煤矿右派，去世时间不详。

12、郑可庄——重庆市北碚复兴隆煤矿右派。

13、甘正常——重庆市轻工局干部，右派。

14、谢正通——重庆市轻工局干部，右派。

- 15、封世泽——重庆市机械局度量衡器制造厂计划科科长，右派，“改正”之前去世。
- 16、张典范——重庆市锅炉厂计划科科长，右派，“改正”之前去世。
- 17、丁慧江——重庆人，1928年5月生，中学文化，重庆市邮局右派，妻离异。丁2001年9月去世。
- 18、赖金泉——重庆市邮电系统右派，由长寿湖回单位后经常挨斗，死于“改正”之前，据说是自杀。
- 19、徐树德——江苏人，1921年1月生，初中文化，邮电部重庆汇兑稽核局右派。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 20、郭良彬——重庆璧山人，1917年11月生，高中文化，重庆市邮局右派。
- 21、杨启祯——重庆市邮电系统“历反”，“改正”之前去世，死因不详。
- 22、包联生——重庆市邮电系统历反。1949年前包联生是扛邮包的工人，因同社会上的袍哥有往来，解放后便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包于二十一世纪初去世。
- 23、李引安——綦江人，1919年12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邮电局右派。2009年10月7日在北京去世。
- 24、刘钧——重庆巴县人，1920年11月生，高中文化，重庆市邮电局右派。
- 25、朱汝鳌——河北人，1916年11月生，初中文化，重庆市矿山机器厂右派。
- 26、吴却贵——四川彭县人，1934年12月生，初中文化，重庆市矿山机器厂医务室右派。独身。
- 27、陈普安——重庆江北县人，1917年8月生，高中文化，重庆市生产联社右派。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 28、曾昭楹——四川隆昌人，1914年6月生，大专文化，重庆市永新肥皂厂（北碚广利化工厂主办会计）右派。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 29、卓松岱——国民党少将，重庆市矿山机械厂历反，“改正”之前去世。
- 30、雷克勤——巴县人，1916年4月生，高小文化，重庆灯泡厂（出纳保管）右派。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 31、张平——江苏人，1932年1月生，高中文化，重庆电机厂右派，与妻子陈敏戎同为长寿湖右派。
- 32、龚鸣谦——重庆标准件厂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 33、裘庭义——宁波人，1931年3月生，高中文化，北碚四川省总工会第三工人疗养院右派。独身。
- 34、杜众明——重庆市机械局右派。
- 35、唐平亮——重庆市工业系统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 36、巫启德——重庆市物资局废品回收公司右派，1960年吞玻璃自杀。
- 37、杨昌泉——右派（单位不详）。饥荒年在同心岛播种时将一袋胡豆藏于水中被人告发，被捕入狱，后情况不详。
- 38、刘纯武——重庆市热水瓶厂极右，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死于峨边劳改营。
- 39、马德轩——重庆市印制公司右派。
- 40、赵琨——昆明人，1930年4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总工会右派。妻离异。

- 41、陈忠麟——重庆人，1931年2月生。大学肄业文化。重庆市手工业管理局右派。
- 42、甘正常——璧山人，1930年6月生，高中文化。重庆市手工业管理局打成右派。
- 43、陈海德——重庆人，1923年生，高中文化，重庆市手工业管理局右派。妻离异，有四子一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 44、曾广闻——重庆江北县人，1933年3月生，高中文化，重庆市手工业管理局右派，独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
- 45、萧去非——重庆巴县人，1925年1月生，重庆市手工业管理局计划科副科长，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
- 46、周 颢——湖北人，1923年11月生。初中文化。1958年6月在重庆锅炉厂打成右派。
- 47、马应芳——河南人，1921年10月日生。初中文化。1957年在重庆第二针织厂（会计）打成右派
- 48、全在云——成都人，1927年8月生，高中文化。1957年在重庆市电信局邮电工会打成右派。
- 49、周维翰——重庆人，1920年1月生，初中文化。1957年在重庆市总工会商业工会打成右派。
- 50、程代泽——重庆人，1934年6月生，中学文化，参加西南服务团入川，重庆市总工会煤矿工会右派。
- 51、秦开端——重庆万县人，1924年2月生，大学肄业文化。（西南军区政治部电影科转业）1959年3月在重庆市电影公司打成右派。
- 52、刘耀荣——重庆巴县人，1933年8月生，小学文化，重庆电机厂右派。妻子离异。
- 53、邓万华——重庆巴县人，1933年12月生，高中文化，重庆市建筑工会右派。独身。
- 54、伊宗祥——重庆钟表公司右派，2009年7月15日去世。
- 55、胡九皋——重庆钟表公司右派。
- 56、周 灏——重庆锅炉厂右派
- 57、胡泽先——情况不详，“改正”之前去世。
- 58、谭范？——情况不详，“改正”之前去世。
- 59、傅绍清——情况不详，历反，“改正”之前去世。
- 60、刘迪光——情况不详，“改正”之前去世。

重庆市总工会右派名录

主席：张显仪

秘书长（常委）：邓 平（劳教）

生产部长（常委）：郭 平（病逝）

建筑工会主席：王延平（下放长寿湖）

宣传部副部长：罗志德（下放长寿湖）

重工业工会副主席：邓宗辉（下放长寿湖）

宣传部副部长（反党分子）：马季常（下放长寿湖）

轻工业工会副主席：丁固生

劳动教养右派：

陈湘涛 胡世济 朱国祥 邓荣森 庞 大 向贤杰 景显宗（？） 李文浩

江 虹

抓入监狱：

谢卿梁（肃反时被打成“托派分子”，入狱 25 年，见“王廷芳”）

下放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第一次 13 人

邢言绫 王廷芳 杨正秋 李多明 郑汉生 李宁熙 赵琨 程代泽

邓万华 王辅华 张 樾 陈 援 罗健华（以历反名义同时处理）

以后又陆续送长寿湖劳改的共 6 人：

王延平、罗志德、邓宗辉、周维翰、赵玉昆、刘文秀（历反）

1958 年底长寿湖未通过总工会直接划的右派：

刘 焰

不明情况的：

柳 青 丁可嘉 张德修



2009 年 5 月，重庆市总工会右派郑汉生在长寿湖讲起当年死亡在这儿的右派（谭松摄）

七、技术人员

当年岁数大的，没能等到今天的采访，这儿只有三个当年的年轻人：

- 1、李春华
- 2、郑光全
- 3、李建裕



长寿湖（谭松摄）

不说假话？定个顽固右派！

李春华

1957年交通部川江航道整治处技术员



1953年我从武汉大学水利学院毕业，分到南京。一年后，有个领导看中了我，调我到重庆，他说干三、五年放我回南京。

那个年代我们很听领导的话，别说去重庆，就是去深山老林也会毫不犹豫，真正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当然，没料到三年后变成“阶级敌人”，回不去了。

1957年我27岁，在交通部下属的川江航道处任技术员，机关团支书，处办公会秘书。那时我思想活跃，风华正茂，在科研上，我发明了“急流滩图解法”——专门整治川江急滩的科研成果；文学上我喜欢写点散文、通讯；政治上，无限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组织上正考虑发展我入党。还有，我爱唱爱笑，对人和气，人缘极好，原本与右派不沾边，也不会有人要整我。

川航处领导一直在闹派性，一把手李立明是交通部派来的，他与地方实力派郑XX、杨XX势不两立，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搬不动谁，1957年反右提供了整人的机会，这个机会对双方是公平的，区别在于谁更心狠手辣，卑鄙无耻。一把手李立明工作能力强，业务水平高，群众关系也不错，还占据着一把手的有利位置。但是，在“无中生有”、“心狠手辣”这些“智慧”上，他不是杨、郑二人的对手。

他们的内斗本来与我无关，倒霉的是杨、郑二人把攻破对方的突破口选在我身上。他们精心编造了一份材料，要我照此揭发李立明。我一看那材料傻了眼，我从来没听李立明说过那些话，办公会记录上也没有那些东西，纯属栽赃陷害！我断然拒绝。他们用入党、升官来劝诱我，反复做工作，我还是不干。他们一怒之下，把我关起来逼供。

以前看古装戏，县老爷审案，惊堂木一拍，一声断喝：“这厮狡诈，不打如何肯招。”80大板打下来，皮开肉绽，什么口供都有了，既简单，又快捷，破案率也高。

我没有挨板子，挨的是不准睡觉。

我一想起三天三夜不准睡觉的滋味至今心发抖。说起来没有动刑，打得血肉横飞，但几天几夜疲劳折磨，逼得人发狂，头痛得要炸，我好几次烦躁得要往墙上撞。最后我实在挺不住，在那份诬陷材料上签了字。但是这实在有违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怎么能平白无故地陷害一个人？所以，一旦我睡了一觉，马上翻供，翻供又抓起来整，受不了又签字。这样反反复复整了几个月，我身体垮了，我的脑子受了很大的损伤，从此经常失眠、头痛，至今留有后遗症。不过，我坚守了我做人的准则。他们一气之下把我划成右派，勉强给我安了个罪名——赞同右派言论。

杨、郑二人不死心，接着寻找新的突破口。他们找了一个年轻女人——医务室的护士。这位护士曾经护送李立明去黄山疗养，既然是一男一女，不妨往那方面整。女护士被找去“谈话”，这一“谈”，便“谈”了好些日子，最后的结果是，女护士招认了她同一把手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白纸黑字，李立明有口难辩。

我当时就怀疑女护士的招供是被逼出来的，我受过那种审讯，知道厉害。她一个女人，不一定受得住。你想，女护士才结婚不久，爱人在我们同一个单位，不是受到极大的压力，她怎么会把这种事扯到自己身上。

李立明被定为“坏分子”，1958年发配长寿湖。他从处座的位置上栽下来，憋不下这口气，在长寿湖仅仅三年，就气闷而死，死时还不到四十岁。

郑、杨他们说，我本来没什么问题，但太犟，所以，定我个顽固右派，发18元生活费，押送大巴山通江农场。去的途中，睡在一个破房子里，我为了照顾民航的熊明鑫，半夜从楼板上摔下来，脑子又受了一次损伤。

在通江，一个叫郝士风的右派死在那儿。他是我们单位的供应科长，只因说杨、郑二人是红鼻子就被划为右派。他已四十多岁了，有严重的胃病，去通江前，他明白这一去就回不来。临行前他给老母下跪，说：“妈，我侍候不了你了，是儿子不孝，对不起你。”我当时在门外，听见他们全家人哭成一团。他到通江后，很快死在那儿。

我们100来人的航道处，划了20多名右派，按5%的右派指标算，超额15%以上，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往上报。市委后来觉得太多了，不再批，杨、郑二人才没有继续扩大战果。到反右结束时，他俩已经把给自己提过意见的，甚至没得意见，只流露出一点不满的人，整肃得一干二净，有些人甚至被直接送进监狱劳改。

1958年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我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对共产党无限热爱，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之后，我变得沉默寡言，胆小如鼠，一点小事就怕得不得了。在通江，我对整个运动并没有认清，我以为反右是正确的，我被整是因为杨、郑二人太霸道，乱整人，共产党本身没问题，对毛泽东我还热爱、崇拜。到长寿湖后，遇到了一些很有水平、有见识，也很有胆量的右派分子，是他们让我认识到问题出在毛泽东、共产党身上。例如，市党校的右派周西平对我说，共产党内斗争一向残酷激烈，共产党解放前就整人。又如，在1960年最艰苦的日子，团市委的“反党分子”谭显殷对我说：要坚持住，反右是颠倒的历史，一定会颠倒过来，否则中国就不会前进。有的右派甚至要帮我找女朋友，说：右派也是人，为啥怕结婚？！不怕，我们给你找对象！这些话对我启发很大，鼓舞也很大，帮助我从悲观绝望和胆小怕事的状态下挣脱出来。1962年，我同长寿县的一位姑娘结了婚。所以说，长寿湖是我思想认识转变的地方，从热爱党、崇拜毛走向反面。

采访时，李春华取出一份1997年四川省交通厅内河勘察规划设计院的文件给我看，上面的主要内容如下：

1976年、1977年、1989年、1991年及其以后运用“急流滩图解法”对羊滩、桃花滩、朱石滩、叉鱼碛滩、小角邦、大角邦和坳角等激流滩的整治施工，证明效果非常好。

通过对嘉陵江、岷江、乌江等山区河流急滩的整治、设计和多年的实践，证明该急

流图解法对山区航道的整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急流滩图解法”是我1957年的科研成果，那时我充满了创造力。我27岁发明的东西几十年后还在应用。但这几十年我一事无成，只在档案袋里留下了厚厚的思想汇报、自我检讨和翻案材料。1997年给我的这个肯定还有什么用，我早就退休了。

不过，想起来这还不是最令人悲愤的，那个逼人说假话的东西才不是个东西！不要我搞技术、搞发明也罢了，非要我昧良心说谎！我受不了！我这个人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宁愿死也绝不诬陷人。可是，你看看，那些说谎做假卑鄙整人的人，一个个升官发财（譬如1957年诬陷我“连毛主席都骂”的人，事后马上升官当了段长。），而坚持良心，有正义感的人一个个被打成坏人，阶级敌人。现在也是这样，说假话的得利，说真话的遭殃，连评职称都如此，弄虚作假的评上了，埋头苦干的被淘汰，结果大家一窝蜂地去做假。

还有腐败，我简直看不到一点希望了。说国民党腐败，它哪里敢同共产党相比！我父亲是上海交大毕业又留学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曾在国民党铁道部渝汉铁路局当课长。他，还有他那些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朋友，一生清正廉洁。共产党当政后，仔仔细细清查过他们，只查出他们参加过国民党的一次会议，未发现任何贪污腐败。（后来共产党把这批人全部打成历史反革命，迫害几十年，就是根据那次会议报到的签名册。）现在共产党的官员，有几个经得起查？

除了腐败，共产党还有个大病，就是内部不停地斗，斗得你死我活。我们航道处前前后后十几任党委，没有哪一届不是勾心斗角，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最喜剧的是，1957年联手把李立明斗下去的杨、郑二人，十多年后郑反戈一击，将同一条战壕的杨“战友”一闷棍打了下去，取得了最后胜利。

你问我这辈子最大的教训或者说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我觉得是不能讲老实话。说老实话要付出惨重代价，我就是例子。可惜，虽然我认识到这点，但我还是做不到。27岁的我做不到，71岁的我还是做不到，明明是驴子，我不能说成是马，这是我做人的底线。今天我对你说的，就是老实话，是真话，最后我要说的话就是，我当年热爱的那个党已经烂透了，我当年热爱的这个新社会已经没有希望了。

采访时间：2001年5月31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采访后记

在我童年时代，李春华是我父亲长寿湖难友中不时来家走动的人。他是单身汉，很喜欢小孩，常常抱着我们，给我们讲故事。我小时唯一的一件玩具（一盒拼搭汽车、吊车的铁片），就是李春华送的。当然我不知道他那时只有18元生活费。

2001年3月初，我回父母家无意中提到李春华，话音刚落，门铃响了，进来的正是他！冥冥中一定有神灵，这个神灵一定在昭示着什么！

我已经有整整三十多年未见到他。李叔叔老了，头发已经花白，手微微颤抖，但是，那双眼睛仍然那样和蔼，那样善良，那样亲切。

我们谈到了长寿湖，谈到反右运动，谈到那血泪斑斑的苦难岁月……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李叔叔，心头有一股热血一阵一阵地涌动。

我觉得我应当做点什么。

妈妈说：“你要做就得赶快，这些人年岁都很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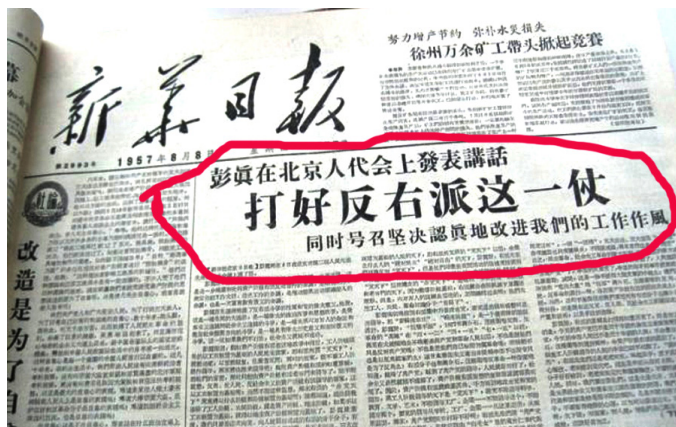
那一刻，我已经作出了决定。

3月底，我同原单位彻底解除了关系，怀揣着一个“重庆市企业职工下岗证”和一次性“买断”的4000元钱，作为“社会闲杂人员”（李鹏总理发明的词），走上采访之路。

李春华是我采访的第三十位老人。他为坚守良心而付出的惨重代价，以及付出这种代价之后依然坚守良心，给我一种激励和感召。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想把一个个老人的故事，作为礼物，送给儿童。

(2001年6月1日)



活到这把年龄，憋得要死

郑光全

1957年重庆煤矿设计院技术员



我听说你在采访，我盼望你来，我早就憋了一肚子话，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党，太让人憋气，我经常出去同他们争论，我不怕，活到这把年龄，憋得难受！

我父亲解放前是北碚大明厂的厂长，解放后的命运就不提了。我哥哥中大航空系毕业，1945年加入共产党，1971年被共产党害死。我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理工学院，1956年分到重庆煤矿设计院，一年多后划为右派。

我的言论有三点：一是就波匈事件发表议论，说怎么能把坦克开到别国首都，怎么能随便换别国的领导人，二是赞同马寅初的人口论，三是认为领导应当懂业务，尤其是分管业务的领导。给我定的罪只有一条：“破坏中苏团结”。

这个罪名我直到1979年“改正”才知道，定罪时没给我说，我刚刚听说我为之劳改22年的罪名是什么时，就宣布这个罪名不成立，我忍不住当场大叫一声：“捉鬼放鬼都是你共产党！”你想，古代苏武放羊才19年，罚我劳动改造22年，整得我人虽然没亡，家却破了，至今独身一人。

我不认罪，咬定你共产党自己说好的“言者无罪”，而且我没偷没抢，有什么罪？不认罪？好！罪加一等，划为顽固右派。

我妻子同我一个单位，我们结婚才一年，划我右派时，她已经十月怀胎，快生产了。组织上给她作工作，要她“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强迫她与我离婚。我们离婚时，距我女儿出生只差十几天。

离了婚，她还是没跑脱，仍然被扫地出门——右派家属一律不准在本单位工作。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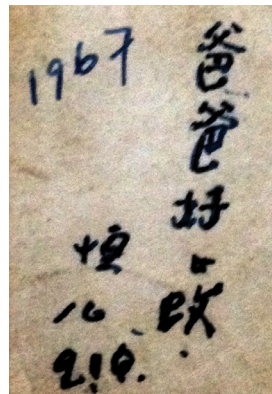
郑光全与妻子 1957年

儿刚生下来，她就离开了她，独自远走贵州农村。因此，我女儿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不仅没吃过一口母乳，而且根本就没有见到妈妈，她是我母亲用牛奶喂大的。在她的成长年代，她不知道母亲是谁，也不知道母亲在哪里。她一出生就面对一个破碎家庭和一个右派父亲。

前几年她母亲（后来她发奋考上大学，现在是一个副教授）找到女儿，出钱给她买房子，我想她感到了内疚。

女儿受我影响，初中毕业后就不准她读高中。她只得去考了一所中专校，尽管上了分数线，但发现我是右派，就不录取。

另外，在她读书时，学校老师经常教育她：你父亲是右派分子，是反动派，你同他一定要划清界限。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经常说：“反动派，打不倒。”她用些语录来教育我，要我好好改造。



1967年春节杨恒送给爸爸的照片

背面写着“爸爸好好改(造)”

1958年我下放到南桐山区农村，那地方穷得很，我去了连床都没得，农民提供了口空棺材。我睡棺材里，静得怕人，黑得恐怖，我想到这场飞来的冤祸，想到离婚的妻子，刚刚出生的女儿……这是最容易将人击垮的时刻，精神可以在一夜间轰然倒塌，永远埋葬在棺材里。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奋身而起，在黑暗中首先庄严地自己给自己宣判无罪，接着引用古巴卡斯特洛的话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嘿！这句话后来成了我强大的精神支柱，我之所以没有死，全靠这个信念，很多右派没活下来，就是精神垮了。我们一块下去的右派刘光明十分绝望地对我说：这辈子完了。我告诉他，历史将判我们无罪，不过要等那个“毛万岁”死了才行。“毛万岁”已经80多岁了，我们才20多，肯定活得过他。嗨，刘光明不仅不听我的，后来还揭发我，害我挨了几天斗，他自己也垮了下去，1960年饿死在长寿湖。

我自己给自己判了无罪，坚信历史会判我无罪，眼下过的每一天都是在等“毛万岁”驾崩，我才不像其他右派那样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劳动改造。我悄悄溜到镇上找人下象棋，消磨“送给毛泽东的时光”，另外，偷吃能够偷吃的一切东西，这是保存“革命的本钱”，等待历史判我无罪的那一天。在南桐最艰难、不少右派死亡的日子里，我干脆偷跑回城，躲在母亲身边。到长寿湖之后，我更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守着这么大大一个湖，我才不会去饿死，湖里的鱼说是国家财产，偷吃是犯罪，但谁又对我们犯罪了？嗯？！所以，正如共产党说的，关键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认识清楚了，哪有偷不到鱼的？长寿湖这么大，湖广人稀，岛子众多，晚上悄悄下根线，第二天保证收条鱼，就是生吃，也可以救条命，我们煤矿设计院下长寿湖8个人中，刘光明和焦光复饿死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因为没有解决认识问题，还在一心一意按共产党的要求改造思想，争取重新做人。告诉你，我在南桐和长寿湖都没有吃太大的苦，除了我求生本领强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解决了认识问题，又有精神支柱，在右派中，像我这样想得开，精神愉快的人极少。

把南桐和长寿湖相比，南桐地理环境恶劣，但精神压力没有长寿湖大，长寿湖成天绞磨你的灵魂，折磨你的精神。管理人员鼓励右派之间互相告密，互相批斗，有些管理人员本身就是有右倾问题的下放干部。

这些本身因右倾受了处分的人，“左”起来可怕得很，他们想用“左”来洗刷自己的右，得到上面的赏识。尤其是某些摘了帽，当了组长的人最混帐，比奴隶主的监工还要厉害，例如，出版社的摘帽右派 XXX 为了创造先进，取消一切休息，强迫其他右派像奴隶一样拼命，有些右派的死亡直接与这些组长有关。其实共产党并不因为你摇尾乞怜而将你从狗变为人，最多不过让你多得一根骨头，何苦呢？这又是认识问题。

但是，中共的那个“划清界线”、“认真改造”压了我二十多年。在长寿湖时，有一个叫马文碧（音）的姑娘，她听她父亲说，右派不是什么罪人，而是些很有学问的人。她爱上了我。我们不敢公开交往，只有暗地里往来。她说，你快点改造好，好了之后，我就同你好。可是，我们私下的爱恋被人发现了。我被抓出来批斗，说我毒害青少年。同时，马文碧也被警告，说她敌我不分，怎么能同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往来，还要谈情说爱？

她只有承认自己错了，断了同我的交往。十多年后我获得平反回到城里，她马上打电话来祝贺我。

这时，她已经有小孩了。



1973 年春节邓光全与女儿、父母合影

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郑光全老人很少谈自己的苦难，而大多时间在抒发今天的感叹和悲愤。

郑光全：1949 年走进“新社会”后，国民党时代还存有的一点民主，被共产党扫荡得干干净净，中国五千年史上，建起了空前残暴的独裁统治。毛泽东这种人出现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绝对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算不提“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光是他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性，强奸了中国人的精神，摧残了中国文明道德，就足以使他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秦始皇哪儿比得上他？！唯一能同他媲美的只有苏联的杀人魔王斯大林。他们俩是共产主义大旗下的一对孪生狼兄。有人用 16 个字来形容毛泽东，我认为非常准确，这 16 个字是：“嫉贤妒能，背信弃义、口蜜腹剑、心狠手辣”。对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至今还把他供在水晶棺材里顶礼膜拜，至今不敢揭露他的罪恶，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再说共产党，可以说，中国这几十年的一切灾难都集中于一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个党无所不管，无所不占，管制人它可以理麻你半夜在想什么，同老婆说了什么话，占有物可以把全社会的所有财物都归到它门下。我看见党委那一班人心头就有气，看见那层层叠叠的人大政协心头就烦，各级党委除了制造麻烦还能做什么？养那一群人大的政协，除了花纳税人的钱，还能起多大作用？说来实在可悲，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到现在，我们还拥有如此专制独裁的政党，还拥有如此臃肿落后的政权。一个政党强占一切宣传工具，垄断所有新闻媒体，自己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简直无耻之极、专横之极、虚伪之极！

我们院的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们，个个都是贪污分子。副院长因贪污腐败已经被抓起来了。这个政权、这个政党已经烂透了！国民党时代还有游行示威，还有新华日报，还有社团组织，还有不同的声音，现在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声音，就是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声音。假话、空话、大话把人都要憋死了！！

我现在每天听美国之音、亚洲自由广播电台、英国的BBC，就是想听点真实的声音，让灵魂透口气。我听到香港为纪念“六·四”游行，感到很欣慰，中国还是有希望，中国人的良心还没有死绝。对了，共产党内我最敬佩李慎之，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最敬佩戈尔巴乔夫，他们是共产党内良心的代表。但是，我们绝不能对共产党抱任何幻想，共产党从来都是背信弃义！共产党、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我现在越来越坚信我的看法，中国要发展、国家要富强、社会要民主，人民要解放，必须废除一党专政！

我这样激愤，并不是因为我57年受了冤屈，也不是因为我唯一的女儿吃尽了苦头，更不是因为共产党害得我至今孤苦一人没有家室，而是看到它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苦难，我心中郁积的悲伤和愤怒太多太多，没有地方可说。现在的文人我非常瞧不起，一个个毫无骨气，一门心思在共产党体制内捞名捞利。我对你有个要求，你要写就照实写，大胆写，我巴不得你写出来，共产党要来抓就来抓，我快70的人了，把我抓进监狱去，死，无所谓。

采访时间：2001年5月28日 地点：重庆市大坪

采访后记

采访郑光全时，下着瓢泼大雨，天，十分阴沉，雷声阵阵。我在煤院宿舍的一间底楼里找到郑先生。

他的客厅窄小、阴暗、尤其显得潮湿。他是一个孤身老人，1957年妻子离他而去后，从此他没有再婚。现在他最大的安慰是他的女儿，提到女儿，他眉飞色舞，这是他比白永康幸运的地方。

初次见面，刚刚落座，郑先生就扯开嗓门，毫无顾忌地谈起来。说到激昂处，他从椅子上跃起来，又是挥手，又是扬眉，仿佛这不是他家的小客厅，而是广场上的大舞台，他也不是一个孤独老人，而是“五四”时奔啸于街头的热血青年。

他最大的苦恼不是孤独，而是“没有说话的地方”，每每“夜半狂歌悲风起”之后，是“报国欲死无战场”。

注视着这位老人，我想起辛弃疾的词句：“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他说：“你大胆写，照我的原话写，我不怕，再把我抓去也无所谓。”

眼下，我怎么老是在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身上看到久违的正义、久违的良心、久违的勇气？采访《重庆大轰炸》的老人如此，采访长寿湖的老人也如此。

难道，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毛主席说，5%的人是坏人

李建裕

1957年重庆煤矿设计院助理工程师

1934年生



我当右派据说是还有一个名额没完成。记得那时领导讲：毛主席说，5%的人是坏人。

1957年我毕业才一年多（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年轻，单纯，工作热情高，积极上进，家庭出身好，本人没有任何历史疤痕，领导对我很器重。我到设计院很快担任了政治辅导员，代理科长。1957年鸣放，我是科室召集人，主持人。

划我右派，有两条罪状。

一次选工会干部，我们认真真讨论、提名、推荐，当一回事在做。那晓得领导早就内定了人选，各个位置已经名花有主，所谓选举完全是空过场。我是个技术员，没多少政治见解，但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把民主看得很重。我非常气愤院领导的这种作法，在选举会场拂袖而去。

事后给我定个罪：破坏选举。

我们科室有一个印尼华侨叫黎体仁，英语棒得很，抗战时期，他给美军当翻译。解放后搞肃反，把他抓起来，说他历史有问题，关了几年，老婆离婚，他为这事愤愤不平。鸣放会上，他提出一个条件，要院办公室主任来了他才发言。我去把主任找来。他一见到主任，情绪就激动，滔滔不绝控诉主任当年迫害他（是主任整他的材料），害得他人被关，家破裂。我是主持人，没阻拦他，为啥没阻拦？因为头几天科室鸣放空气很沉闷，没人发言，好不容易气氛热烈。我想把各项工作都抓积极，就是这个心理。其实华侨的事，我也不懂，我才毕业一年多。

结果，获得第二个罪：包庇反革命分子，翻肃反的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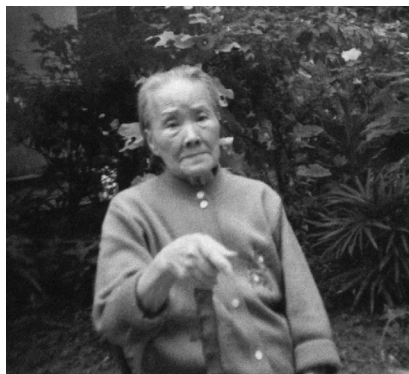
读大学时的李建钰（右）与弟弟和母亲

你好笑？是的，我也觉得荒唐。不过，划我右派据说是有个指标没完成，记得那时上面讲，毛主席说，5%的人是坏人。反右就按这个比例整。单位要完成指标，完不成是阶级斗争没抓好。剥削阶级不甘心灭亡，总要向党进攻，所以要不断地按人口比例抓。当时，一会听说这儿抓了多少，一会那儿抓了多少，抓得越多，越忠于党。设计院抓了二十六、七个，如果我还当院长，也要抓那么多，不能落后，要争先进，

抓得多市委要表扬。

我先被发配到南桐，安排到一个最苦最穷的农民家，说是最苦最穷最革命，有利于改造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习气。每个月发给我8元钱生活费。我没成家，只有个母亲，母亲千辛万苦供我读完大学，我是她的骄傲。我当右派下放农村，她又急又气又担心，天天哭，不到一年时间，双眼哭瞎。

这儿我给你说一个医生，他叫吕钟立（音），是英国留学回来的眼科专家，非常有名。我妈找他看病时他正在挨斗，一阵阵口号和辱骂整得他垂头丧气。斗完了叫他看病人——病人已经等了一长串。他丧着脸问我妈：“哪点不好？快说！”我妈回答：“哭多了，眼睛看不见。”“你哭啥？”“我儿子被他们弄走了。”我妈把我的事讲给吕医生，吕医生没再多说，认认真真给我妈治病，我妈的一只眼睛就是吕医生救下的，我们感谢他一辈子。



为儿子李建钰哭瞎了一只眼睛的母亲杨素芳

1960年，我被转到长寿湖，在三台喂猪。让我喂猪，是党对我的信任，是恩惠。为啥？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右派不准当“五员”——保管员、记分员、饲养员、炊事员（还有一员记不得了）。右派是敌人，敌人要报复、投毒、使坏。

在灾荒年当饲养员的确是恩惠，可以偷吃猪食，填肚子。我们设计院一块下去的右派刘光明和焦光复在三台对面的桐梓沱劳动，活活饿死。刘光明死前带信给我，要我一定去看他。我划船去，发现他已经站不起，直挺挺睡在只铺了一点谷草的地上，蓬头垢面，面色惨白，双眼凹陷。真的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我一直抹不去。我空着手去看他，什么都没带，只好说几句话安慰他。多年来，我为这事很伤心，我要是给他带几斤红苕去，让他落气前吃顿饱饭也好呀。

我在长寿湖干了二十一年，一直没成家，不是不想，是怕。我看到有家室的右派，活得累。我们单身汉中，有个叫欧文定的右派，憋得慌，忍不住去追渔场的女青年，所谓追，不过是色迷迷地盯着人家看。他也不想，自己是什么人，想吃天鹅肉？他没沾着一滴腥，弄了一顶“坏分子”帽子，抓进监狱蹲了十年。

这事本来可大可小，斗一场也可以了结。有个组长叫李XX，他一手策划，置欧于死地。这个人是个摘帽右派，算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但他为虎作伥，在别人伤口上洒盐，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新华社的右派王华东因写日记，也差点被他整进监狱。他当年整人太多，所以，现在长寿湖难友聚会，他一直不敢来。

我是“改正”后从长寿湖回来才结的婚，都快50岁了。我算好的，成了个家。想成家想得要命的欧文定一辈子打光棍，前几年死在床上都没人知道。

那二十一年，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刻骨铭心，说给你你也发表不出来。

留给今后？好，好，我等，等那一天，等不到就在九泉之下读。

采访时间：2001年12月4日 地点：重庆市大坪

采访后记

出门时，有点濛濛细雨，赶到设计院宿舍大院，雨下大了，我光着头，狼狈不堪。

院内正在施工，路阻断。我正焦急，宿舍楼里出来一位40多岁的妇女。我问，能否从左边绕到后面去，她盯了我一眼，冷冷地说：“可以。”

我出铁大门，往左而去。

沿途的高墙、铺面，水泼不进，我这一绕，绕了二十多分钟，一大圈，几乎又回到原处。

在铁大门右边50多米，便是一扇通往宿舍院后部的门！

那位住在院内的妇女不知道？

我湿淋淋走进那道门，在12月冬风中冷得发抖。

我想起一个雾濛濛的早晨，我到市党校采访刘康，偌大的校园内四下无人。

远处款款走来一位窈窕女子，靓丽高雅。我一般不向这种佳丽问路，除非万不得已。

“请问……”，我彬彬有礼地问。

佳丽既不减速，更不停步，头向上一翘，鼻子里哼给我两声，高跟鞋敲出节奏，转眼是个远去的背影。

我立在那儿，鼻子吸着她飘散的甜甜香气。

采访中，这类“寒冷”遭遇不少。

去年此时，我在悉尼街头迷路，空荡荡的路上好容易来了一个金发碧眼，我“万不得已”地把她拦下。她满面笑容，最后还带我走几百米，找到她的一位朋友，送我一张地图！

我们传统文明中，原本也有那种热情和友好，我们日常生活里，本不应有这种冷漠和自私。

眼下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与冷漠自私是如何生成的呢？

1957年应当是一个研究重点。

我湿淋淋叩响李建裕的门。

部分技术人员右派简况

1、胡尔勤之死

胡尔勤——浙江人，1927年8月生。大学文化，专长英语。1958年4月在重庆市煤管局建筑安装公司计划科打成右派。胡尔勤1956年从上海来重庆。1957年鸣放期间，胡的好朋友（一块从上海来的同学陈颖）写了一篇大字报。反右时，领导追查该大字报的作者，快查到陈颖头上时，陈颖慌了，他正要同上海的女朋友结婚。胡为救朋友，主动找领导承认自己是作者，由此当右派，下放长寿湖。

十年之后，胡忍受不住，觉得这个忙帮得太大，他找到领导，说明了真像。领导回答：你已经当了这么久，没法改，哪儿去找人来替你？只有继续当下去。

几年后，1972年，胡一次劳动回来，下湖洗澡，他避开其他人，单独找了个地方，不幸跌入深水区淹死，遗体埋在同心岛楠竹坡，终年38岁。

遗物中发现他保存了十多年的一张照片——他当年的女朋友。

（注：采访中，很多人都提到胡，共同的评价是：一、老实，二、英文极好。

睡他上铺的李建裕曾在“改正”后，到上海找他的姐姐，但未找到。与胡一个单位的右派朱恩源告诉我，当时夕阳西沉，他远远看见胡沉下去，他似乎笑了一下。

胡究竟是失足淹死，还是存心自杀，只有他本人和湖水知道。）



胡尔勤遇难处和陈遥之投湖自杀处——同心岛（谭松摄）

2、焦光复之死

焦光复——煤矿设计院职工，因一篇日记被打成右派。日记记载：今天全院停工打扫卫生，说是苏联专家要来，院内平时卫生很差，领导无所谓，有客人来，就全体动员，里里外外打扫，做表面文章。

焦光复被划为右派时只有17岁，于1960年饿死在长寿湖，终年20岁。

3、刘光明——重庆煤矿设计院技术员，右派，1960年饿死在长寿湖。

4、冯瑞勇——重庆煤矿设计院右派，在长寿湖精神失常。1983年去世。

5、罗安琼(女)——重庆煤矿设计院右派。在临上车前往长寿湖时，罗突然放声大哭：“我有三个娃娃，我一走，他们怎么办？”罗哭声凄惨，押送的丁书记发了慈悲，说：“算了，算了，你就留在院内打扫清洁。”罗因而未下长寿湖。

6、胡 蓉(女)——重庆煤矿设计院右派。

7、罗美灿——重庆煤矿设计院右派，未下长寿湖。(现情况不详)

8、彭兆亮——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重庆煤矿设计院的才子，因说政府对地主太残酷而被划为极右，押往四川省雷波县劳改，后放回湖南农村劳改。1979年获得改正时头发已白。

9、黎体仁——重庆煤矿设计院，印尼归国华侨。肃反运动期间受迫害，被关押，妻子与他离婚。1957年鸣放时他对此表示不满，被划为极右，押往四川省雷波县劳改。(现情况不详)

10、张学渊——忠县人，1928年12月生，大学肄业文化。重庆煤矿设计院工程师，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11、吴希麟——仁寿人，1924年4月生，大学文化，重庆煤矿设计院工程师，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12、张汝闾——贵州人，1926年3月生，大学文化，重庆煤矿设计院工程师，右派。妻离异，有四子、一女。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13、周家元——泸县人，1936年1月生，大专文化，重庆煤矿设计院右派。(书记、院长宣布：本应降三级处分，因无职级可降，发给生活费下放农村劳改。)周家元于2009年10月去世

14、邓家琦——键为人，1927年4月生，大学专科文化，重庆市煤矿设计院右派。

15、李成中——重庆煤矿设计院右派。

16、冯瑞勇——重庆煤矿设计院右派，改正前去世。

17、张万金——长航右派。1959年在长寿湖石高滩过独木桥时被洪水吞噬，次日水退后在下游老虎口崖缝中发现尸体。张被埋葬在老虎口对面的河边，终年30多岁。

18、胡咸中——1949年前的大学生，川江航道处财务科长，因给领导的霸道作风提意见被划成右派，1961年从长寿湖外逃，被抓住后跳河(跳车?)自杀，死时30多岁。

19、杨 林——孤儿出身，航道处职工，反右时说了一句“若惹到我，我就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被划为右派，在一次斗争会后跳长江自杀。未婚。

20、廖西台——长航海员工会右派，1960年死于长寿湖，死因不详。

21、郝士风——航道处供应科长，右派，1958年死于通江劳改农场。

22、蔡观强——航道处技术员，一次在河边测量，无聊时在沙滩上写了几个字，被认为思想反动，划为右派，入狱，几年后死在劳教所。

23、李立明——航道处副处长，1957年被整为“坏分子”，1965年郁闷而死。

24、薛秉农——长航长江轮船公司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25、卢昌绪——长航长江轮船公司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26、谢重开——重庆唐家沱东风造船厂高级技工，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27、刘抚万——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游工程局工程师。在一次闲聊中，有人说“积极

分子是英雄。”刘说：“啥英雄？狗熊。”刘因此被划为右派，下放长寿湖，1973年调回，2001年去世。（与刘曼若是长寿湖的兄妹右派。）

- 28、周正林——长航“坏分子”（“生活作风”问题），1961年在长寿湖服毒自杀。
- 29、梁 湘——长航历反（因中学加入三青团，并当了一个干部）。
- 30、林木森——长航技术员，右派。
- 31、李功成——长航党委宣传部长，因说回老家看见农民很苦而划为右派。
- 32、信宝堂——长航右派。因工手致残，提意见说领导不重视安全而划为右派。
- 33、顾崇义——长航工会宣传部长，右派。
- 34、李潜修——长航工程师，右派，2003年去世。
- 35、莊漪兰（女）——长航右派（现在北京）。
- 36、杨宝珍（女）——长航右派（现在丰都）。
- 37、关 XX——长航最小的右派，划右时不足18岁
- 38、龙 生——长航右派。
- 39、朱 XX——长航右派（现情况不详）。
- 40、杜执忠——长航右派（现情况不详）。
- 41、廖 翔——长航右派（现情况不详）。
- 42、刘全友——情况不详。
- 43、周伯华——情况不详。



八、舞台人物

当文艺团体中的右派分子不少，但好多都没能熬过那段岁月。幸存者似乎大多看透了人生这幕荒诞剧，不愿向一个后来者掀开那一角沉重的幕布。拒绝者继续沉默，接受者大多话语不多。

- | | | |
|------|-------|------|
| 1、诸溪 | 2、李正 | 3、康敏 |
| 4、万声 | 5、肖培禧 | 6、陈华 |



1957年反右漫画（陈华画）

唱了几首歌，坐了 20 年牢

诸溪

1957 年重庆市歌舞团独唱演员

1926 年生



1949 年，我进入新社会，50 多年来，唱了几首歌，坐了二十多年牢，劳改前后 25 年，然后退休吃闲饭 20 年。这一辈子，怎么说呢，我被坏分子打成坏分子，被盗窃犯打成盗窃犯，被扒手污成扒手，这个新社会呀……

我是南京人，1926 年生，出生于一个家财万贯的富豪之家。父亲是大生意人，11 岁那年，日本人打来，我们家产全部被毁，父亲病亡，母亲一气之下上吊自杀，家里仅剩我和祖母，所以我这一辈子都痛恨日本人。我在沦陷区长大的，有强烈的爱国心，一心渴盼国家强大，富强。我觉得国民党腐败、独裁，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所以，1949 年我坚决不跟舅舅去台湾，而加入了共产党的第二野战军，在军政文工队当独唱演员。

我第一次坐牢是 1952 年，那时我们驻扎在四川简阳，队里有一个采购员自杀了（当时搞三反运动），尸体是一个叫王振东的小演员发现的。上面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抓起来咬定凶手是他，王不承认，不承认就押出去枪毙，王吓得屁滚尿流，赶紧承认。但是一押回来，马上翻供，又押出去，王又赶紧承认。说他是什么他就承认什么，中统特务，军统特务，都承认。王虽然承认了，但上面觉得他只有 17 岁，还不成熟，背后一定还隐藏着老奸巨猾的特务。当时同王接触得比较多的一个是乐队指挥安啸北，他教王拉胡琴，另一个就是我，教王唱歌，我们有时晚上就在花园里练习。他们不由分说，一把把我们俩抓起来，脱掉军装，穿上黑衣，关押入牢。你听没听说过当年在苏区抓 AB 团？就是那种模式，平白无故认定你是特务，设一个套子诱你往里钻，用各种手法逼迫你承认。比如半夜三点突然把人提起来，劈头问：“姓什么？接头的是谁？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还有什么话说（指遗言）？”等等。共产党有个很坏的作法，不问青红皂白先认定你是坏人。他们给我带上手铐脚镣，威胁要枪毙我，我知道他们做得出来。我要来纸和笔，准备给我在南京的祖母写信，也算遗书吧。我拿起笔突然不知怎么写，说我是冤枉的，信寄不出去，说我犯杀人罪被枪毙，那还不把我祖母气死？！我越想越气，越想越冤，干脆不写，那天我豁出去了，慷慨激昂地冲他们嚷：“我诸溪不顾一切留在大陆，抛弃工作，参军入伍，是一心一意要跟共产党走，我那么热爱党，那么热爱毛主席，你们非要把我整成敌人，整成特务，杀吧，杀，杀了把我的心挖出来看……”

我原本是歌唱演员，声音宏亮，又是生死关头的叫喊，这还真把他们震住了，所以后来宣布王振东、安啸北死刑，我则暂不枪毙，说是还有重大问题。死刑还未执行时，

部队开赴朝鲜，我们被解押到省军法处，这救了我们的命，因为他们终于弄清了采购员确系自杀，我们被放出来时已是1953年年底，共坐了22个月的牢。我们中最不幸的是安啸北，他有妻子儿女，精神压力极大，他在牢里大叫：“张XX（他妻子），我没得事，你要把娃儿带好。”放他出来时，人已经疯了。他挨打呀，给他戴一种叫“童子拜观音”的刑具，那是两个铁圈，一头勒住脖子，一头铐住双手，中间一根铁棍固定，戴上这种刑具，双手不能往下垂，稍微一动，颈子就痛得钻心。

尽管遭此牢灾，我对共产党、毛主席仍然非常热爱，非常崇敬，仍然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你刚才看到的那张照片，就是我出狱后不久照的，你看那精神！

195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重庆歌舞团当了一名独唱演员，不久成了家，有了一个女儿，妻子是铁路文工团的一个演员。

1957年我没有鸣放，也没把我打成右派。1958年底，歌舞团舞蹈组的组长来通知我，说组织决定我下放农村劳动，没说任何理由，也没说劳动多长时间。那时的人很听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我背起被盖就去了。

在南桐农村，我才知道我已经被开除公职，一分钱工资都没有了。犯了什么罪，我一无所知。我回去问，歌舞团的人厉声呵斥：“你自己的事自己还不清楚？！”

后来，我清楚了——那是20年之后。

在南桐，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饿得惨呐！“大跃进”越深入，饿死的人越多，到最后我们靠吃红苕叶子充饥，我们那一带青壮年饿死很多，因为他们要劳动，需求量大。

1960年，我同南桐的右派分子、历反分子一起转到长寿湖，在长寿湖我定量是每月17斤粮，这点粮根本不够，我水肿，走不动路，于是派我到新滩去照守参子鱼。新滩是个斜长的水滩，参子鱼喜斗滩，我们抓住鱼的这个特点，在滩上挖了一个水坑，鱼斗滩上来落入坑中，我们守株待兔，每天收获上千斤。

同我一块照守的是重庆日报的右派詹光。新滩队的党支部书记叫陈XX，是长航来的干部，他经常把鱼批给他舅子，名义上是买，记得每斤是2角3分，100斤就是23块，运到城里去油炸了卖要4、5元一斤。他舅子拿张交款收条来，在我们面前晃一晃，用挑谷子的大箩筐装上满满一挑，说100斤，弄走的不止150斤，这还不算，他条子不交给我们，下一次用同一张条子晃一晃，又弄走一挑，如此反复多次。詹光看在眼里，不吭声。有一次，我忍不住，很委婉地对他说：“你还是适当点，你弄多了，我们说不脱。”

陈的舅子瞪了我一眼，走了。

不久，在捕鱼队煮饭的右派孙静轩赶来告诉我，要我当心点。他说，听见陈的舅子对陈说，诸溪这个人装怪。陈书记回答，装怪不要紧，他不听话就收拾他。

孙静轩叫我回家去看看妻女，万一被“收拾”就回不了家了。她的前妻是铁路文工团的团长，同我妻子熟。

我赶紧请了三天假，匆匆回了家，然后又回到长寿湖。逃跑？哪里敢？而且，没有钱没有粮，又没有证件，往哪里跑？

有一天，陈书记叫我到狮子滩去学习，我去了。进会场一看，杀气腾腾。不一会，有人高声宣布：“诸溪犯盗窃罪，盗窃国家财产参子鱼2万斤，判三年劳教！”

立马有人上来把我五花大绑。我虽然知道要被“收拾”，但那一刻还是把我骇昏了。同我一块被抓的有 36 个人，名字记不得了，因为我被吓得昏头昏脑。

我先被押到沙坪坝松山劳改转运站，然后被押送到北碚西山坪劳教所。我给妻子写了封信，说我被打成了盗窃犯，判了三年刑。这儿说说我妻子。她跟着我受苦啊，因为坚决不同意跟我离婚，单位惩罚她，把她下放到内江火车站打扫厕所。我被抓后，在更大的压力下，我们离了婚。离了之后，她的待遇马上提高了，从打扫厕所改为在火车站卖票。后来，她带着女儿改嫁了，女儿改了姓，不再姓诸。还有，我南京的祖母靠我赡养，我入狱后她断了生活来源，很快就去世了。

我在西山坪同扒手、小偷、妓女们关在一起，所谓扒手、小偷都是因为饿得要死，忍不住偷了一点东西，比如偷了几个馒头或者摸了人家一、两块钱，其中大多数是十多岁的娃娃。至于妓女，就更冤了，那些女人饿慌了，给碗稀饭吃，就献身，这就算作卖淫。

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关进来很不服气，大多不认罪。劳改所的干警想让他们认罪服法，于是找到了我——他们认为我有文化，有舞台经验，要我编剧、编歌来教育他们。他们给我看了一些材料，据此编剧。比如，有人摸了一个老人的两块钱，那两块钱是老太婆给她孙子买药的，老太婆很穷，丢了钱，买不了药，孙子发高烧死了，所以，偷两块钱也是大罪。

另外我还编歌，组织劳教人员演唱。什么“认罪服法……”、“逃跑无出路，害人又害己”等等。在劳教所我的这点“文艺才华”使我少受了许多苦，相比其他犯人，日子要轻松一些。

三年期满，我被释放，但我已无处可去，家没有家，工作没有工作，户口都办不了，只好留在劳改农场当一个就业人员。没过多久，一年吧，我又栽进去了。起因是这样的，劳教所有一个留场人员叫王 XX，当时十六、七岁，他因扒窃入狱，刑满后也留场。在一次上街赶场时，他又去摸人家的钱包，结果被抓住，送回来后他很害怕。一个叫柴 XX 的人教唆他：你就说是有人怂恿你去干的，这样就会从轻发落。王于是一口咬上我。我同王关系很好，把他当干儿子，教他文化，教他唱歌。王咬我之后，我被抓出来当作扒手的黑后台批斗。当时正是文革初期，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发了疯地大抓阶级斗争，大抓所谓的反党集团，这件事被一层一层上纲上线：诸溪为什么要叫王去摸包，因为诸溪需要钱，要钱来干什么，因为他仇恨共产党，要组织反党集团，组织反党集团需要经费，诸溪自己担任反党集团首领……，那个年代只要说发现了、破获了隐藏的或者潜在的反党集团，就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伟大胜利”，办案人员就要立功。至于是不是事实，则没有人去管它。就这样，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又判了三年。不过王诬告我也没有滑脱，同样判了几年。多年后我们相见，他连连向我道歉，说昧了良心，愿将仇报。现在他已是一个大老板。

那些日子很难过啊！打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见得多了，死人太多太多。一种是专政机关给你定个罪，抓起来就枪毙了。比如有一个姓周的右派，以前是从渣滓洞逃出来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永川劳改队被枪杀了，我亲眼目睹，临刑前他想呼口号，后面的人勒紧捆在他脖子上的绳子，他一声都没哼出来。这个冤案至今没平反，现在有一个叫吴明的很有正义感的法律专家在帮他申冤。

我再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歌舞团有一个叫马维聪的男高音歌唱家，一米八的个头，仪表堂堂，是团里的主力演员。饥荒年，他人高马大，饿得发昏，万般无奈中只得去偷。他穿戴整齐，气宇不凡地走进商店，叫服务员把一部高档相机给他看。他左摆弄右摆弄，乘服务员不注意迅速调包，在皮套里装进一部旧相机还回去。得手后他将相机换成粮票，吃进肚里。不多久，他又故伎重演，但这次他失手了，被抓进了派出所。在派出所，他死活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单位，一直拖到晚上8点多钟。为什么要拖到8点多钟？因为当天晚上有他的演出《货郎与小姐》，他是剧中的主角，男高音。他突然失踪，剧团只得宣布退票。8点多钟，马维聪估计观众都走完了，才供出自己的姓名和单位。他被押回来接受批判。这事本来认个错，写个检查也许就过去了，他毕竟是团里的台柱子。问题出在他死不认错，不仅不认错，还说：“我错了？全世界的男高音歌唱家有哪个像我，饿得被迫去偷？！这不是我的耻辱，是这个社会的耻辱，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你们！”

本来偷点东西是品质问题，马维聪居然敢指责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要用其它手段来解决了，于是，马维聪被公安抓走。

在劳改期间，其他犯人晓得他歌唱得好，不时叫他唱支歌，马维聪也放得下脸，说：“要唱可以，拿一块红苕来。”

不料，这又给他带来了灾难。马维聪不唱革命歌曲，不唱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而专唱一些民歌，民歌里少不了“哥呀妹呀”的，于是又有人去汇报了。那个年代呀，告密者满街都是，整个社会已经被扭曲了。在他劳改地的山坡上有个女管教，民歌里有句“妹在对面山坡唱”的词，于是，马维聪被诬为“调戏女管教。”

当天，马维聪被批斗，挨打，随后，罚他到山上干重体力活——背南瓜。

第二天，马维聪从山上背满满一背兜南瓜下山，由于饥饿，头天又挨了打，他体力不支，一跤摔下去——

山上有很多竹子，农民砍了后留下一截截尖利的竹桩，马维聪不幸一屁股坐在几根竹桩上，竹桩从他屁股刺入体内。马维聪被钉在竹桩上，动弹不得，大山上，喊救命也没人听得到。

当晚，劳改队的人不见他回来，以为他逃跑了，派人搜山，发现他的遗体。

他还端端正正地坐在竹桩上，鲜血浸透了地上的泥土……

（在血一滴一滴浸入泥土，生命一点一点逝去的过程中，马维聪呼喊了吗？用他那高亢的嗓音……）

马维聪的妻子也在歌舞团，是大提琴手，他们夫妻有才貌，女的拉琴，男的唱歌，是个非常美好的充满艺术和恩爱的家庭。

就这样给毁了！

对了，他的妻子现在还在，叫于XX（电话是63862XXX），你可以去采访她，但不要说是我介绍的，她很苦，不愿提过去的伤心事。

唆使犯人打犯人，是狱中的“规矩”。比如要收拾我诸溪了，就说，今天晚上开诸溪的批斗会，开会时监管人员自己是不动手打人的，但他们想要打谁，谁就在劫难逃。

他们确定好了要打的人，然后授意下手的犯人，开会时借故离开现场，丢下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其实这就是动手打人的暗号。过一阵子，监管人员估计打得差不多了，又返回现场，责怪说：“咦，你们怎么动手打人？停下来！”这场虐杀这才告一段落。

那个日子不堪回首啊，真的生不如死，求死不得！我好容易熬过了三年，又给我加刑三年！

劳改队每年都要对犯人进行评审，看是否改造得好。我每年都一样，两个优点两个缺点。优点是劳动积极，吃苦耐劳，二是遵守纪律，外加从不逃跑和企图逃跑（我往哪里跑？）；缺点一是“不靠拢政府”，二是不认罪。“不靠拢政府”你可能听不懂，那指的是“不告密”、“不汇报他人的言行。”我以前在南桐农村劳动时，也是这个“缺点。”当时，我们这些“分子”又被管教我们的党组织在内部分为三等，一等就是“靠拢政府”，表现好——告密！你要想当“一等”，就得去整同类，从而活得轻松一点，总之，要逼你去作恶。“不认罪”就不用多说了，我既没有盗窃，也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怎么认罪？不认罪就要罪加一等，于是我又被加刑三年。

我真的绝望了，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生，对生命的意义统统绝望了。我没有家，没有亲人，活在这个世上一无所有，真真的一无所有，连一点做人的尊严都没有，生不如死。我想自杀，想用高压电线自杀，也想投河，成天就想死。

说来救我的竟是一个管教干部，他叫XXX。一天，我坐在河边，正在想怎么死，他看出我不对劲，走过来，冲着我的屁股一脚，骂道：“你他妈真没出息！活不下去了？！嗯？站起来，走，活下去！”

这几句话还真激励了我：“活下去！”

1969年，我从西山坪转到永川劳改农场。这次转移，得力于一个叫XXX的监管股长的帮助，这事说来还有一段“佳话。”

有一个叫赵X的妓女刑满释放，股长把她推荐给我，他说，赵是扬州人，离我老家南京不远，如果同她结婚，出狱后就有家可归，而且是回老家。

长年累月在劳改队，性压抑可怕呀！一个男人几十年不过性生活，真的惨无人道，我怎么不渴望？不过，我也绝没想过这辈子要同一个妓女结婚。我拒绝了股长的好意，得罪了他。他骂我：你这辈子就呆在劳改农场，死在劳改队。可奇怪，他反过来又对我有了几分敬重。1969年，13军想要把西山坪作为后勤基地，所有劳改犯要转到四川峨边。我无所谓，孑然一生，去就去。股长叫住我，对我说：“你晓不晓得峨边的情况？那儿条件差得很，十有八九活不出来，我安排你到永川劳改农场，那儿吃大米。”

就这样，我被“照顾”到了永川。

在永川，我帮人写检讨，写出了点名气，很多人都找我。要晓得检讨不好写，要写得深刻，使检讨人过关，不仅要有文字水平，更要有技巧，有时还得逆向思维。

（注：文革中，在重庆北碚区，有人专门从事代人写检讨书的职业，而且明码标价。分为“五角检讨”、“一元检讨”、“一元五检讨”、“两元检讨”几种价格，价格越高检讨越深刻。其中“两元检讨”就是保证检讨人过关的“最深刻的检讨书。”——长寿湖右派曾永臧提供。）

劳改队有个犯人称孙秀石，是个大学生，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有一次读报，他不知是走神还是精神太紧张，竟把打倒刘少奇读成“打倒毛主席。”

那一顿好打！然后勒令他写检查，他写了几十次都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就挨一顿打。别人指点他找我帮忙，他找到我时已经被折磨得精神几乎崩溃，苦苦哀求我救他一命。

我说：“你几十次检讨过不了关，是方法不对。每次你都说是口误，走神，读错了，绝对没想要‘打倒毛主席’，结果一次次挨打。现在你干脆说就是想打倒毛主席！为什么？深挖阶级根源：自己出身地主家庭，祖祖辈辈的家产被共产党强占，爷爷又被枪杀，所以你心底阴暗，仇恨新社会，必然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这是阶级本性决定了的，就像狗要吃屎……你要同意我就帮你写，包你过关。问题是你要敢当众念。”

他哭丧着脸说：“现在生不如死，还有什么不敢念的？”

我说：“也是，你已经劳改15年，早已是现行反革命了，还有啥怕的？”

他照我说的做，果然过关。

我帮人写检讨，不要钱，要一把挂面，或者两尺布票。在劳教所那些日子我穷得很呐，一个月干下来才发两块钱，又没有亲人接济，长年累月缺衣服穿，一年中有大半年赤裸上身，冷很了就找一条围腰裹一裹。由于长期赤裸身子，我背上长出一层一寸多长的白毛，雨水落在上面顺毛滴下，不湿皮肤。

我这条命呐，可以说是捡来的，也可以说是被逼到绝境上奋起“自卫”保存下来的。

那个年代，上面成天鼓动人揭发、告密，时时刻刻监视、控制你的思想，你的一言一行。我们出去劳动，有两个组长，一个负责劳动，监督完成劳动定额，一个监视言行，当天有没有人发牢骚，说“反动话。”每天收工后开批斗会，互相揭发。我用了个办法，也可以说是宝贵经验，任何人揭发我说了什么，我都作老实认罪状，全部承认（免得挨打）。然后说，他（揭发我的人）比我说得更多、更反动，我活龙活现的编造一通，比如说他告诉我他有个亲戚在国外，他拉我叛逃……这样揭发者也被拉出来批斗。嘿，这一招很灵，到后来没人敢揭发我。

但我还是遭了一次。我曾对其他犯人说：猴子活蹦乱跳不好管，人们把猴子关起来，拿一只鸡当众一刀宰去头，血洒一地，猴子吓坏了，于是，每当有人来，其它猴子就把一只猴子往外推，到最后，剩下那只猴子也跑不脱。我说咱们要团结，不要当猴子。不知谁转眼就告了密，我被拉出来斗，我仍然运用法宝，不仅一概承认，更重要的是，从我解放前出生于大资本家的经历讲起，一点一滴，有细节有血肉，逐一分析，深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我不仅讲得非常深刻，而且讲得非常生动，劳改队里很少有如此高水平的自我批判和检讨，管教干部觉得是个好的教育典型，竟没让我劳动，白天整理批判稿，晚上安排我在各队检讨。一场又一场，直到后来才发现有点不对劲，上了我的当。

劳改队暗无天日，要生存下来要必须费尽移山心力，其中之一就是要拉帮结派，遇到事，有没有兄弟伙的支持大不一样。有一次，我选了一个最喜欢告密的人，决心收拾他一下。一天，在早请示仪式时（注：文革中人们每天早晨要站在毛泽东像前向他请示问安、表忠心，晚上要向他汇报，这被称为“早请示、晚汇报”），我悄悄凑近他耳朵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吃糠。”那人如获至宝，马上汇报：“诸溪说反动话，

他说祝林副主席永远吃糠。”

当天收工后，开我的批斗会。揭发者又把那句话说了一遍。我很沉着地站起来问：“哪个听到我说这话的？”我那帮哥们齐声说：“没有，没有。”我又说：“你们听见哪个说的？”哥们争先恐后地指着告密者说：“是他，他说了两次，早上一次，现在一次。”我进一步煽动说：“XXX是假借检举呼喊反动口号，发泄心中不满，他是伪装积极，打着红旗反红旗……”

那个年代，就算重复反动口号，也是罪过。

于是，那个告密者被打得鼻青脸肿。

在获得平反前，我有过一次绝望的冲动。那是1979年，我在山上守庄稼。中队长赵胖子叫我给他喂十来只鸡，他来收蛋。这个赵胖子，当年从农村入伍，转业到劳改农场，当了指导员，因为奸污女犯人被贬为中队长。此人既贪婪，又霸道，我很鄙视他，凭什么要又出力又出粮替他喂鸡？！赵胖子见我不从，命令我马上下山，准备用重体力劳动收拾我。我背起行李下到山下，远远看见赵胖子的身子，这时，几十年的冤屈、苦难、悲愤陡然涌上心头。从1962年被抓进来，我已经在劳改队17年了，我究竟做了什么？把人往死里整？！老婆女儿早跟别人走了，我诸溪一个反革命，一无所有……

我突然失控，跳起来冲着赵胖子的背影一通臭骂，把他奸污女犯人的事也骂出来。这种“犯上”在劳改队是石破天惊的事，其他犯人起哄：“诸溪敢骂中队长，把他捆起来，捆起来！”

我已经无所谓了，不想活了，活够了，活厌了！我继续跳着骂。这时，指导员来了，他与赵有矛盾，我这通臭骂正中他下怀，他冲我吼道：“诸溪，你发什么疯？！你给我滚回山上去！”

我于是又背着行李回到山上，赵胖子没能下手收拾我。

后来我多次想起那天的情景，想到那种绝望，那种豁出去了要拼命的绝望。每每想起，很感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不要把人逼到无路可走，人如果不想活了不怕死了，一个个都是反革命了，你这个革命就危险了。

我告诉你一件也算是我的丑事吧。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我在永川劳改农场（茶场）一个叫云台寺的地方守打水房。因为山上缺水，要从山下抽水，再从我守的这个水房抽到山上场部。我虽然一直不认罪，但我不会逃跑，也不会干坏事，所以我可以一个人住在一个破房子里守这个抽水房。

一个夏天，很闷热的天气，要下雨。大概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个小姑娘，十多岁吧，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她说：“我讨口水喝。”我说：“你喝吧。”她喝了不走，同我摆龙门阵（聊天），问我怎么来的呀。最后她说：“叔叔你给我两块钱吧。”

“我怎么给你两块钱？”我一个月才四块钱。我又问：“你要两块钱干什么？”

“我妈妈病了，发烧、发炎，要到川汽厂去打针，打青霉素。”

我还是不愿意。

她支支吾吾地说：“我跟你那个嘛。”

“你跟我哪个？”

后来我明白了，她可以跟我睡觉！

我二十年没碰过女人了，心里还是很高兴。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主动送上门来，而且只要两块钱。

她说着说着，看我这个样子好像是同意了，于是她就把手上的衣服脱了。

唉呀！除了袖子以下是晒黑了的，她的身子像是汉白玉雕塑！我一个饿了二十年的光棍男人，一见到这个，呀，简直太美了，简直是个艺术品，一个维纳斯！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问她：“你爸爸呢？”

“我爸爸在东山。”

东山也是永川劳改队的一个大队——二大队。我们队在西山，场部所在地。我问：“你爸爸犯的什么罪呀？”她说：“也是右派，因为抗改造又判为现行反革命。”

我一听，脑子里“轰”地打了一个炸雷！我也有一个女儿啊！我女儿会不会也被逼得去卖淫？她爸爸是右派，我是坏分子，我现在也是现行反革命，管制三年又三年。

我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来残害同我女儿一样的人？！我女儿同她差不多大，我被打成坏分子时她才三岁。我说：“你赶快把衣服穿起来。我不是禽兽，我不能残害同类！”

我骂我自己，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一个人？我自己都被逼得家破人亡了。

这时天上响起一个炸雷，下起了大雨。她不能走了。我问她吃饭没有，她说她早上吃了一点包谷羹羹，中午没吃饭。我说这儿有挂面，你下点面吃。

大雨一直下个不停，我这个地方是两个山峰，中间一条独路可以到川汽厂，下大雨她不能走了，我留她，同她说话。她告诉我，她爸爸是个小学教员，当了右派，不接受改造，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在东山二大队。

我想，还有比我更苦的人，一个小姑娘，为了两块钱，为了给母亲治病，跑到劳改队来卖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是什么人，把国家、把老百姓害成这个样子？！她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

这个罪魁祸首是谁？！ 2009年7月

这个罪魁祸首是谁？！

1979年，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我从劳改队回歌舞团找领导解决我的冤案，他们说我不属于“改正”之列，因为20年前没有给我定任何罪，罪名都没有怎么“改正”？

那我是为啥被开除公职，下放劳改的呢？

现任歌舞团领导赵发奎一番话，我才明白，原来我还是“因言获罪。”

当年我很想把妻子调到歌舞团，我妻子又会唱又会跳，调来既解决夫妻分居，又能



脑子里“轰”地打了一个炸雷！



干一番事业。可是领导不同意。没多久，我发现团长吴 X 的老婆 XXX 调进团了。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话：他老婆又不会唱又不会跳也能调进来？

就是这句话得罪了团长，他暗地里指使把我整成坏分子，驱逐出歌舞团。

吴 X 这个人才是个坏分子，利用职权搞了不少女人。

但是，歌舞团还是不同意接收我，他们说，坏分子的事不成立，但我还有盗窃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这两个罪名不解除，不能接收。

为洗清这两个不白之冤，我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地奔波呀，那个苦，一言难尽。又整整过了三年，才还我一个清白之身。

我再说说我的妻子女儿。我妻子是铁路文工团的一位演员，因为坚决不同我离婚被罚去扫厕所。1961年，我又被打成盗窃犯抓进监狱时，她被迫同我离了婚，女儿也改了姓。

1958年时，我女儿3岁，我劳动教养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我当然想她，可是，我一个坏分子、一个盗窃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找她不是祸害她呀。我不敢，我再想念，再痛苦，我必须忍受。

但是，到了1979年，有一线希望，可以洗刷我的冤枉。我赶紧找她。我利用回歌舞团申诉的机会，想见已经在火车上当列车员的女儿。

那天她要从贵阳来，联系好了。晚上9点多钟到重庆。我在重庆等她，我等不及啊，那心里真是像火烧一样。我就从菜园坝火车站买票到小南海，我只有那一点钱。我去迎她来，早几分钟见到她。二十多年没见了，我女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唉呀，等呀、盼呀。那从贵阳来的火车从长江大桥轰轰地过来了，我心都要跳出来了。

车停下来了，我跑上车厢，晚上9点多钟，那个慢车，车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看到一个小姑娘在扫地，扫车厢。我一看。那就是我的女儿小英。

“小英！”

我女儿吓了一跳。我枯瘦如柴，戴个破军帽，肮脏的旧军装。

她说：“我不认识你呀。”

我说：“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呀，我是你爸爸……”



诸溪与分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我回到歌舞团是1981年，我已经55岁，歌舞团安排我到伙食团煮饭，干了几年退休。

今年我78岁，这一辈子快过完了。几个月前我在观音桥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差点儿一了百了，醒过来很是感慨：

我年轻时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但是，我一辈子吃苦、坐牢。50多年来，唱了几首歌，坐了二十多年牢，然后退休吃闲饭20年。这一辈子，怎么说呢，我被坏分子打成坏分子，被盗窃犯打成盗窃犯，被扒手污成扒手，这个新社会呀……

采访时间：2004年5月24日、6月7日、7月12日 地点：重庆市渝北区

采访后记

诸溪是我决定“洗手不干”之后又采访的一个长寿湖分子。

2004年5月16日，在长寿湖右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一位老人慷慨激昂地朗诵了一首藏克家的诗《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啊，多么伟大

……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是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的人，人民把他抬得很高很高
……”

老人目光炯炯，声音宏亮，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饱含着朗诵者自身的强烈情感。

长寿湖难友们对他的朗诵心领神会，抱以热烈掌声。

有人告诉我，此人叫诸溪，以前是重庆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不一会，老人主动走到我面前，硬朗朗地说：“我听说过你，听说过你的事，希望你到我家来，咱们聊聊。”

于是，我又背起采访包，前后三次登他家门，记录下了上述那些文字。

诸溪真的是又一次“最后一个”？

他又给我开出一串名单，叫我去采访。

可是：

有的人死了，阴魂还压着活着的人；
有的人活着，紧抱着死人的僵魂不放……

第三次从诸溪家出来时，正值山城火辣辣的七月，我挤在又闷又热的公共汽车上，再一次感到那种无可奈何的绝望。

诸溪说：“如果冤整了我诸溪一个人，算是偶然，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冤整了一千万，两千万呢？”

一千万？两千万？五十多年来，狼烟滚滚血泪斑斑的大地上，到底有多少万呢？

我在那长长的望不到尽头的数字面前大汗淋漓。



“这个‘新社会’呀……”
诸溪 2009年7月20日讲述时

一辈子都记得你共产党！

李正

1957年重庆市歌舞团大提琴手

1926年生



“我一辈子都记得你共产党！”

德国人整了犹太人一直在认错，日本人侵略中国不认错，共产党1957年整了几十万知识分子，也不认错。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懂（19）57年是怎么回事，我年龄越来越大，巴不得说一下，希望恢复历史的原貌。

我是重庆南川人，地主出身，8岁时父亲死了，叔父把我养大。叔父思想很进步，同地下党有往来，掩护过不少地下党领导人，其中就有刘隆华（女，曾任重庆市副市长）。刘隆华还发展我姐姐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1949年12月，我加入了解放军12军文工团，算是走上了文艺道路，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我到了重庆市歌剧团，担任乐队大提琴手。我那时对共产党很崇敬，这主要是在学校读书时受一些优秀同学的影响，这些学生不仅成绩好，而且有理想、有抱负、追求民主、热爱自由、疾恶如仇，人品与学品都没说的。我后来了解到，这些优秀学生几乎都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人，我一下子对共产党感兴趣了，这个党一定代表中国的未来，值得我追求投奔，所以我坚决同我那个很富的家庭划清界线，一头扑进了革命怀抱。



走上“革命”道路时的李正

解放后，一大群南下工农干部进了城，这些人素质很低，但气势很大，一个个以救世主自居——是他们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些人举手投足盛气凌人，我很看不惯。还有，外行领导内行成了普遍现象。歌剧团本是专业性很强的单位，领导不懂业务就罢了，偏还乱安排人，任命的乐队指挥连五线谱都不识，每次还得我们帮他译成简谱。我年轻不懂事，私下里嘀嘀咕咕说了一堆抱怨的话。我没有申请入团，入团要积极，积极就是汇报，入了团更是要汇报，汇报别人的思想、别人的一举一动，这不是像特务吗？我非常反感这一套。

我有个好朋友叫冯异，拉小提琴，冯异喜欢读书，

研究点文艺，他同胡风有几次书信往来，探讨诗歌艺术。反胡风运动一来，领导把冯异抓出来，说是胡风分子。我在一边愤愤不平，那几封信我也看过，纯学术。联想到单位领导一向不懂业务，水平低，我忍不住骂了一句：“简直不学无术。”

冯异年龄比我大，书读得多，他感觉事情不妙。一天晚上，他来找我，劝我不要再为他说话，可能有麻烦，我不以为然，笑他胆子太小，这么点事，能咋地？哪晓得就在第二天，公安局来了几条汉子，亮铮铮的手铐“啪”地一声铐在冯异手上：正式逮捕，押送监狱！

我吓懵了，赶紧闭口作老实状，可惜晚了。

我很快被隔离审查，不仅说我是胡风分子，还非要我交待胡风反党集团在重庆的组织结构、组织纲领、集团人员、行动计划等等，我的个天！我哪儿去找？不交待不行，整整七天七夜不准我睡觉，逼得我发疯。最后没法，只好按照他们的要求，一口气写了整整23本材料，有组织、有纲领、有目标、有行动计划，然后再把我所认识的人，统统写成是胡风反党集团成员。这一下他们满意了，破获了一个反党大集团。但我仍然被隔离关押，一直关了九个月。那一天，记得是人事科长找的我，他说，经过调查，我不是胡风分子，予以解除隔离审查。他接着批评我，怪我没有经受住党组织的考验，写了大量虚假材料，害得他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搞调查。

没经住考验？让他七天七夜不睡觉试试！

（唐吉诃德将风车当作敌人，向风车发起进攻，留下千古笑谈。有人青出于蓝，连风车都不要，先假想一个风车，再把假想的风车当作假想的敌人，发动全国人民同风车战斗。

唐吉诃德是几百年前西班牙书中的人物，共产党是当今一个大国的领导核心，后者折腾一下，决非塞万提斯笔下的文字潇洒！）

关了九个月，我还没清醒，坚持认为共产党毛主席是好的，问题出在下面。我的老师方大提，是当时中国四个著名的大提琴师之一，他也遭受迫害。我气得咬牙，觉得歌舞团实在乱来，老子要到北京告状！告下面乱整知识分子。我登上火车，风风火火直奔北京。在北京，我听到消息，共产党马上要开展整风运动，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我高兴极了，党中央、毛主席真是英明，高瞻远瞩，晓得下面乱来，我认为用不着在北京告状了。我慌忙赶回重庆，要在歌剧团整整风。

正当我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亲友们劝我不要多说，免得惹祸。我一下子想起冯异被抓走的情景：手铐咔嚓一声。

我头脑顿时清凉了。

我只提了两点很轻微的意见，一是不该整我的大提琴老师，二是“天高皇帝远”，下面没有按中央的正确部署办。

我一直认为党中央、毛泽东是正确的，只是基层党组织和单位领导乱整。我直到七十年代末才真正认识共产党和毛泽东。

最初没把我划为右派，而是让我戴着大红花，作为下放干部到南桐矿区劳动锻炼。一年后，1959年2月，领导突然把我从南桐召回，当晚就不准我自由行动。第二天上午，

我稀里糊涂上了批斗台，下午宣布我为右派，下放长寿湖监督劳动。我的老师方大提被遣送回老家，六十年代被打死，至今没平反。

我没结婚，免了很多烦恼和负担，只是18元生活费灾荒年吃不饱，我把唱片、乐谱、书籍卖了个精光，换冠生园的高价饼子吃，但我一直没卖大提琴。为了多吃一两粮，我干犁田的重体力活，身体迅速拖垮。1961年，不到一个月，我整个人变了形，全身浮肿。有人给我打了一针“干精针”消肿，肿没消下去，引起感染，两条腿肿得发亮，我看那架式不进医院只有死。为了求生，我用双手和屁股在地上一步步挪动，整整花了近四小时才移到卫生所。那四个小时在路上的狼狈和凄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双腿上的两个刀口，就是那次留下的纪念，终身的纪念。

还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发生在文革。一群造反派窜上岛子，勒令我们右派跪成一排，造反派冲着我们又打又踢又骂。一个十来岁的娃儿，用脚踩在我头上，一边踩一边叫：“踏上一只脚，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那时我好绝望！右派就像人人可以踢一脚的癞皮狗，娃儿都对我们充满了仇恨。

1975年我回到歌剧院。大提琴还在，但没让我上乐池，让我打扫厕所和院内的卫生。1979年我获得“改正”，领导还是当年整我的领导，说一声“整错了”就完了。给我分配的工作是到伙食团煮饭。

我真的绝望了，整我的领导没有一丝忏悔，更不要说道声道歉。不仅如此，待遇上还处处卡我，仍然把我当有问题的人。我在长寿湖最艰苦的时候都没有绝望，总觉得改造好了就会重新得到尊重和任用。“改正”后看到整我的人仍然用那种态度对我，毫无悔意，这时我才对共产党彻底绝望。我把1961年饿得浮肿都没舍得卖的大提琴卖了，彻底断绝了重返乐池的念头。1989年我退休，工会的人找我谈话，我咬着牙说了一句：我这一辈子都记得你共产党！



讲起这段往事，李正十分痛苦

我50岁才结婚，有了个家。我没得子女，长寿湖右派中好些人都绝了后，我是其中之一。

当年我一直认为毛泽东共产党发动反右是应该的，错在下面没执行好，我以为只要把党风整好就行了，现在看来太幼稚。共产党一直是靠整人来维持它的统治，总是利用一批人来整另一批人。土改时如此，文革也是如此，党外如此，党内也是如此。政客们都是些毫无良心的东西，毛泽东就是个典型，我提到他就想骂，只是不敢公开骂。1957年明明整错了，共产党死不认错，只说是扩大化。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哪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现在绝大多数人对共产党都很绝望，腐败触目惊心，巴不得它

早点完蛋。我现在常常想如何治理好国家，民主还是独裁？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一旦乱了，又要独裁专制来收拾整理，但独裁又可怕。一个小小的村长，不仅可以整人，而且可以大捞其财，这比毛泽东时代又进了一步。另外我也很困惑，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固然可怕，可一旦没有共产党，又怎么办？中国一旦天下大乱，也很可怕。所以，我现在思想很矛盾，也很苦恼。

采访时间：2001年6月9日；2009年5月29日
地点：重庆市歌舞团；重庆市九龙坡区

采访后记

李正的绝望，始于“改正”之后。

20年日子虽然孤独，但大提琴在，希望在。“改正”时，一声：“哦，搞错了”，20年的苦难和希望一笔勾销，唯一的变化，是从扫厕所变为做馒头。



2009年5月，李正与他年轻时追求“革命”的照片合影

长寿湖守着那琴，虽不敢拉，但立在那儿就是希望，饿得要死也不能换饼子。况且，没老婆的人，看着它，抱一抱，也是一种安慰。

领导安排自有道理，抬石头十年，犁田六年，扫厕所四年，都是些磨损指头的活儿，拉大提琴专业要求太强，安排到食堂干活，也是一种关怀——考虑到在长寿湖长期饿饭，一脸枯瘦。

至于冷漠不道歉，毫无悔意，那就更不是领导的错了。首先，“总设计师”和“伟大光荣正确”压根就没承认（19）57年不正确。其次，传统文化中又找不到叫忏悔的东西，怎能指望整人的人，能够听到教堂透彻灵魂的钟声，泪流满面地说，主啊，饶恕我，我（19）57年整了一个人，害得他20年讨不上老婆，一辈子断了琴弦，又绝了后。

采访李正时，正值党的八十大寿前夕，电视上广播里成天在颂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是人民大救星。”

李正说：“我一辈子都记得你共产党！”其实，记得又怎样？大提琴早卖了，一辈子也快过完了，“伟大”的依然“伟大”，“正确”的，仍然“正确”。



2013年8月6日，李正在重庆去世（谭松摄）

解放前我敢说，现在我不敢

康敏

1957年重庆文化宫文艺组导演

1949年年底，康敏参加了共产党川北区委文工团。当时，他对政治并无兴趣，不属于那种追求民主自由而投入共产党怀抱的热血青年。他加入川北区委文工团纯属一种爱好——对艺术的爱好。

我无意加入国民党，也无意加入共产党，我只想搞文艺，当个导演。川北区委搞了个文工团，我进去了，也就算参加了革命。刚参加革命，给我的第一本书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那上面的一些话说到我心里去了。例如：“我们的各级干部，不论职务的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又如，“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觉得这个党，这个领袖不错，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的。

解放后，一切都欣欣向荣，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非常兴奋，认为遇到千年难得的太平盛世了，自己应当好好干、亡命地干，才无愧于这个盛世。

1955年审查干部，一棍子把我打懵了。我不懂为什么审我，我哪点出了问题。组织上把我挂起来反反复复地审，审得我发狂，最后逼得我大叫：“你们不要再审了，干脆把我抓到公安局关起来。”整了大半年我才弄明白，他们怀疑我是特务，因为我解放前在国民党报社干过。那一次虽然最终查清楚了，但已经把我折磨成精神分裂，身体也垮了。

1957年鸣放时我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不说不说？反胡风时我得出了教训：绝不能够犯上。解放前我还敢骂蒋介石，出了事还可以跑。解放后不同了，反胡风我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不到1957年我就老实了。

我所属的文化宫工会共11个人，1957年划了5个右派，比例高达45%。但这5个右派中没有我，我一言不发，抓不到我的辫子。我下长寿湖是自己主动申请的。我当时身体很差，希望跟右派们一起下去劳动，把身体锻炼好。现在想起来当然很好笑，但我的的确确去了，在下面干了四年。

这一辈子回想起来说什么好呢？我非常怀念五十年代初，那时社会上没有小偷，人与人关系非常和谐亲善。我刚到重庆没有熟人朋友，大年三十，我在街上乱走，有一个中年人看我无家可归的样子，主动关心我，听说我是外地人，初来重庆，他马上热情邀请我到他家过春节。所以，我到重庆的第一个春节是在一个陌生人家过的！那时，人们开口闭口都说共产党好，虽然还穷，但大家都在奋斗。现在？不敢想！

眼下这个社会，看不到希望。下岗的工人太多。前不久我们厂（毛纺厂）一个下岗工人上吊死了，死后人们去他家，发现他一贫如洗，缸里一粒米都没有。医药更是没有

血红的土地

保障，老百姓一听说病了要上医院就吓得发抖。我们毛纺厂，一个好端端的厂被搞垮了……算了，还是少说点，解放前我敢说，现在我不敢。对这个社会要看得惯，看不惯怎么活？小老百姓没办法，这个社会不是老百姓所能左右的。对了，你搞这个右派采访是个敏感题材，很敏感，真的，你要注意……

采访时间：2001年6月5日 地点：重庆市李家沱

补记：

2005年，康敏先生在贫困中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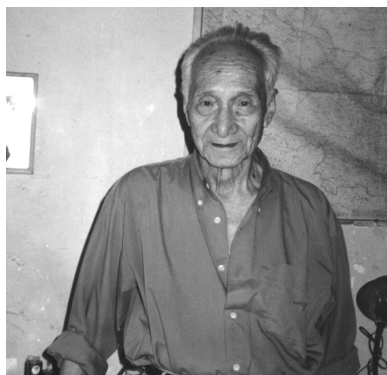
现成为旅游胜地的长寿湖（谭松摄）

幸亏江青没找到我

万声

1957年重庆市话剧团舞台美术队队长

1917年生



我是山东济南人，1933年到上海，参加了左翼剧团，左翼剧团当时是上海非常有势力、有影响的团体。我同时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上海期间，我认识了蓝苹（即后来的毛泽东夫人江青），一起演过剧。蓝苹也是山东人，她到上海时，是个不错的青年，思想进步，大方开朗。1935年冬，我从上海美专毕业，回山东，到省立剧院工作。1936年，蓝苹到济南，这时，她已经不再爱她的第二个爱人唐纳，她想同章泯结婚。我们戏剧界的人劝章泯不要同江青结婚，因为不合适。唐纳追到济南，江青不见他。唐纳一气之下自杀，但没有死。我在报上看到他的消息，跑到医院去找他，并且亲自把他送回上海。江青文革中要是找到我，我肯定活不出来，因为当初劝章泯不要同江青结婚的人，一个个都被整死。

抗战初期，我来到重庆，参加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一直呆到解放。

快解放时，我在重庆演剧12队，队里有两个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很了解，也很赏识我，解放后介绍我进了市话剧团。

1952年突然把我打成三反分子，关起来审查。这是我人生遭遇第一次政治运动。审了整整一年，整得我昏头转向。后来剧团要到云贵川演出，慰问解放军，需要用人，突然放了我，没作任何说明，更没有结论，我莫名其妙（至今也莫名其妙）。这次运动对我是个转变，从此我不爱说话，从此我远离领导。

1955年肃反运动，突然说我是反革命，又关起来审查，还派人到外地去调查。折腾了大半年，后来剧团要到北京演出，急需用人，又放我出来，重新担任舞台美术队队长，赶赴北京布景。这次，又没有任何说明，抓抓放放，像是舞台上演戏搞着玩。

鸣放时我一句话不说，反右也没我的事，我遭在反右之后那个“向党交心”运动。

领导说：“交心，是指有什么委屈，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党讲。”我信以为真，把我三反、肃反心中的疙疙瘩瘩交了出去。那晓得书记说：“你是带着黑心向党交心！”、“你向党交一颗黑心！”

一巴掌打下来，我当了右派。

对我处分很重，别人是三降（降职、降薪、降级），我120元工资全部取消，只发10元生活费。组织上说，10元钱够了，人民公社伙食费是4元，还可以剩6元。其实，长寿湖伙食费是8元。我有一个家，有孩子，都不管了？好在我妻子一直没同我离婚，

我每次回家探亲，都是她给路费。

她想得很细，我回来，一定让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儿子见到我，高兴得哇哇叫，他一一对他的小朋友说：“这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我爸爸来接我了。”

在长寿湖近20年，我十分老实，一天难得说一句话，更不私下写任何东西。文革时造反派突然来搜查，翻箱倒柜，找不到我一张纸条。那些年人与人没有感情可言，我觉得对任何人都无话可说。我们戏剧界，30年代在上海一起干过的人，解放后都被整死了，我活下来不容易。

采访时间：2001年9月19日 地点：重庆市话剧团

采访后记

万声先生是我采访的第52个长寿湖右派。前期采访中，不少人都提到他，说他当年与江青共事，同台演出，说他若不是当右派躲在长寿湖，肯定被江青整死，还说他高大的个子，堂堂的仪表，饿急了时竟趴在地上拾人家吐的鸡骨头……

我相信他是一部厚重的历史。

万声先生站在市话剧团宿舍铁门外等我，84岁的老人，腰身挺拔，眉目传神，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透出当年舞台艺术的神韵。

我坐在他陈墙旧壁、毫无艺术气息的家里，期待着一段波澜起伏的人生。

“咚咚咚”，有人敲门，进来一位老人。万声介绍，来者是话剧团另一位右派肖培禧，也下放长寿湖。

来者滔滔讲起他的经历和感受，一口气讲到十一点一刻。

送走肖先生，我急切地转向万声。

万声讲了二十多分钟，便不再多说。我声声追问，感觉已是拖不动的车。

我只好起身走人。万先生满目慈祥送到铁门外。

步入山城秋阳明亮的炎热中，我突然明白，万先生压根不愿意我去采访，但以他的厚道，他不便拒绝长寿湖难友的儿子，于是，他找来肖右派，占据说话的时间。

他不是已经告诉我了，“三反”之后他就变得沉默寡言？他不是已经说了，向党交心的后果？

一个已经被完全改变了的人，为什么要在他人生的迟暮向一个后来者“交心”呢？

我感到难过——

——为万声变为无声的个体不幸难过；

——为放弃反思苦难的整体责任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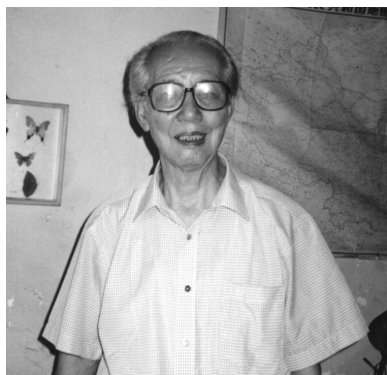
2002年6月，85岁的万声老人参加长寿湖聚会（谭松摄）

“改造”就是让人变成奴才

肖培禧

1957年重庆市话剧团编导

1921年生



1938年，我进入国立剧专读书，国立剧专是现中央戏剧学院前身，抗战时从上海内迁到江安。毕业后我在宜宾等地的剧团当演员，解放后进入重庆市话剧团当编剧和导演。1957年鸣放时，重庆市委发来大红请柬，请我们剧团的几个艺术骨干前去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是被邀请者之一。在会上，我只对团里的工作提了点意见。具体是：话剧团有个艺术委员会，由业务骨干组成，上演一部新剧，角色要由艺委会指定，不少青年演员对此不满，认为不公平。我是艺委会成员，我支持青年演员的意见，我只提了这一条。

青年演员知道我支持他们，把我当知己。一次在路上，几个青年演员说：“肖老师，我们组织一个青年演剧队，你来给我们当编导。”我随口答道“可以，好哇。”一个叫刘志成的青年演员，莽莽撞撞写了条消息，没给我看就投给重庆日报。当时报社记者配合鸣放，乱哄哄地抓消息，也不核实就登出来，那消息是：市话剧团将组建青年演剧队，由肖培禧担任编导。

这报道把我害惨了！党组织据此给我定了罪：“肖培禧与党争夺青年一代！”

1957年是否被划右派，与单位领导的关系很重要，他们掌握生杀大权。

本来，剧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李XX与我关系很好，他很赏识我的才干，但是，在鸣放初期我把他得罪了。

1957年之前我不懂政治，也不懂人际关系，我一心搞艺术，比较单纯，以为共产党员真的像宣传的那样大公无私，提点意见不会在乎。所以，我对李团长提意见很直爽，我说他“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他在意见会上伤心流泪，我还说：“不要理他，他是麻痹我们。”我说这话并没有什么坏心眼，我们关系并不坏，但是，我这句话伤了他的心，他后来坚决要划我右派。

我的处分是三降：降职、降薪、降级，同时下放农村。我已经有五个小孩，唉，说来也是响应号召，学苏联，多生孩子，当英雄母亲。团领导看我的确困难，保留了我50元工资，算是网开一面。剧团其他右派就惨了，例如万声，120元的工资降为10元生活费。

我老婆是剧团的演员，我当右派后一年，她提出同我离婚。法院完全一边倒，对我态度很凶，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不像判民事案，像是判犯人。那种恶劣我记得一清二楚。5个孩子全判给她。其实离婚后，老婆孩子并不少受歧视，少受影响。我1977年回剧团，她身体已经很差，一年后她就去世了，离我获得“改正”只差一个月。

在下放劳动期间，最难过的日子是那三年饥荒。劳动量大，吃不饱，管教干部凶得很，把人往死里逼。一天晚上下雨，加班夜战，有个叫李文久的右派，身体不好，浑身发抖跑回去烤衣服，一个姓陈的管教干部找到他，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像拖猪一样把他往外拖，一边拖还一边骂。市歌剧团的右派李正，身体瘦弱，没完成犁田指标，被罚站在水田里整整一夜，双腿肿得发亮。他悄悄对我说：“我吃不了，我想逃。”我说：“你往哪里逃？抓回来还不整死你。”

我本是文弱书生，没干过体力活，下去后我亡命干，成了劳动强手，担几百斤石头不成问题。痛苦的是吃不饱。有一次遇见一个老朋友，他说：“唉呀，你咋变成这副模样，你照照镜子。”我没有镜子，他去给我找来一面小圆镜，我一照，吓一大跳，鼻子歪了，眼睛两个黑洞，颧骨凸突，像是要死的人。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半夜外出小便，刚走出门，天旋地转，一头栽下去。我躺在地上，双手抱头，不想起来。我望着寂静灰沉的天空，很绝望，人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意义，那一夜，我想死在地上，不再起来。

为了活命，右派们的衣服、床单等能换吃的都卖完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长寿湖（陈华摄）。右派偏偏倒倒走在路上，经常有农民走上来，扯一把衣服说：“这件衬衫换不换？3斤包谷。”有个卖得一无所有的右派饿急了，把旅馆的床单偷出来换吃的。

救了我一命的是一个姓孟的女医生。她是个好人，从不歧视右派，那天她一见到我就说：“这个人不行了，赶快送到队部医院。”她给我打了针，吃糠粑，不要我参加重体力劳动。是她救了我一命，她还救了其他好些右派，是长寿湖难得的好人。

我1977年才回来，“改造”了二十年。记得下去时文化局的肖局长很轻松地对我们说：“去吧，去吧，没啥，最多一年就回来。”

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因为没犯什么错。哪知“改造”的路这么长。

改造？人的改造，怎么改法？灵魂里怎么闹革命？经过20年，思想改造成啥样？改成无产阶级了？！

改造就是给你警告，让你受苦，让你变成奴才，看你今后敢不敢乱说乱动。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改造”让我赢得了副好身体，我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身强力壮的汉子，至今很少生病，这是其一；二是让我懂得了政治是怎么回事；三是让我懂得了人事，人际关系，该怎么说话。

不过，不管受到多大的压力，我从来没有昧良心编假话整人。不整人、不害人，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

采访时间：2001年9月19日 地点：重庆市话剧团

那时我年轻，麻麻哈哈

陈华

1957年重庆市歌舞团美工

1923年生



我不是右派，也不是其它“分子”，我下长寿湖十几年纯属误会，也怪我，那时年轻，麻麻哈哈，一会儿“好人”，一会儿“坏人”，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一辈子搞美术、摄影。解放前在一所小学教书，解放后先后在五一电影院、西南文工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重庆市歌舞团工作。

1957年反右，歌舞团划了一批右派，下放到南桐矿区劳动，没有我。同时还去了一批下放干部，也没有我。1959年10月，领导通知我，到南桐参加短期劳动，我不敢违抗，背起铺盖卷就去了。

南桐的人认为我一定是有问题才被放下来，把我安排同右派一起劳动，这当然是最苦最累的活。干了一个多月，发现我不是右派，把我调出来，归到下放干部一类，也就是说，按“人民”对待。1960年，上边通知，下放干部回归原单位，右派分子转到长寿湖。由于我是独自一人去的南桐，下放干部的整体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于是，通知回城的干部人员中就把我漏下。这一漏，就漏到右派分子中，漏到了长寿湖。

我那时年轻，麻麻哈哈，不晓得跑回单位闹，心想，长寿湖就长寿湖，反正工资没少，锻炼一两年再回去，没啥不得了。

结果在长寿湖干了十几年！我有六个小孩，1960年我妻子病逝，六个孩子在家里没父母，大的拖小的，麻麻哈哈，不是个日子。



陈华五十年代作宣传画

在长寿湖，我身份很微妙，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2年农场把所有的分子分为两类：一类右派，一类地、富、反、坏等分子。后一类集中在团山堡。我被划为后一类进了团山堡。那一次整得凶，所有“分子”不准外出，一个个交待问题。但是我例外，我可以划船到狮子滩买东西，而且，也没有让我交待。这样看，我又算好人。你别小看了“名份”，那个年代“名份”定你生死。“坏人”中也要分等级，摘帽右派比没摘帽右派日子好过，没摘帽右派又比“顽固右派”轻松。例如，仅说干活，最重最累的活，如冬天下水，雨天出工等，

往往是没摘帽的去干。挨斗挨打，遭得最惨的是“顽固右派。”

总的说来，我在长寿湖没吃多少亏，主要就是我没戴右派帽子。1963年我同长寿湖女右派颜淑群结了婚。不久，右派要集中到项家坝，而我在团山堡。我坚决要求妻子同我在一起，上面也破例同意了。我想，这都是归功于我的“名份。”

由于我会摄影，场部拿出250元钱，让我在狮子滩开了个照相馆。我跑遍了长寿湖的山山水水，亲眼目睹了右派非人的生活和奴隶一样的劳动，我还给一个淹死了的女右派的尸体拍过照，可惜记不起她的名字了。

我庆幸我没当右派。

1976年我同一些右派一起回到歌舞团。没摘帽的干扫厕所之类的活，摘帽的可以安排到厨房，他们开会单独开，而且不能吃样板伙食，样板伙食就是有肉吃。我回来后没扫厕所，没下厨房，而且吃的是样板伙食，我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属于“人民”。

不久，女儿要入党，组织上来调查我，歌舞团人事处的人说：陈华正在落实政策中。对方一听，肯定有问题，女儿入党的事便搁下来。还有一次，单位供应白糖，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购买白糖，请把钱交到陈华同志处。人事处的人见后，叫人去把“同志”两个字擦掉。给人印象我有问题，是“坏人”。我一气之下找到院长说：“我回来一直吃样板伙食，到底有啥子问题？”院长很不错，为我专门去了文化局，文化局找不到当年处分我的任何材料，给我出了个证明：该同志没受过处分，没戴帽子，长寿湖宣布摘帽是错误的，应当消除影响。



陈华在长寿湖劳动



右派颜淑群在长寿湖（陈华摄）

我那二十年，不明不白地过，子女受影响，本人活得窝囊，麻麻哈哈。我不敢据理力争，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虽然肃反时作过交待，共产党也作了结论，但总是一个历史疤痕，骨子里觉得共产党整我一下好像也应该。自己底气不足，受点委屈，挨点整，算了。看看那些右派，看看那些分子，那才叫整得惨，我算没吃大亏，日子过得去。要说冤枉，我第二个妻子颜淑群才冤。她什么问题都没有，也没鸣放，只因为前夫是国民党川粮处处长，被共产党镇压，就把她抓出来当右派。我看到冤的多得很，我不算啥，真的，没啥。

采访时间：2001年11月6日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采访后记

陈华老人讲述时用得最多的一个“专有词”是“麻麻哈哈”。

他“麻麻哈哈”下长寿湖，“麻麻哈哈”被集中在审查“分子”的团山堡，“麻麻哈哈”被摘掉根本没戴过的右派帽子，“麻麻哈哈”在“好人”与“坏人”中找不到名份和位置……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麻麻哈哈”过了一辈子。

其实，这哪里是陈华的“麻麻哈哈”。

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必然“麻麻哈哈”；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必定“麻麻哈哈”；一个视个体生命如草芥、公民如奴隶的地方，必定“麻麻哈哈”。

一言不发的颜淑群被打入长寿湖，是不是“麻麻哈哈”？

回归祖国的张志荣被打成“投敌叛国”，是不是“麻麻哈哈”？

千万个知识分子莫名其妙成为“敌人”，是不是“麻麻哈哈”？

“麻麻哈哈”是专制绞肉机的另一个血腥特性，而非陈华老先生的“稀里糊涂”。

（陈老先生还保留有部分当年他拍摄的长寿湖照片，他无偿地提供给了我，使我们看到一点当年的旧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谢没有明确把他划为“坏人”。）



长寿湖右派劳动（陈华摄）

演艺界部分右派简况

1、曾 蓉（女）——重庆市话剧团主要演员。在讨论演出的艺术问题时观点与领导不同被打成右派，下放长寿湖，1973年1月病逝，终年45岁。（详见“王薇”和刘曼若《红苕鼻子》一文。）

2、赵 平——重庆市话剧团演员，下放长寿湖后逃跑，帮人打石头。他个子高、力气大，聚集一帮小偷，自己当帮头。赵后来跑到汉中一家煤矿当矿工，1995年去世。

3、蔡 炎——重庆市话剧团最优秀的演员，写了几篇小品文被划为极右，因身体不好未送监狱劳教，但被开除公职，流落街头，靠打零工、挑沙等为生。

4、朱伯封——重庆市歌舞团乐队指挥。在市委宣传部组织的鸣放会上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被划为极右，抓入四川石棉县石棉矿劳改，上世纪六十年代死于劳改地。

5、曹绥志——重庆市歌剧院演员，他培养女朋友考入川大中文系，并与之结婚。婚后一个星期，曹被划为右派，女方在巨大压力下与他离婚，曹极度忧郁，死于1958年国庆节南桐矿区山中，终年20多岁（死在右派李正怀中。刘曼若在《红苕鼻子》一文中写到的死亡即曹绥志）。

6、王 恒——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演员。1961年为了争取每天多吃一两粮，王去干重体力活——犁田，在干活时饿慌了，吃下大量马桑，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死在同心岛，终年30多岁。

7、熊 丰——四川川剧团创作员，“历反”，在长寿湖团山堡劳动改造。文革初期，他说了一句“虎啸他年未可知”，被连续批斗几夜。熊丰恐惧中半夜起来上吊自杀，不料绳子吊断，熊摔在地上发出响声，正巧有人外出解手，熊因此得救。熊丰于“改正”之前去世，具体时间不详。

8、范国瑞——重庆市话剧团骨干演员，右派。1979年“改正”后，任市话剧团团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9、邱令贻（女）——重庆歌舞团钢琴演奏家，上海人，与男朋友（在重庆电台工作）双双划为右派。男友（姓名不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去世；邱令贻1980年因心脏病去世。

10、宋清涛——重庆市歌舞团右派，导演，1999年去世。

11、任 然——重庆市歌舞团右派，编剧，2000年去世。

12、郑波文——重庆市歌剧院演员，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13、赖 飞——重庆市歌剧院演员，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14、肖伯志——重庆市？剧团历反，“改正”之前去世。

15、陈友功——重庆市歌舞团乐队队员，因对市委市政府每周把歌舞团的女演员和乐队队员叫去伴舞提了意见而被划为右派，与余泽华一起被打为反党集团。

16、余泽华——长寿人，1933年5月生，中学文化，重庆市歌舞团乐队队员，右派，与陈友功一起被打为反党集团。

17、龚巴村——重庆市歌舞团右派，歌唱演员。在南桐两河公社劳动时得了脑膜炎，送回重庆抢救，因而未下长寿湖。

18、唐存淼——重庆市歌舞团导演，右派（或历反），毕业于上海剧专。在南桐两河公社劳动时饿死。

19、王文浩——重庆市歌舞团歌唱演员，历反？留团监督劳动，现情况不详。

20、鲁风——重庆市歌舞团右派，下长寿湖后又转入永川劳改农场，现情况不详。

21、冯毅——重庆市歌舞团小提琴手，因同胡风通过几封信被抓入监狱，生死不详。

22、方大提——重庆市歌舞团大提琴师，右派，被遣送回老家，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打死。

23、王枫——重庆市话剧团历反。

24、金辉——重庆市话剧团历反，下长寿湖后又入狱。

25、李文义——重庆市京剧团右派。

26、罗远凯——内江人，1929年9月生，高中文化，1959年1月在重庆市歌舞剧团打成右派。独身。罗于2009年8月30日去世。

这场以摧毁国人的良知为代价的政治运动所采用的种种卑鄙手段，已经成为下流无耻的同义词。就像数学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反右运动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由于这些谜过于违反人类的常理，所以，一些后来的人甚至不愿相信：难道这一切不可理喻的事情都曾经真正发生过？那些在运动中一边咬牙切齿地置无数正直的知识分子于死地，一边开颜大笑弹冠相庆欢呼伟大胜利的人，心肝到底是什么做成的？

——陈仁德（重庆作家）